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7500亿民间资本的前世今生·——

KANBUDONGDE
WENZHOUIBEN

周德文 编著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跟温州人学投资

- ◎一部关于中国民间资本成长方式与未来走势的**最新解读**◎
- ◎一部为民间投资者拨开迷雾、指明市场发展规律的**投资指南**
- ◎一部首度全面剖析神秘“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真相的**普及读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7500亿民间资本的前世今生 ·

KANBUDONGDE
WENZHOUZIBEN

周德文 编著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跟温州人学投资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懂的温州资本——跟温州人学投资 / 周德文编著.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80249 - 576 - 0

I. ①看… II. ①周… III. ①私营经济—投资—研究
—温州市 IV. ①F127. 553②F121.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3657 号

看不懂的温州资本——跟温州人学投资

编 著: 周德文

责任编辑: 李红霞 邵桃炜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责任审读: 郭敬梅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丰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9 - 576 - 0

定 价: 32.00 元

服务热线: 010 - 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 - 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 - 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jcb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 - 58302915

序言

徘徊与出路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

当晚10点半，我的手机上有38个未接来电。

未接，不是我不想接，而是来不及接听。“新36条”刚发布，很多温州的企业家朋友就急着打电话给我，咨询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一直以来，以草根姿态登上经济舞台的温州民间资本逐利而居，将整个中国经济“搅”得风生水起。

20世纪80年代，温州几乎家家户户以个体经营形式从事加工制造业；到90年代末，在个体加工的基础上，温州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生产的打火机、眼镜、小五金、阀门和皮鞋等产品，占据了全国甚至世界市场的重要份额。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利润逐步降低到5%左右，温州的资金开始向房地产等利润超过25%的增长行业转移。

在全国庞大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民间资本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占据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着霸主地位。因而，温州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近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然没有涵盖温州资本的所有投资领域，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能勾勒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

温州资本出没于每个可能带来高回报，同时也蕴涵高风险的地方。但经济形势和政策之水，既有能力将其变为寸土寸金的聚宝盆，也可以将其变为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在经济发展以速度为首选、经济秩序尚不规范时，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式无可厚非，也能得到意料中的收获。而当一切渐渐走上正轨，如果再继续延续此前的做法，可能就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损失。

在过去一年中，以往冲劲十足的海量温州民间资本遭遇了空前危机：海外，温州资本被套迪拜等地产投资，俄罗斯“灰色清关”让巨额温州资本折戟；国内，山西煤矿让此前参与煤矿投资的温州资本如陷深渊，而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温州购房团也遭遇当头棒喝。

重重打击之下，大量温州民间资本倍感“寂寞”与“急躁”，一时找不到新的投资出口，处于徘徊、观望和等待的状态。

2010年5月15日，温州市举行了一场资本与项目的对接会，场面异常火爆。两个路演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便道上也站满了投资者。除一些专业投资机构代表外，从外在形象上判断，更多的参会者像是一些小企业主。“温州人喜欢投资看得着的东西，以前对股权投资之类都不感兴趣，今天来这么多人，估计是大家都着急找新的投资渠道。”一位对股权投资并不熟悉，却依然前来了解情况的参会者表示。

“新36条”的出台，无疑是温州民间资本在迷惘期听到的一声

春雷，或许可以给民间资本指出一条出路，抑或是一个适时的引导。

“新 36 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诸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并鼓励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毫无疑问，“新 36 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了众多领域，提振了民间资本对外投资的热情。但是，这些领域的一些项目多是资金密集型，并不是一两家民企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因此，我建议，想要搭乘“新 36 条”东风的企业要事先练好内功，搭建联合平台，做足准备，以便细则一出来就可以抓住机会进入。

最近，国家石油储备中心公布了“利用社会库容存储国储油资格项目”入选名单，浙江有 3 家民营企业中标。这是“新 36 条”公布后首次有民营企业获得国家石油储备资格。但愿这是第一波，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民资闯入这些原先的禁区。

卢森堡在《狱中书简》中的话让人感动，“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中，东方涌现出一抹巨大的、美丽得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摆脱一切，独自浮现在天际，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这抹玫瑰色的云彩，或许就是“新 36 条”在温州民间资本眼中呈现的色彩。

目录

Contents

■ 序言：徘徊与出路	/1
■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1
温州资本的秘密	/3
资本内核的海量扩散	/7
温州资本“原罪”论	/12
谁是真正的资本操盘手	/17
■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21
敢为天下先——吃螃蟹战略	/23
天生敏锐的市场嗅觉	/27
迎合政策的风向	/31
“人格化”集合	/34
“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37
保护伞：政府、协会与商会	/41
■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45
资本与“温州模式”：谁是鸡，谁是蛋	/47
突破“资源禀赋匮乏”的天花板	/50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 谁逼迫资本逃离“温州模式” /54
- “温州模式”不会消亡 /58
- 戴金脚镣，跳“品牌”舞 /62
- 第四章 与资本市场接轨 /67
 - 商业悖论：闲钱多，融资难 /69
 - 新曙光：创业板破茧而出 /72
 - 从股市绝缘体到炒股大军 /77
 - 花样百出的炒股团 /81
- 第五章 打破金融玻璃门 /87
 - 私人钱庄风生水起 /89
 - 游走在“灰色地带” /93
 - 沐浴政策漏下的阳光 /96
 - 小贷难疏资本洪流 /103
 - 谁能“招安”民间资本 /107
-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111
 - 拓荒者的姿态：四海为家 /113
 - 项目饥渴症：从棉花、油井到黄金 /116
 - 投资棉花做成“实业” /117
 - 投资油井的夹缝求生 /118
 - 危机下的黄金热 /120
 - 跑马圈地：东南飞，中突，西进 /122
 - 温州资本上演“东南飞” /122
 - 温州资本突围中部 /125
 - 温州资本挺进西部 /127
 - 温州创投：投资风向标 /128
- 第七章 炒煤团：暗淡退场 /133

温州的“煤老板”	/135
“被收购”，没商量	/139
折戟于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143
民间资本何去何从	/146
■ 第八章 炒房团：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149
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151
炒资：何处来，何处去	/155
温州的“炒房娘子军”	/160
“炒房”论道：有张有弛	/163
房市“狼来了”的真相	/166
■ 第九章 宿命下的成长天花板	/169
先天的草根弱势	/171
还能打多少“擦边球”	/174
财务杠杆越长，风险越大	/176
难以走出“围城现象”	/179
资本整合的牵绊：“宁为鸡头，不当凤尾”	/183
■ 第十章 未来：一道与繁荣有关的资本命题	/187
在“新 36 条”中争取生存空间	/189
一只脚踏向世界	/192
整合资本的队伍	/195
谋求转型，与“新”有关	/197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一章]

7500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温州资本的秘密

资本是什么，经济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始终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之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则温和很多：“资本就是为了生产用途而积累起来的资产储备。”

无论如何，资本总是逐利的，其存在与活动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资本，这一原则没有改变，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中国资本。而且，凡是资本，总要经过原始积累阶段，无论这个阶段中是否充满血腥与所谓的压迫，这一点难以被抹杀。

因此，只要是资本，总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也总有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秘密。而在中国，温州资本是一个颇具诱惑力却又让人看不透的名词。

放眼中国，温州不是一个资源大市，而这片土地上的温州人却被冠以“中国犹太人”之称，温州人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总是能先人一步捕捉到财富增值的先机。因此，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的温州却积累了令人心跳加速的资本。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积累，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本已经达到 7500 亿元至 8000 亿元。^①

这些资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银行储蓄，截至 2009 年底，温州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 4244 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有 3000 亿元。这甚至超过了山西省

^① 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温州市 2009 年 1~5 月份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 7390.36 亿元。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09 年的 GDP 总量。

早在 2006 年，温州可流动资本就已达 5000 多亿元人民币，当时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温州人手里的现金可以买下两个江西（2006 年江西国民生产总值为 2830 亿元），可以整体收购中部相对发达的四川和重庆（其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2250 亿元和 5456 亿元），可以操纵上海（2003 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 6250 亿元）……如果将国内外温州人的固定资产及投资，再加上贷款，温州人可以筹集到的资金约有 17 万亿元，这笔资金可以“买下整个中国”（2004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136515 亿元）。

“买下整个中国”之说，固然带有“戏说”的色彩，其中不免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温州资本数量之庞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温州民间资本的海量：每年春节前后的 10 天，在外投资的温州人有 30 亿元资金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过年”，平均每天多达 3 亿元。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其身上所负载的特殊意义，以及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征，赋予了它强大的影响力。如此海量的温州资本，在很多人眼中是可怕的，其“可怕”首先在于他们对市场、对政策天生的敏锐嗅觉，自 2001 年以来，温州资本频繁出入房地产、煤矿、棉花、小水电、石油等行业与领域，而且收入颇丰；其次在于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利益驱动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他们总是能够迅速抢占市场先机，当别人准备亦步亦趋地跟进时，他们已经开始向新领域进军。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可怕”是可敬的另一种解释，人们并不是“害怕”温州资本，而是惊诧于其敏锐的视角以及光速的爆发力。温州资本在数个行业领域闪转腾挪进行投资，就发生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是温州人用自己千辛万苦挣来的钱“轻轻松松生出钱来”。相比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之下，温州资本不为人知的原始积累阶段，却更能体现温州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温州模式建立的过程体现。在这一过程中，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使用千方百计，才换来辛苦钱。而这其中正蕴藏着温州资本的秘密。

首先，温州资本经过长期的积累。

与其他地区的民营资本在短短数年间迅速崛起不同，温州资本是经过长期积累而成，漫长的资本积累与成长过程中洋溢着温州平民创业的精神。

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企业的发展步步稳扎稳打，并未创造过一战成名的商业奇迹，当然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浮躁，只是持续地成长着。无论是正泰、德力西，还是奥康、长城等，都经历了一条平稳发展的成长历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贩，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从补鞋起家，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从做“木匠活”开始，庄吉集团董事长陈敏从经营裁缝铺迈步……

温州企业从小做起，逐渐积累，延续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条十分平稳的发展路线，很多温州企业的创业与成长史至少在 10 年以上。而随着资本市场的起步，近年来，中国经济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与这些巨型资本相比，温州资本似乎成长得有些缓慢，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资本寿星”。

其次，注重依靠集体资本。

温州资本的特色之处，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于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在温州，有民间筹款经商的传统，这可以追溯到温州各类的“会”，因此，对于有创业之心却缺乏资金的人来说，只要有诚信且创业项目可定，就可以在温州找到起步资金。这也是温州民营企业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资产负债率低的原因之一，因此，很多温州企业家总是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不缺钱”，很少有温州人会向银行借钱，他们对于企业上市融资的愿望也并不强烈。

温州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老太太银行”，在某些村子里，一些人被公认为资金周转人，谁手里有闲钱，会先向他们“登记”。如果有人做生意要借钱，当确认没有太大风险后，周转人就会将“登记人”的钱借给他，短短几个小时就能筹集到数百万元，而这数百万元资金的控制者，正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人。

再次，温州资本以制造为本。

尽管温州不止一次发生过诸如“抬会”等资金风波，但温州资本从开始积累之初，并不是资本市场上典型的投资者，而是与制造业关系紧密。

扫描温州资本的产业脉动轨迹不难发现，制造业构成了其胚胎发育和成长的最肥沃和最典型的窠臼。以德力西、正泰等温州企业为例，尽管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并购扩张，并尝试多元化经营，但基本仍以制造业为基础。尽管温州市场建设全国闻名，但与义乌小商品市场靠倒卖外地商品不同，支撑温州市场的基石是温州制造的产品，温州制造的小商品发展到专业化的程度之后，才形成专业化市场。

从某种程度而言，温州制造培育了温州资本，而温州资本的壮大又强化了温州制造的力量，从而造就了温州“国际轻工业城市”的称号。在温州产值中占了三分之二的轻工产品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巨人企业：

服装：报喜鸟、庄吉、美特斯·邦威等。其中报喜鸟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庄吉和美特斯·邦威年销售收入均达9亿元。

制鞋：康奈、红蜻蜓等。两者均获得了中国鞋业最高荣誉——

“中国名牌”的称号；同时，红蜻蜓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电器：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其中正泰的年产值达 121 亿元，销售收入达 119 亿元，德力西主营业收入达 80 多亿元，出口创汇 2600 万美元。

乳业：均瑶。现已形成以航空服务业为基础，乳品业为核心，兼营酒店、旅游和房地产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打火机：大虎、日丰、胜利等。他们年产打火机 5 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80%，国内市场的 95%。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其实，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民营资本的缩影。从 1978 年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呈现出一种不可重复性，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而温州人就是这群小人物中的一支，温州资本的秘密就蕴藏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资本内核的海量扩散

在《女人聚财》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卡恩站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面，目不暇接地看着形形色色的商品。他身旁有一个穿戴很体面的绅士，站在那里抽着雪茄。卡恩恭敬地对绅士说：

“您的雪茄很香，好像不便宜吧？”

“两美元一支！”

“好家伙……您一天抽多少呀？”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10支。”

“天哪！您抽多久了？”

“40年前就抽上了！”

“您仔细算算，要是不抽烟的话，那些钱都可以买下这家百货公司了！”

“这么说，您也抽烟？”

“我才不抽呢。”

“那么，您买下这家百货公司了吗？”

“没有。”

“告诉你，这家百货公司就是我的。”

这则故事告诉人们：钱是靠钱生出来的！

2009年，温州民间流动资本规模达到7500亿元，较10年前的2000亿元增加了5000多亿元。10年增值5000亿元，是温州资本把握了全国产业投资的趋势并积极运作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下，智慧与勤劳并存的温州人乘着机遇，搭上改革的头班车，从做皮鞋等商品起家，勤勤恳恳，在积累资本上不遗余力。此后，随着资本的壮大，又开始积极投资煤矿、房地产等行业，同时还展开活跃的海外创业。

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走过来，囊中饱满的温州人却无法改变自己眼前的事实，即当地资源的匮乏。温州是中国土地资源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仅如此，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服装、制鞋、电器、打火机等产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此类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出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导致资本扩张的边际成本增加。

此外，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困惑，也困扰着温州企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业。当传统制造业进入微利时代，温州企业却恰巧遭遇了资源禀赋的强烈约束，触碰到传统行业利润的天花板。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打拼多年的温州人，并没有失去对资本力量的信任，他们深谙“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于是，敢闯敢干的温州商人携巨款从故乡出发，如飞瀑倾泻般奔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找资本渗透的缝隙。他们出手阔绰，并善于抱团，使得其所涉及的地区与行业总是能够深刻感受到这股民间资本的巨大冲击力。由此，温州资本开始以滚雪球之势迅速膨胀，笑傲江湖。

纵观温州资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清其内核扩散的基本脉络，即从家庭作坊，到家族企业，到股份制模式，再到现在的温州资本全国化和全球化发展。

首先，随着家庭作坊的出现，温州资本开始成型。

温州民营经济的起点就是家庭作坊，温州现在很多大企业是由此发展而来，原始资本也是由此开始积累的。

提及世界打火机行业，占据全球 80% 左右市场的温州不能被忽视。而在温州所有的打火机企业中，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的公司数一数二，年产打火机约 1500 万只，价值在 2 亿元左右。大虎公司就是由一家组装打火机的家庭作坊发展而来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结束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周大虎顶替母亲进入温州当地邮电部门工作。80 年代末，周大虎被调到邮政局为解决系统内家属就业成立的服务公司，当时的他满怀雄心，决心要大干一场，让公司里的人拿到和正式工人一样的待遇。巧合的是，当这一目标实现后，在 90 年代国企改革重组背景下，周大虎的妻子下岗了。仅仅依靠周大虎一个人的工资不能支撑一个家庭，周大虎于是考虑时机下海经商。

在当时的温州，打火机零部件生产厂家数量众多，只要投入少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量资金就可以生产打火机。于是，1991年，用妻子下岗得来的5000元安置费，周大虎开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打火机生产：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当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的丰厚后，1992年周大虎租下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正式开始创业。

其次，家庭企业是资本内核扩散的主要力量。

家庭作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家族企业的大量出现，这是家庭资本向外扩展的一种自然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在考察温州后，在赞不绝口的同时，也扔下一句话“尽快建立大企业集团”，还有人预言“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10%”。然而，事实却给了他们有力的回击——温州经济年增长率为20%，其中，99%的温州企业为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而一些集团企业却陷入僵局。

目前，公司产值42亿元，被评为全国第七大民企的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就直言不讳自己是家族企业的创始人：10个股东占50%的股份，自己占有27%，5个副总裁有3个是亲戚，2个是负责技术的朋友。对此，南存辉并不急于改变，他认为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不一定是家族式管理企业，而不是家族成员控制的企业也可能是家族式管理的企业。

家族企业的形式，可以让温州资本不必经过烦琐的论证与表决，出于对家族成员的信任，在短时间内就可作出决策，以便尽快对市场做出反应，最终能够在大量筛选中找到最适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调查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温州家族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是投入10元产出1元。

这种完全由市场利润牵引的家族企业，为温州资本的扩散奠定了长远的基础。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再次，股份制企业模式，让温州资本的形态呈现现代化之势。

毫无疑问，家族企业的目的直指尽快赚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即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后，家族式管理的成功因素会发生转化，转化为企业发展的障碍，这钳制了温州资本的扩散。

为此，很多温州家族企业开始探索股份制模式，而这一现代化元素的引进，也将温州推上了现代化之路。

数字是有力的证明。在温州乐清市，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股份制经济比例占到 70% 以上，股份制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85%。股份制经济，给乐清工业的资本带来了“一片艳阳天”：1997 年 1~7 月，乐清全市实现工业产值 92.6 亿元，与 1996 年同期相比增长 23%，其中，股份制工业产值为 78.71 亿元；各类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37.6 亿元，其中股份制企业为 33.16 亿元，占总量的 88.2%。

在股份制企业中，大量的消费资金被转化为生产资金。资本持有者成为企业股东，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将手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投入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即“集百家钱财，富一方经济”。据资料表明，在柳市镇 1200 多家股份合作企业中，50% 以上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当地居民的闲散资金，有些企业甚至达到 90% 以上。

最后，温州资本的全国化以及国际化，使其内核无限倍扩散。

从诞生之初，温州企业就与全国市场紧密相连，温州人很早就四海为家，在全国各地谋求发展良机。他们在全国各地构筑了庞大的温州产品市场销售网络，在当地落地生根创办实业，建立在外温州商会组织，一系列“温州城”、“温州贸易中心”、“温州村”等以温州为主的商业组织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密集出现。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此外，随着温州资本的壮大，向外流动的不再仅限于商品和人员，还有越来越多的资本。2002年9月，温州资本集体下注巴中和自贡，35个温州老板与这两个城市签下35单投资意向，共投下15亿元，涉及工业、农业、教育、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在苏州娄葑镇的招商会上，温州企业当场签下7个项目，投资资金多达2亿元……

资本的扩张是没有疆域的，也不会轻易停下脚步，温州资本一条腿踏在国内开疆拓土的基壤上，另一条腿还迈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正泰的资本全球化战略已经从美国硅谷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开始，德力西也实施了目标明确的全球化战略，立志成为世界电器巨头……

将产品销往国外，已经不足以描述温州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更高层次的战略则是开始思考如何整合全球资源。

温州资本“原罪”论

所谓“原罪”，原意是西方人信奉的一种教义，指的是人生下来就有洗脱不掉的“罪行”。而企业的“原罪”，往往集中表现在企业壮大之初的第一桶金的获得方式上。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如此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仅仅用“有”还是“没有”所能讲清楚。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

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由此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资本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与人的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就会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都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甚至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细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使，都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选择脚踏实地，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行程弥坚，与那些走私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的商贩相比，其风向更健康、积极，坚持得也更为长久。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的确很聪明，他们即使身为草芥，还不风光，就学会了高瞻远瞩，跨出温州的门槛，把外界资源运用得如鱼得水。当然，哪里资源丰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哪里。

1979 年 3 月 26 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甫一通航，李中方和李中坚兄弟就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向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始“打天下”。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的浮华与温州简直天壤之别，这种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最初，他们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里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在这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炼中，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中，李中方和李中坚凭借超强的毅力与精准的眼光，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机会。20 世纪 80 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如索尼电器、三洋收音机、双狮手表、花王洗涤、富士胶卷等，这些品牌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李氏兄弟最初选择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当时这是一个风险小且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他们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 100 万元港币，将原来的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贸易。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地不拘泥于温州地域，把温州商人从商之智慧、道德及狡黠带到中国的很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同样，中国的经济大潮也在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改革开放的浴火重生对整个中国新经济来说是洗礼，但对于民营企业 and 企业家来说却是炼狱——在三十年压缩的时间里要为中国经济补上资本主义市场两百年来优胜劣汰的环节。于是，在一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人情重于国法的封建大传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小传统的状态亟须被打破，残酷竞争、胜者为王的资本主义外来传统在正被引进的环境下，像层层枷锁套在了民营企业家的脖子上。如何呼吸，如何走路，成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他们面对世界时的第一个生存拷问。

没有过渡，没有诞生所需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出生便面临着残酷的生存考验。奔走于产业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家中不免有人利用关系，利用掌握的资源，利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体制下暂时的盲点，为生存铤而走险，鬼神之道来者不拒，把国有财产变为己有，打制度“擦边球”，甚至突破政策与法律的底线。于是，多个具体的经济人在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制度下，上演了一部部原罪蔓延的商业荒诞剧。

的确，很多民营企业家有原罪，但如果把原罪这顶帽子扣在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头上，也是片面和缺乏公正的。对原罪下定义乃至讨论它的外延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对待原罪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法律命题。

民营企业有原罪，但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国画讲究计黑当白，凡事不可走极端，以留有回旋的余地。一个制度大变迁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家更需要有在灰色空间中游走的智慧。所以，如果是历史、制度的错，再加上企业家彼时彼刻的盲目冲动与“群体性经营幼稚”造成了原罪，却让名声鹊起的企业家来埋单，未免太过残酷；所以，如果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试图“赶尽杀

绝”，这是社会集体理性思考能力的怠惰与经济市场的不幸。

对于温州资本，经济学家魏杰有这样一段表述：“温州资本是有活力的资本，我国的各类资本应向温州资本学习。要是在十几年前讲温州资本是我国资本的榜样，我们要向温州资本学习，会有很多非议，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温州资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活力。”

谁是真正的资本操盘手

资本的天性就是追逐高额利润，马克思曾这样形容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 10% 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 20%，就会活泼起来；有 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 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 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可见，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温州资本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投资空间，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正是资本的趋利性。

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温州资本的身影；而温州资本总是具备一种气场，能够将所到之处、所投入的领域，搅动得风生水起，令人侧目。这种威力，最初是从“家门口”开始的：1998 ~ 2001 年，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当地房地产，促使房地产价格以每年 20% 的速度递增，温州市区房价从 2000 元/平方米快速飙升到 7000 元/平方米以上。

1999 年，温州民间资本开始进驻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1 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内，投资在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就高达 2000 亿元。“温州炒房团”也由此诞生，此后，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飙升。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面对煤炭这一高投入产业，山西煤老板自有资金有限，温州资本于是找到了用武之地，浩浩荡荡涌向山西煤矿。当时，“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县市，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山西省有60%左右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根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产总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

其后的2003年，由于棉花减产，全国棉价上升，温州30亿元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新疆的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在次年获利退出；2003年，全国普遍出现“电荒”，几十亿元温州资本轻松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阵阵“红色热浪”；2006年，商品期货呈现“牛市”，温州资本开始将触角伸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资本涌向西部，大量收购油井……

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并未满足于在国内的东突西奔，还“插足”国际市场，在欧洲经营小百货，在美洲打造零售连锁巨头，甚至炒房炒到了迪拜。位于巴黎市三区的市长街和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生意人的地盘，如今却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街上汇集了温州人经营的服装、皮具、首饰等批发零售商店。

纵观温州资本的延续过程，似乎也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企业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资本迈开了集中和积累的脚步。但是资本投资是把“双刃剑”，其所携带的风险性不容忽视，特别是当资本的投资结果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变成投机时，风险就会随之而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血本无归。

第一章 7500 亿游资的原始积累

政策影响着经济发展，甚至会左右投资方向，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下，从 2005 年起，温州资本在房地产、煤矿、石油等领域相继遇到了瓶颈：2005 年底，国家对煤炭行业进行整治，对不达标小煤窑实行“关、停、并”政策，很多温州资本没有及时撤出，连老本都赔了进去；随着调控房地产的“国八条”出台，房地产价格应声而降，温州资本只能被逼撤出；介入石油行业时，温州资本也遇到了大量政策与法律障碍，徘徊在“出局”的边缘；即使是一直被看好的电力产业，也没有实现“回报稳定、利润高”的预期……

对此，一些温州民营企业企业家大吐苦水：“最怕的不是投资的风险，投资的风险还有能力承担，温州人最怕的是政策的风险。”

即便如此，在投资中成长并壮大的温州资本，也没有停止继续扩散的步伐，在山西煤改被套牢 500 亿元、迪拜危机缩水 20 亿元、俄罗斯打击“灰色清关”中损失 70 亿~80 亿元的情形下，他们仍然计划着下一步的投资，还谋划着进军海外市场。2010 年 3 月，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组织过一个前往迪拜的考察团，报名的企业与个人有 30 多家。

越挫越勇，让温州资本踏上新的征程，不过，这也正是温州资本得以海量扩散的深层原因之一。温州资本既不放过任何一个财富增值的机会，也不会在某次或几次投资失利后退却或停止脚步，让利润充当其运作背后的引导力量，指引其不断寻找更丰厚的投资领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敢为天下先——吃螃蟹战略

从资源到资本，仅一字之差，但要完成这一“跳”，除了历史所给予的机遇外，往往还需要领航者具有超常的勇气和胆识。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是当市场大门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无理性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

众多的“全国第一”在温州诞生：第一份个体户工商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第一个境外中华商城……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阳光和雨露播撒神州，在别人还将市场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温州人早已经如鱼得水，凭借着敢为人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市场禀赋，在一片天地里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

1981年，温州市区铁井栏创办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随后，各类商贸市场在温州城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满足着温州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截至2008年，全市共拥有商品交易市场445个，其中中年成交额超亿元以上的市场有67个。

1983年，全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桥头纽扣市场开业。随后，柳市低压电器市场、金乡徽章标牌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崛起，一个更广义上的温州市场开创之旅华尔揭幕。

温州商人，在一个纽扣、一个开关这些最不显眼处，魔术般地

看出了商业利润的“生长点”，白手起家，以小搏大，迅速形成立足温州、辐射全国的市场格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温州成了全国“拷贝”市场经济富民路径的榜样。

“八大王”即是其中的典型。“文革”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门市部独立经营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每月只需向厂里缴纳30元管理费。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仅有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等生意。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在起步时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五金产品供求渠道不畅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已经达到1个亿。

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辩证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能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创业之初他们注定不显山不露水，鲜为人知。而同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理直气壮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十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高的10个门市部，其10位负责人则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

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十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看来，“八大王”的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已经迈开，温州人开始走出温州，散落到各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此时，蕴藏于他们血液中的敢想敢做的基因，更是被激发出来。

20世纪80年代，头脑灵活的温州人开始放眼全国、寻找商机，长沙是其中一个主要基地。1989年春节前夕，因为忙于推销五金和印刷制品，王均瑶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无奈之下，与同乡商量之后，大家以两倍的价格包了一辆豪华大巴回家。当汽车在1200公里的山路中颠簸前行时，大家都产生筋疲力尽之感。此时，王均瑶随口感叹一句：“汽车太慢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边一个老乡挖苦道：“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

“土地可以承包，汽车可以承包，为什么飞机不能承包？”当王均瑶提出疑问时，立即招来众人讥笑。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王均瑶确实有痴人说梦之嫌：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坐飞机还是个奢侈的梦想，因为机票的购买需要团级以上政府部门的证明！

想别人之未想，而且敢想敢做，向来是第一个吃螃蟹之人的特质，如果再具备相应的执著，成功就会随之而来。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让原本只想争口气的王均瑶，也看到了市场前景的广阔。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经过八九个月的走访、市场调查和与有关部门的沟通，24岁的“小个头”王均瑶带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的证明，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在嘴皮即将磨破、盖了 100 多个图章之后，壁垒森严、从未向民企开启过的中国民航系统大门，硬是被王均瑶撬开了一条缝。1991 年 7 月 28 日，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年仅 25 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

“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个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变了！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那一天，作为一名演员，我面试合格，被允许登上舞台。接下来，我要努力的是把戏演得更好……”每次提及自己当年的壮举，王均瑶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 20 万元的利润之余，还为他赢得了“胆大包天”的个人品牌。乘胜追击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小富即安则只能沦为常人，王均瑶继而一口气承包下全国 400 多个航班，并在 1992 年成立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由此，王均瑶这个名字与曝光率极高的民航业联系在一起，国外新闻媒体称此举为“中国民航扩大对外开放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对他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在以后的数年间，王均瑶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开创了众多中国民航业的“第一”。2002 年王均瑶集团以 18% 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责任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的民营企业，2003 年又投巨资购买和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在从事包机业务 11 年之后，王均瑶由在民航外打转，开始真正进入航空领域的核心。

王均瑶包飞机的想法，是温州“敢为天下先”最出彩的范本。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最初源于脱离颠沛之感，当然，也不可排除他看出了民营航空的发展机遇。但想法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一种思想运动，如果不付诸行动，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如果有了一种新奇想法，就必须用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去实施，这样才能第一个吃到螃蟹，否则不仅可能吃不到，还有被螃蟹钳子夹住的危险。

无独有偶，受王均瑶“胆大包天”的启发，出现了更多的“胆大”的温州人：

1995年11月，乐清市南塘农民黄永斌投资500多万元独资建造海塘，回报是塘内的1000亩盐田和海涂无偿使用23年。

1997年3月，一个叫王荣森的温州女人与延安地区甘泉县签订了联合勘探石油的合同书，投资450万元完成三口勘探井，全部出油，因而获得了30口油井的开采权。

1998年底，永嘉青年季展敏等人在公开投标中，联手以518万元的价格竞标，和永嘉县农业局签订楠溪江流域的承包合同，被称为“中国第一包江人”。

2001年下半年，乐清市种粮大户陈定友、张少林等24位农民携带数百万元资金飞往黑龙江，与黑龙江农垦部门签订了6.3万亩粮田为期30年的承包合同，在北大荒建立了温州的“市外粮仓”。

.....

潮起潮落是自然与社会的变迁，当初的勇立潮头者，有些依旧在，有些却已经销声匿迹。但无论如何，他们堪称英雄，用无畏与创新，打破了计划经济僵化的框架，让市场经济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也为今日温州资本的雄厚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

天生敏锐的市场嗅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刚刚在大庆发现油田，国内期刊《中

看不懂的



国画报》上就刊登了铁人王进喜在油井现场工作的照片。当看到这幅画报时，日本人从王铁人头戴皮帽以及周围的景象中，推断出我国油田大概地处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地区，约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

后来，《人民中国》杂志在介绍王铁人的文章中提到了马家窑，并提到钻机是人推和肩扛到现场。据此，日本人又推断出我国的油田距离车站不远，还从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地方。

再后来，日本人对《中国画报》上刊登的一张炼油厂照片进行研究，照片上虽然没有尺寸，但有一个扶手栏杆。根据扶手栏杆高度应该在一米左右的常识，日本人依据比例推算出炼油塔的内径、炼油能力，并估算出了当时我国油田的年总产量。

仅仅由一顶皮帽和一个扶手栏杆，日本人就推导出了极为机密的商业情报，并开始与我国进行售卖炼油设备的谈判，这种敏锐的判断力不得不让人佩服。

而这种敏锐的嗅觉，正是商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在中国，温州商人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他们总能捕捉到别人视而不见的商机。有这样一种说法：温州人的每根头发都像是一根天线，随时随地捕捉外来的商机。这种评价一点也不为过。

以“胆大包天”闻名的均瑶集团老总王均瑶就善于从小事中捕捉商机。“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战略决策的准确与否，但眼光能够看多远往往取决于他对信息的捕捉能力和悟性。”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的成功之道，还说出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1992年，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的朱厂长，不再满足于仅限于本地的生产经营，踏上了去上海寻找新商机的道路。

凭借多年的经营经验，朱厂长领悟到一条从商之道，即“只要是人群密集之处，就一定有财神爷微笑”。到上海几天后，他来到热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闹非凡的“大世界”，看到很多视时间如生命的人却在排着长队购买糖炒栗子。而且，上海人在购买到栗子后，会迫不及待地品尝，很多人用牙咬破栗壳，吃相既不雅观，又难以品尝到完整的栗子。

于是，一个崭新的想法在朱厂长的脑海中产生：何不生产一种能剥离栗壳的“剥栗器”呢？有了想法就要尽快付诸实践，朱厂长立即开始了剥栗器草图的绘制，图纸完成后，朱厂长赶回温州，三天内就生产出数万只剥栗器，并将其运往上海，请食品店代销。

一个产业的兴起，往往会催生周边产业的兴起，这是发现商机的一条捷径，朱厂长就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果然，凡是购买糖炒栗子的上海人，见到这种既方便又廉价的剥栗器都会顺便购买一只。

就这样，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朱厂长找到了机械厂的“第二春”。而温州人不仅将眼光盯住国内市场，还对国际市场保持着极高的警觉性。

2002年，欧盟决定自1月1日起在欧盟各国开始正式流通新货币——欧元。对此消息，我国报纸进行公开发布，还刊登了一张欧元的照片。当时，很多企业管理者也看到了这一消息和照片，但都没有做出反应，将其视为一则普通的信息。

但是，经商眼光敏锐的温州人却从中看出了商机：他们发现，新货币欧元比欧盟各国此前使用的货币尺寸略大。由此变化温州人马上联想到，人们原来使用的皮夹肯定装不下新货币了。于是，温州人在第一时间内抓住了商机，生产出大批适合装新货币的精美皮夹，将其出口到欧盟各国。

新皮夹与欧元的尺寸恰好相匹配。当欧元开始流通过后，温州人量“货币”而造的皮夹自然备受青睐。由此，温州人又赚取了一笔财富。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项基本的素质就是善于在市场经济大潮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中把握商机。经济发展顺风顺水时，他可以抓住商机，同样，在金融危机来临等经济形式不乐观的时候，他也应该可以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商机。

在危机面前，女性的表现好像更为脆弱，与男性相比，女性对经济衰退的忧虑不仅仅是局限于只是少买一件衣服这样简单。有些应届女大学生不堪忍受就业压力而选择自杀；有些女白领为了躲避裁员压力选择“闪孕”。

但温州女老板却表现出坚韧的一面，在金融危机肆虐之下，仍然将生意打理得有声有色。26岁的沈小姐在温州纱帽河经营一家饰品店，当金融危机来临，她店内的生意渐渐露出颓势。“现在的顾客买东西都挑了，不像以前那么爽快了。”而且，与往年相比，客流量也缩减了很多。

针对这种情况，沈小姐店内开展了促销活动，只要是节日或周末，都会举办较大幅度的打折活动，如果是老顾客购买，还会有更优惠的活动。虽然单件商品的利润空间缩小，但遵循“薄利多销”原则，依然可以提升商店总的营业额。

沈小姐感受到金融危机风暴，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以敏锐的市场嗅觉，抵挡住了金融危机的进攻。而温州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刘，更是抓住金融危机中的机遇，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小刘2008年刚毕业，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外贸跟单。但金融危机来袭，外贸订单锐减，导致小刘第一份工作就“流年不利”。但在一次上网的时候，她发现很多女生为了省钱，在网上购物的频率增多，因此，她开始将精力转移到淘宝网上开设小店。她经营的网店不仅商品品种丰富，而且价格也较为低廉，因此受到众多大学生群体的喜爱。

在很多人面对金融危机唉声叹气时，小刘却调侃地说：“我还要

谢谢金融危机呢，让我既有钱赚，生活又轻松。”

与一家大企业相比，一个网店的分量自然轻微，但只要保持天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敢想敢做的精神，谁又敢保证，今天的小舢板不会成为明天的豪华游轮呢！

迎合政策的风向

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商机。有时候，企业成功与否，就看你能不能在细微的政策变化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商机。

温州人向来以靠近市场著称，但靠近市场并不代表远离政策，温州人深谙怎样迎合政策风向去投资，而且还可以跟随着政策的变化寻找到新的商机。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一部分土地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在耐心等待政策的出台。此时，在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男子如同勘测员一般在东张西望。整整五天，他们的搜索范围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

随后，他们回到了温州，仅仅两天之后，他们提着装有65万元人民币的蛇皮袋重新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上海人以为两位温州人想得到沿马路的门面，却没有想到他们的目标竟然是浦东严桥乡距离杨高路30米远的一间仓库。

精明的上海人为他们的选择纳闷，而温州人自己心里却有数。根据掌握的信息，两位温州人认为杨高路注定要改造，改造的结果必是6车道或8车道，到那时马路拓宽，这间仓库里就蕴藏着一笔大财富。

经过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两位温州人与上海方面达成协议：上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将仓库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之后，收入二八分成，5年内不变。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温州人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在杨高路上留下了足迹。很快，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而两位温州人承建的出租房，其价值自然水涨船高。

要成功地抓住机遇，不能光看眼前利益，还要有长远的眼光，看到今后的发展趋势，高瞻远瞩，走在别人的前头，从而做到先知先觉，达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境界，因而能从容面对每一个政策变化。

在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民营资本出生的软环境并不理想，也造就了其对政策的高度敏感性。

在温州，注意观察中央一级的政治风向，善于跟随变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温州本土最高级别的党政机关报《温州日报》是一份不靠国家机关征订，完全依靠自身发行量就能有较好市场收入的党报。

2006年，在全国房价一片唱跌声中，北京浙商商会副会长陈俊却看到了商业地产的机遇。他热衷于在政策变化中寻找商机，曾经带领60余名浙商精英北上投资。自2005年国家房地产实施宏观调控以来，面对政策变化的突然，他就意识到揣摩和迎合政策的重要性。此后，只要有重大政策出台，他都会仔细阅读并反复思考。

2006年5月29日，建设部等国家九部委联合颁布《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在对其分析后，陈俊得出以下四个有效信息：首先，九部委新政调控范围主要局限在住房领域，对商业等其他领域很少涉及；其次，调控重点是房产交易的过程；再次，从具体条款看来，这次新政的动作虽然很大，但毕竟房地产是

支柱产业，政策的效用是引导，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最后，国家不可能出台政策干涉商业地产发展，没有针对商业地产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于是，陈俊得出“新政将引导投资以商业为主”的结论，为保证收益，他建议将投资领域从“住房、商业并重”转向“以商业为主”。此后，各方面的反应更加印证了陈俊的分析：北京的地产开发商开始主动约见浙江投资团；丰台区政府召开座谈会，表示了对浙商扩大长线投资的欢迎；浙江投资团在考察吉林5县市投资项目时受到了极高的待遇。

看准了这一波房产调控的投资机会，陈俊带领浙商投资了“万年花城”、“明天第一城”等多个项目，最高获利达200%之多。

2008年，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控政策转向。陈俊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多个项目后，认为房价不会一直下降，最晚到2009年6月就会回暖，因此，得出推论：投资的最佳机会就在春节。事实情况的确如此，2008年底，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经过2008年中国房地产业的房价跳水和成交低迷等状况，也塑造了2009年房地产的“牛市”之后，浙商投资房地产又再一次获得极大的回报。

我们不能迷信政策，毕竟一个行业的兴衰最终不是由政策决定的。但如果不观察政策的风向，选择与政策违背的“逆风”方向发展，其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或者被刮进政策的汪洋大海中，奄奄一息。

看清时局并顺风而上者，往往是时代的胜者，而出身草根的温州资本，常会顺着政策的风向，利用政策的东风，将自己送上另一个高度。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人格化”集合

中国地域广大，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关于各个地方特色，有一则小故事：

外星人坐飞机来到地球，见到北京人，北京人问他：“你在你们星球是什么级别的？处级还是局级？”见到上海人，上海人觉得可以把外星人关在动物园里展览，赚些小钱。见到广东人，广东人觉得外星人长得很奇怪，认为用它来煲汤一定很好喝。见到温州人，温州人一张口就问：“你们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这原本是个笑话，但北京人的政治情结、上海人的利润情结、广东人的美食情结和温州人的商业情结，被展现得一览无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地方特色的烙印。一位美国学者曾经用三个“M”和一个“I”来总结温州人的成功。所谓三个“M”，指的是大众模仿和创造性、流动性和市场，而“I”指的是空隙。

凭借着先知先觉的市场意识，温州人很早就走出了温州，进入各地市场。当其他地方人们的市场意识还没有被激发出时，温州人就开始在市场上奋斗打拼。尽管开始之初，他们经营的内容多是缺乏技术含量的服装、鞋类商品。但当其他人开始要参与市场时，温州人却已经积累起一定的资本和市场经验。这就是温州人打的一种“空隙战”，也将“流动性”和“市场”进行了完美的演绎，在有限的时间差中，“抢占”到更多的市场与资本。

此外，温州人善于模仿，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创新。在商品生产之初，温州人善于模仿，“复制”相同商品是家常便饭。但在经营时，温州人并没有放松观察市场、观察新产品，一旦市场上有新产品出现，他们很快就会模仿并制造。但这种模仿制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造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温州人必做的选择就是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由此，现在的温州已经不再是模仿经济的“代言市”，而是一个品牌经济的“中国式典型”。

不可否认，这位美国学者对温州人进行了细致的概括。的确，温州经济的发展和温州资本的积累，是温州人“人格化”集合发展的结果。但三个“M”和一个“I”并不能囊括温州人成功的全部特质。以草根姿态生长的温州人与温州资本，还代表着一种吃苦耐劳的坚韧品质。

中国有句口头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创业阶段的温州人身上再合适不过。对于温州人的吃苦耐劳，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一篇书评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地球上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艰苦的工作，但似乎没有温州人干不了的工作。能吃苦，能耐劳，敢想敢闯，永远不满足现状，充满了幻想和冒险精神，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

作为一个非温州人，莫言对温州人的刻画却颇为深刻。的确，在温州，绝大部分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而其背后也都有一段段艰苦奋斗的过程。

巴黎第11区伏尔泰大道的一位温州黄姓企业家，在20岁时就来到法国，借住在亲戚家中。最初，并无特长的他只有学习针车，“每天坐在针车前十六七个钟头，累了就睡在针车旁边，醒来继续干活。我太太也一样。”

辛苦拼搏了七八年后，黄先生开始做代工，给客户“赶货”。由于缺少人手，他每天都要推着超市的手推车取货送货。在不取货送货的时间段中，黄先生还要暗无天日地赶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办下居留证。

拿到居留证以后，黄先生的梦想才从只有30多平方米的店面中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得以起飞，此后，他的事业渐渐走上轨道。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温州企业家的形象，他们自立自强，就像《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就不靠救世主”，以一种顽强的草根姿态，展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顽强。而在顽强姿态的背后，温州人的骨子里还流淌着诚信的血液。

在诚信方面，温州人有一个知耻而后勇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一个北方女青年为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产皮鞋。不料，这双皮鞋却在两天后的结婚宴席上开了帮，细看之后，才发现原来皮鞋里塞的全是马粪纸。愤怒之下，他们将劣质皮鞋寄给了当时的温州市市长。此后，温州又发生了性质类似的“柳市黑潮”和“火烧武陵门”事件，使温州人的市场信誉降到零点。

一时间，温州商品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人的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严酷的现实刺激着温州人的神经：假冒伪劣可能获得一时的富裕，但绝对不能维持长久的发展。痛定思痛之后，温州人毅然与失信的昨天告别，开始寻找曾经丢失的信用。

现在，在温州，如果一个人从银行借钱不还，无非就是打官司；而如果在民间借了钱不还，失去在民间的信用，他可能会无法找到立足之地。

2009年，国家宣布整治山西小煤矿之后，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团”中的“重灾区”，而小叶和小蔡则是“重灾个体”。在温州刮起“炒煤热”时，仅温州平阳县就有300亿元资金，流向山西，购下200多座煤矿。在这股风潮中，平阳县水头镇的小叶个人投资2000万元，另外附带着亲戚朋友集资的1000万元；小蔡则自己投了几百万元，还带来参股的几百万元。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如果发现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温州人就通过亲缘关系网络，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等，迅速调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动巨额民间资金。在这种高效运作模式下，让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在房产、石油、煤炭等利润丰厚产业中闪转腾挪。

具体有多少人参股他们的煤矿，小叶和小蔡也说不清楚。“这有点像传销，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元，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在分红时，大家彼此都不会去查账，就是因为信任。在这方面，温州人“拎得清”，谁也不愿意在这张“信用证”上留下污点，否则，将意味着他从这家“民间银行”中彻底出局。

就是因为彼此间的信任，忌惮失信之后的出局，才让小叶和小蔡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

将诚信视作生命，将吃苦耐劳的坚韧视为通往成功终点站的不可缺少的特质，温州人集合了这种“人格化”特质，将温州民营经济的草根特色演绎得更加深刻。

“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中国的温州人，如同欧洲的犹太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群体像温州人一样饱受无数眼球的关注。温州，已经不仅限于一个地理名词，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在这种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温州人从小就立下追求利润，做企业、当老板的目标，他们敢为人先，勇于白手起家，四海为家，向全国甚至世界的每个角落调动着资金与商品。在四处闯荡中，温州人牢牢占据着一些其他人不屑一顾的商业领域，在他们眼中，环境没有好坏之分，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是否能够赚到钱才是最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关键、最切中要害的部分。

在温州人看来，如果本钱过少，与其力不从心硬撑着面子做大买卖，还不如集中资本，从小处着手，倒可能会出奇制胜。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反映到温州经济发展上，就引申为：不要以为纽扣、鞋和包等都是小商品，只要做得好，小商品照样可以为企业带来大利润。

在温州之外的一些地方的人们看来，擦鞋这个职业有些上不了台面，为维护自己的自尊，人们宁可饥肠辘辘，也不愿意以擦鞋维生。如果实在被生活所迫，无计可施之下，人们可能会选择离家远一些且没有熟人所在的地方去帮人擦鞋。而温州人却不同，在温州，人人都很繁忙，既有做“大事”的大企业老总，也有做“小事”的作坊老板，也有在自家门前擦鞋的擦鞋匠。

温州人认为，擦鞋、看厕所挣钱不丢人，挣不到钱才真正丢人，为了不丢人而去擦鞋或看厕所，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此外，通过擦鞋和看厕所，还可以积累资金，为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文化，也是温州经济草根姿态的最鲜明体现。

而这种草根姿态，当然也与温州自然环境不优越，资源匮乏的现实情况有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先天条件的不利，造就了温州人勇于吃苦的精神，也造就了他们不拘泥于特定形式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大学门口，有一位面容秀丽的温州少女常年在那里补鞋。由于她补鞋技术好，且待人和气，很多大学生都愿意到她的摊位补鞋，并称她为“补鞋西施”。尽管她的摊位顾客络绎不绝，但有些大学生对这位“补鞋西施”的感觉，一半是不理解，一半是同情。

一天，一个帅气的大学生来到补鞋摊前，在她为自己补鞋时，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问道：“姑娘，你这么年轻，就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人家补鞋，不觉得难堪吗？”“补鞋西施”连头都没有抬，边忙着手中的活边回答：“挣钱呗！这有什么难堪的？破皮鞋穿在你们脚下，这才叫难堪呢！”听到这种聪明的回答，大学生一时语塞，但看着眼前既认真又快乐的“补鞋西施”，他又不解地问道：“你就这样补啊补啊，一直补下去吗？”

此时，这位补鞋少女忍不住笑了出来，抬头回答道：“一直补到人人都打赤脚为止！在我们温州，不能在家闲待着，都要出去闯世界，否则会被人瞧不起的。”对于这样的回答，大学生愣是半天没能接上话。

后来，这位美丽的温州“补鞋西施”依靠补鞋积累下的资金盘下了一家小店，经过后来的发展，如今她已经成为身价上千万元的女强人。

关于此类的温州人故事举不胜举。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摆摊修鞋，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是从裁缝做起……绝大部分温商并非一开始就经营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或从事着关系经济命脉的行业。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英雄莫问出处”的豪迈，更展现着温州人特有的经商眼光。

历史具有其公正性，虽然温州曾经是一块并不被自然和人们眷顾的角落，但历史给予其更多的勇气和智慧，让他们能够发现更多的机会，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或忽视的机会。

在温州，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温州人无禁则入。”具体解释为：“别的地方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温州是只要不明令禁止什么，我就做什么。赢了钱就是赢了最大的面子。”温州人将赚钱视为一种乐趣，通过赚钱的过程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而要赚钱就不能有太多顾虑，就要脸皮“厚起来”，追大的同时也要盯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小，只要有钱赚，一分钱的生意都不能错过。

充斥在全国市场上的修鞋机、爆米花机、芽菜机和擦鞋机等实用小机械，其最早的制造者不是在大工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东北人，也不是素有大商业传统的上海人，而是将眼光落到实处的温州人，他们走着小商品、大市场的道路，不怕赚钱少，就怕不去赚。

在很多人眼中，纽扣、标牌、标签等小饰品和小玩具，是人们看不起更懒得做的“小东西”，但是温州人却凭借这些“小东西”，发了“大财”，做成了全国最大规模，并形成辐射和影响全国的大型专业市场。

温州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就是一例。被称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东方的布鲁塞尔”的桥头镇纽扣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名扬天下。1994年，市场摊位就发展到4000多种，拥有各类纽扣品种多达2800多种，占国内销售总量的80%，市场交易额超过14亿元。

纽扣市场的崛起，还促进了桥头镇当地工业的发展，当地人充分利用了市场优势，以贸带工、工贸并进，工业生产得以快速发展。1997年，桥头镇全镇1600多家工业企业总产值22.1亿元，其中，纽扣工厂750多家，拉链工厂200多家，这些企业还组建了拉链集团公司和纽扣集团公司，开发了一个外资工业区和三个内资工业区，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并形成了纽扣、钟表、拉链等支柱产业，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小的纽扣，被桥头人演绎得如此神奇和精彩。现在，虽然在各种因素下，桥头纽扣市场不复往日的盛名，传统的温州专业市场也遭遇了新的“创伤”，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无形的温州人的专业市场还在流动着。

2008年5月，温州市政府对外公布了一组调查数据：利用遍布

全球的温州人网络，温州人年销售产品达 6650 亿元，相当于“华夏第一市”义乌小商品城 2007 年 348 亿元市场成交额的 19 倍之多。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现在温州专业市场的优势，已经被善于创新的温州人化为另一种优势。

但不管优势如何转化，温州人那种不怕吃苦，且能够抓住一切机会的草根经营精神和智慧，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这也是温州经济快速发展，温州资本得以迅速繁殖的原始驱动力。

保护伞：政府、协会与商会

以一种彻底的草根姿态，温州经济破土之后逐渐茁壮，以至现在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固然，这源于“草根”的坚韧，同时，还得益于其身后的一张保护伞——一张由温州政府、协会与商会共同编织的保护伞。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却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初期，经济政策还没有拨云见日，社会上还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经济发展形势处于不明朗的状况。令温州政府感到为难的是，对于温州人在商品经济方面的尝试，“上面”时不时会送来一个限制或打压的文件，而每当人心惶惶之际，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肯定。

面对这种状况，温州市政府开始学会“认不清”方向，逐渐发展为被动的“无为”。1984 年，对于平阳县钱库出现的私人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要求取缔。而出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温州市政府在人民银行总行拒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之后，并没有对钱庄实行强制取缔，而是争取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虽然在 1989 年，这家私人钱庄在无证经营 5 年后自行关闭，但在客观上，它的存在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滋润的土壤。温州市政府允许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理念的现象的存在，这种“无为”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胆量。此后，温州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中国首批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之初，温州市政府在政策上的表现恰当地把握了分寸，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助推。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温州政府还担任着“拨乱反正”的“有为”角色。20 世纪 80 年代末，温州产的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烧、南京的销售专柜被愤怒的消费者捣毁、永嘉虚假广告、苍南的假商标印刷等事件，让温州一度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对此，1990 年 3 月，国务院明确要求查处乐清的无证、伪劣低压电器。

面对降临到温州人头上的信誉危机，温州市政府开始果断出手。与一些地方政府对当地产品实行保护主义不同，温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运出温州的皮鞋、低压电器等商品实施准运证制度，将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外地的通道堵住。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还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首先制定有关质量方面的地方性法规。1992 年，温州市政府还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使得温州商品的声誉得以恢复。

在“第二次创业”中，温州市政府整顿地方经济秩序的大规模行动，也为温州商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之，民间商会蓬勃兴起。而 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体制的转型，更使得温州商会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第二章 彻底的草根姿态

其实，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会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清政府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批洋商品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当地的小商品和自然经济。为自保，一些行业协会开始出现，1906 年，温州府商会成立，自此，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揭开序幕。

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会更是承担起“二政府”的角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为温州企业撑起一片天空。

关于温州商会，有这样一个传言：很多人在见到政府官员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政府官员。当然，这只是一个传闻，却从侧面反映出商会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温州民营企业多是从事轻工制造业，但打火机、纽扣等商品技术门槛较低，产品的创新多体现在外观设计而不是技术创新。此外，这类产品更新速度迅速，在申请专利期间，往往为同行们所模仿。为此，温州烟具商会、纽扣商会等制定维权公约，为会员单位的新产品维权。温州烟具协会在成立后，就进行了近千起的维权活动，有效地打击了仿冒，促进创新的积极性。

温州商会不仅在国内为温州企业维权，在面对国际市场的“挑衅”时，也能充分团结本土企业，积极“应战”。其中的经典之作就是反击欧盟对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行动。

2002 年 6 月，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到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时，企业家一下子懵了，“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待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

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取得共识，让温州市烟具协会集结力量，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出面解决问题。之后，企业家开始为请专家、律师以及启动资金筹钱捐款，商会选择了要价最高的一位国外律师。温州烟具协会会长李坚等3人，在外经贸部有关官员的陪同下，日夜兼程游说欧盟各成员国的标准化组织，还与欧洲打火机进口商进行多次会谈。在多种努力之下，一年之后，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以温州市烟具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在WTO的法律框架下，政府职能受到限制，而民营企业又如同一盘散沙，且个体能力有限，商会既能充分发挥沟通政府与企业的中介作用，又能作为主体组织企业参与应诉，起到了引导、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同时，这次由协会出面组织而取得的胜诉，也为温州打火机企业作了最佳宣传。由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知道了温州的打火机。

截至2007年4月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商会400余家，其中本市级行业商会131家。随着温州人奔赴全国各地或出国寻找商机，也会在当地建立商会。商会这张保护伞越撑越大，为温州民营经济撑起更多阴凉的同时，也能够为其最大面积地遮挡风雨，减少温州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不确定性。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资本与“温州模式”：谁是鸡，谁是蛋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温州经济迅速崛起，形成并创造了一种区域经济现象——温州模式。

1985 年 5 月 12 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专题《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了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在专稿和评论员文章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

所谓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在温州，小企业和小家庭作坊随处可见，由此，温州模式也被形容为“小狗经济”。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产品主要为大工业配套服务不同，也与广东模式注重利用外资发展不同，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式为，政府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无为者”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政府对民间的经济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将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而在温州，人们以超乎寻常的魄力与毅力，冲破制度和舆论等方面的藩篱，在温州这块相对自由的土地进行着自由创造，成为温州经济的脊梁。

在“温州模式”的快速发展中，民间资本是其肥沃的土壤，丰厚的民间资本孕育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在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 30% ~ 4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名为《温州金融业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显示，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约占全社会金融市场份额的 20%。在 20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世纪 90 年代中期，温州民间金融鼎盛时期，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增长甚至超过银行借贷。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在创办工厂时，常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即缺乏资金。银行借贷虽然是一条比较正规的大道，但无奈其高高在上的门槛容易让人望而却步。无奈之下，头脑灵活的温州人便开始动员亲朋好友，实行会员制，即创投的雏形，温州当地人称为“抬会”。

“抬会”是对温州一带民间金融活动的笼统性称呼，早在解放初期就在温州乐清城乡流行，只是当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其资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而随着“抬会”规模扩大，以及温州当地商业氛围的加重，“抬会”资金开始转向生产经营的投资。

1985 年，以“抬会”方式进入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 3 亿元，也成为当时民营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和来源，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为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徽章大王”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 1000 万元。”

在商业领域竞争，速度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撒手铜，与银行借贷要求高、手续烦琐等特点相比，温州民间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动性较强，对温州企业发展而言，其性质更像是一场“及时雨”。

对此，作家李涛有亲身体会。在一次乘中巴去温州的途中，由于车辆过多道路又比较狭窄，导致中巴车行驶缓慢。同车的有 20 个急着到温州把货卖掉的苍南人，但彼此间并不认识。为了赶时间，有人当即牵头，表示每人 20 元集资 400 元，当做罚款，让司机违章超车。于是，中巴车一路狂奔而去。当然，这种事情不足以效仿，但温州人的集资意识和做生意的速度却可见一斑。

至此，也能解释这样一个谜，即全国最大的参茸市场不在其产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地东北，而在偏远的苍南灵溪，价格比东北产地还便宜。

众所周知，参茸重量较轻，价格却高，温州人向东北人购买参茸后，回到温州本地以低于收购价 10% ~ 20% 销售。表面看起来，温州人的这种销售状态亏本无疑，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双方形成长期的供销关系后，东北人就会答应一年一结或半年一结，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里，温州人会将参茸迅速卖掉，立即换成现金，用这笔钱可以做 10 ~ 20 轮的生意，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填补参茸差价的亏损，还可以大有盈余。

正是因为温州的参茸售价低，才导致全国最大的参茸市场不在东北，反而在温州的苍南，这其中，苍南的民间资本市场功不可没。据此中人士透露：在 2000 年时，仅参茸市场规模就在“10 亿元到 20 亿元之间”。

然而，民间资本也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温州并不是一个先天就富裕的城市。温州资本之所以发展快速，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循。

首先，源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是经济现象得以发展的基础。温州经济主要是民营企业，伴随着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整体经济能量的累计，人们的原始积累已经充分实现。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民间资本的出现。

在财富的原始积累方面，温州企业家堪称“最会算计的商人”。在人际交往上，他们精于人情世故，主张堂堂正正的精明；在金钱应用上，他们主张将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经营成本锱铢必较，住便宜的房子，吃便宜的饭菜。但是，一旦看好一个经营项目，他们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大量的资金“砸”进去，以实现资本的效用最大化。

其次，源于财富的快速积累。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曾经创造了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8.6% 的“奇迹”，而后的 80 年代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以后的 20 多年里，保持了年平均 9.4% 的高速度，刷新着世界纪录，创造了更令人惊奇的经济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以 15% ~ 20% 的速度递增，“温州速度”成为经济发展的专用名词。

这种速度是由千千万万个温州民营企业所共同打造的。1984 年，南存辉创建的正泰集团还只是一家注册资金为 5 万元，年产值仅 1 万元的家庭作坊式企业。经过 20 年的发展，2004 年的正泰集团已经发展为员工 14500 人、总资产为 42 亿元、销售额为 119 亿元的大型集团。从 1997 年到 2001 年间，正泰的年销售收入水平与总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9.46% 和 32.23%，远远高于国内同类企业平均水平的 9.7% 和 6.5%。

在世界各地，和南存辉一样的温商比比皆是，和正泰集团类似的企业也不在少数。这样一群人和一群企业，构建成温州模式的大致雏形，也是温州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温州模式与资本究竟“谁是鸡，谁是蛋”，这应该是一个无解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的相辅相成关系，即资本可以帮助温州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同时，温州企业的发展又能增添更多的资本，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了温州模式的良性发展。

突破“资源禀赋匮乏”的天花板

作为中国改革试验的先行地区，温州与深圳、浦东一起，被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起跑者，同时也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创新之源。

但与深圳的经济特区身份、浦东的经济正统身份相比，温州经济发展却有着“先天不足”的弱势。在中国的浩瀚版图上，温州是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一个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主流文化之外。

温州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本“无字天书”：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温州曾经是战争前线，没有国家投资的积累，没有特区改革开放优惠政策，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但“无”也是资产，“无”就会有，穷则思变。

据权威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年仅2.83元。当时，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1/3，远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上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距离较远，温州的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

可以想见，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得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为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逐渐找到一条似有若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此后，温州人勇立潮头，掀起全民创业大浪，形成了十万家庭工厂、十万供销大军、十大专业市场，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更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

资料显示，1978年到2007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至2157亿元，增加了163倍，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99.5%。同时，藏富于民也是温州经济的特色，从1978年到2008年8月，温州全市居民存款从1.79亿元飙升到4036亿元，人均储蓄从8元提高到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4000 多元。

人们经常说温州人“天生会做生意”，“连头发都是空心的”。数量庞大的一个群体呈现着一种共同特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能够敏锐把握商机，具备机会感知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其次就是敢于行动，且以“行易知难”的知行观快捷知行，以弥补生产要素的不足乃至错误决策的损失。

前者是对稀缺性的判断，而后者则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兰发现，从根本上影响个人绩效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智商、技能或经验，而是诸如“成就动机”、“人际理解”和“团队影响力”等一些可被称为资质的东西。

而主动与否，则是预测绩效的众多胜任特征中的关键因素。主动，表现为一种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并不充足甚至匮乏的情况下，温州模式依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值得被记载的模式，足见温州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在温州的商业传奇中无不渗透着这“四千精神”。而“四千精神”也正是温州资本突破资源禀赋匮乏的瓶颈，实现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其中，“走出去”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词。在温州，不仅自然资源匮乏，而且因为当地人都颇有商业意识，导致当地的商业机会资源也较为有限。为冲破自然资源和商业机会资源两方面的限制，温州民营企业走出温州，利用全国各地资源，迅速发展壮大；并进而走出国门，利用世界资源，在探索中积累经验。

1980 年，年仅 20 岁的温州人郑月球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20 多天的旅途中，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终于踏

上了青藏高原，不料却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床上一连躺了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找活干。

当时的拉萨，满大街都是土房子，非常落后。但是，穷只是一种经济状况，也同时表明了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开始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5年。后来，郑月球创办了电器经销部。

当看到西藏牧民点的都是酥油灯和蜡烛，还没有通电后，郑月球嗅到了其中的商机，2000年，他成立了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门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在很多人看来，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地区经营才利于企业的成功，但温州人的想法却不同，他们同样重视落后贫穷的地方，认为这样的地方才容易找到市场缝隙。如果大家都窝在同一地方扎堆经营，市场很容易就会被瓜分，而到落后地方去经营，可能全部市场资源就会归你所有。正如西藏华建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飞所说的：“这里比较落后，信息闭塞，资源又缺乏，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地需要的东西，没有卖不掉的。”

为突破温州一地的限制，温州人不仅将眼光放在全国，还将触角伸到了世界。1995年5月，温州商人吴建海独自踏上了前往非洲的路程，他仅携带了几只皮箱和一本叫做《绝处逢生术》的书。

在此之前，吴建海一直在欧洲经商，事业相当成功，为了寻求更大的突破，他来到了喀麦隆，“经常听说喀麦隆是非洲一颗灿烂的明珠，到了那儿才发现，在喀麦隆杜阿拉市还没有中国商店。但中国货却很受当地人欢迎。”

于是，吴建海在当地成立了海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专门经销中国商品。凭借温州人吃苦耐劳的韧劲，吴建海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喀麦隆站稳了脚跟。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逢山开路，见水搭桥，温州人善于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因而构建了自己的商业世界，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资本王国。

谁逼迫资本逃离“温州模式”

曾经，温州资本与温州模式相辅相生，彼此之间分不清“谁是鸡、谁是蛋”，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幅温州经济发展的美丽画卷。而随着经济大势的不断演进，作为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温州的经济却呈现了“衰退”的征兆：GDP 增长速度在 2003 年上半年降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二，2003 年七八月时更是沦落到全省倒数第一。

与此数字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温州企业开始大量外迁。有数据显示，在外迁企业中，有较大知名度的企业就有 1000 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有 250 多家，直接到上海发展的已经超过 500 家。

而温州资本也开始出现外流，温州成为全国各地吸引民资的首选之地。仅 2003 年，全国就有 20 多个省、100 多个市县到温州招商。山东省组团去温州招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签”走 136 亿元；在 2004 年 4 月的“江苏无锡投资说明会”上，温州人又签下 70 亿元的大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冲在最前面的还是温州资本。

据温州市人民银行透露，1998～2003 年，温州市投资性资金外流超过 710 亿元；此外，根据全国 75 个城市统计推算，有 100 多万在外地的温州人累计投资 1760 亿元，创办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仅 2003 年就创造生产总值 828 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 GDP 的 68%。

再加上近年来风头比较强劲的“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等形式不同、内容不同但都是以温州资本为主体的投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温州资本逃离了温州模式。

首先，这是资本经营所需。

追求更高的收益，是资本的共同属性，而温州资本不再仅仅用于温州模式的扩大再生产，进行了对外扩张，则说明他们已经进入资本经营的阶段。

无论温州资本“流落”外地是经营企业还是“炒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还会源源不断被送回老家。每年春节前后的10天，在外投资的温州人有30亿元左右的资金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过年”。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温州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体验到了资本经营的快乐。

而用于经营的这部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增量”意义而不是“存量”意义上的外迁，即并非温州模式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本地资本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溢出效应。

其次，温州模式传统制造业的缺陷所致。

温州模式中，绝大部分为制造业，而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不断提高，利润的不断下滑，其最初的利润优势不复存在，这是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对当地传统制造业失去兴趣，积极退出并谋求转型的原因之一。

制造业毕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其局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点，使得尽管专业化分工程度与营销网络无可匹敌，但增长势头还是不可抑制地明显放缓。

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本来就非常有限，再加上温州的土地、能源等方面的制约，就逼迫企业和资本不得不换地方。

一位温州财团的负责人曾表示，一部分产业资本会通过搬迁工厂或产业升级的方式继续保留在制造业内，一部分产业资本则会脱离产业，流转于其他领域。当制造产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差时，产业资本还会继续脱离产业，只有当优胜劣汰的机制促使产业资本的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时，那些脱离产业的资本才会回到产业中去。

再次，温州资源的限制。

在温州地区，听到民营企业最多的抱怨就是土地太少、太贵，人才太少、太难招，这也与温州资本的外流不无关系。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温州，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日益尖锐。2002年，瑞安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温州当地的地价比黄金还贵，温州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每亩价格曾达到过25万元左右，远远超过上海郊区和苏南地区的地价。在昂贵的地价面前，面对成本的急剧膨胀，温州企业和资本只有将目光投向土地资源丰富且有优惠政策的外地。

此外，人才匮乏是制约温州企业发展，同时也导致企业和资本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温州毕竟只是一个地市级城市，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使得温州在服装、制鞋和工业电器行业出现了一批成功的民营企业。但企业的崛起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当地在教育、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不足。而企业的长久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人才，人才资源成为温州企业和温州资本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宽大绊脚石，绊脚石不好搬，就只好绕道而行。

于是，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分成两股力量，一股是继续投资实业，诸如电器、制鞋、打火机和制革等，这类企业也对战略进行了调整，即将工厂搬到西部资源丰富地区继续生产，或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另一股民资则投向煤炭、房产等。

但是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频出，投资的“灰色空间”越来越小，温州民间资本又尝试着转型，开始试水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等

领域。从投资实业到投资资本市场，这是温州资本投资模式的一次跨越和提升。

最近，据我的观察，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形式有四个比较明显的热点：

首先是金融业领域的投资。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小额贷款公司的兴起就是最好的证明。对此，温州人已经有所顿悟。

温州人有着敏锐的触觉，对相关主体金融类的投资也已经浮出水面，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温州本地和外地已涉足了此类投资。如以制鞋业起家的奥康集团，在温州本地进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业务之外，还在湖北黄冈投资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其次是能源类的投资。

矿产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进行此类投资风险较大，且成功率相对较低，而一旦成功，其回报则相当可观。

就我与温州当地企业家的接触感觉来看，温州顶级富豪基本上都涉足矿产投资，而且从原来的煤矿已经衍生到黄金、铜和镍等矿产资源类别。

再次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

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温州企业遭受了明显的打击与刺激。与之相比，深圳企业受影响则较小，原因在于深圳的产业结构布局中70%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占整体产业结构的比例却不到10%。

受到了这方面的警示，温州企业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从忽略开始转向重视。

最后是创投。

对于创业投资的相关投资，温州企业家的观念正在转变。2006

年3月，林阿信注册成立“首华创投”，作为第一家由温州民营企业成立的风险投资机构，首华创投孤零零地落户在上海。而2007年6月1日《有限合伙法》正式实施后，由乐清佑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胡旭苍发起的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即告成立。此后，创投开始在温州渐渐发展起来。

“温州模式”不会消亡

当温州资本渐渐逃离温州模式，同时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下，外贸交易量的持续萎缩、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利润的大幅缩水 and 仍然突出的融资难题，让身为中国民营经济晴雨表的温州中小企业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8年11月《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场危机正在温州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快速蔓延。订单做完了，外商却迟迟不打钱过来，望着车间里积压的几千件西装，温州老板杨文（化名）一脸的无奈。再过两天，他的这家贴牌加工厂即将停产，运气好的话，如果一个月后接到新订单，就能恢复生产，否则，300多名工人将面临失业。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好转，2010年3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对温州市600多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其中，130多家企业开工不足，另有30多家企业完全没有开工，分别占中小企业总数的21%和5%以上。另外，根据对温州50家规模以上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2009年1~2月份与2008年同期比较，内贸订单增加的仅有6家，减少的有25家；外贸订单增加的仅有2家，减少的有16家，另外3家没有接到订单。

尽管2010年上半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继续深入落实，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达到7.37万亿元，但大量投资投放到了基础设施建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设、重点项目和大型国企，中小企业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因此，中小企业的生存境遇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状况仍然比较困难。

以制造为主的中小企业，是温州模式的主群体，中小企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引来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质疑。其中，较为严重的评论为“温州模式会消亡”。在《温州商人》杂志 2009 年 8 月刊，刊登了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的《温州模式 25 年后将消失》一文。文章在开头就写道：“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的转轨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 25 ~ 30 年后消失。”

文章介绍，史教授做出这一断言的主要依据是：近十几年来，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极其缓慢，温州极少有温州以外的人来创办和经营企业；温州人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闯荡，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这种“人格化”交易方式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和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人格化”交易网也是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去温州办企业的原因，这又驱使温州人不断大规模移民来扩张市场。这样不仅市场可能会被锁定，而且可能发生“产业空洞化”。移民外地的温州人及其第二代利用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会越来越少。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对于任何一种发展模式，如果存在于纯粹的赞誉声中而缺乏质疑，恐怕这种模式会很快消失在由他人堆砌的自我陶醉中。

商业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与过去的社会形态有所不同，在种种经济发展禀赋不断涌现的今天，经济格局的变化呈现出急剧性和多样性，温州模式也不例外。自诞生以来，温州模式在契合内外环境的基础上，一直不断适应和调整。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首先，温州模式在不断调整中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温州模式表现出的进取心和发展势头，无不预示着其顽强和持久的生命力。

在企业组织形式上，温州模式已经从一家一户的加工厂，到合伙制企业，发展成为较为规范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现在不少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集团公司。

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正逐渐改变以往的“家长式”管理，聘请职业经理，朝着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在战略目标上，温州企业已经从农村集镇走向城市，从温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截至 2009 年，温州人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创办商品交易市场 500 多个，拥有 40 多万个营销网点，并进驻到越南、美国、俄罗斯、南非等国家开发工业园区，温州模式已经突破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界限。

在发展方式上，温州企业已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由单纯追求利润发展到重视创品牌树形象。截至 2009 年，温州拥有 35 个“国字号”特色产业基地和 200 多个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

在营销方式上，从依靠庞大的购销员队伍，手提肩扛、摆摊设点到进商场、包柜台，发展到后来的在全国和国际市场上开办连锁专卖店和温州商城，现在，不少温州民企开始使用电子商务，进行网上交易。

在生产方式上，从依靠能工巧匠和利用简陋设备的小作坊生产，发展到清一色的现代化流水线；从模仿别人的产品，到注重培养科技人员，不断改造技术、更新生产设备，大力研发自己的新产品。

不可否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局限性，温州模式也不例外。比如：温州企业的产业结构基本为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轻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在投资环境方面，很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少有外资进入温州，也很少有外地人在温州创办企业，反而出现了一些温州企业到外地投资或搬迁到外地的现象。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温州模式所致，而是与温州工业的基础薄弱，土地、劳动力和工业原料等资源贫乏以及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利等客观条件有关。

其次，新兴产业有所发展。

对于以上种种问题，温州市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转型，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越多越来的温州民营企业也开始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已进入风力发电、太阳能新能源开发领域，此外，电子工业、机械设备和造船业等产业也在温州有了长足发展。

2009年，温州启动了沿海产业带建设，工业用地紧张的难题可能会被缓解，无疑，这可能会激活温州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2009年6月，华峰集团、青山控股集团两家民营企业分别与温州市政府签约，在温州沿海产业带大门——临港产业基地建设25万吨尼龙66和蜆加工项目。两个项目总投资为162亿元左右，建成之后，每年产值将会达到145亿元，创税高达16.2亿元。不能不说，民营经济在温州的发展前途仍是十分可期的。

而根据温州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一季度，温州市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等新兴产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7.48亿元，同比增长56.8%，高出全行业平均增速近30%。这些数字是最好的说明。

再次，人缘关系弱化，市场成为主导。

的确，在温州经济形成过程中，地缘、血缘和亲缘等软资源的作用不可忽视。在经营活动中，温州人有较强的抱团精神，善于利用温州人缘关系为依托建立市场网络。

看不懂的



但同时，灵活应变也是温州人的特质之一，随着经济形势不断演化，温州人的交易方式也在逐步调整，开始重视按现代化市场经济规律交易。现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已经与世界著名品牌合作，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就是人缘关系弱化的过程。

霍拉斯有一句话，“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前三十年的温州，在有坠落也有荣光的跌宕起伏中前行，形成了今天的温州模式；而在未来的日子中，面临着新的转型，温州模式不可避免会经历阵痛，但在质疑、彷徨和迷茫之后，更大的可能是有新的质变，而不是就此陨落。

戴金脚镣，跳“品牌”舞

目前而言，工业经济发展仍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温州经济的支柱产业很多局限于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和通用设备等行业，而且产业内部的升级换代没有得到明显突破。

在发展之初，温州企业以船小好掉头著称，但是，现在这些“小船”已经驶入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只能将船做大，明确目标，才能乘风破浪继续前行。而做大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由于缺乏创新力和没有品牌，温州商品竞争力大打折扣。世界上70%左右的眼镜产自温州，70%~80%的打火机产自温州，但因为没有品牌，在价格方面就处于劣势。一个温州生产的日本品牌打火机，市场价格约为20欧元，而温州自己生产的打火机，只有2欧元左右。同一地方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差异不明显，价格却相差悬殊，这是温州制造业之痛，也是整个中国制造业之痛。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主要以量的扩张方式取胜，大部分产品是低端的低利润产品。而且中国企业对外需的依赖过高，国外稍

第三章 蛋生鸡，鸡生蛋

有风吹草动，就会极大地影响其贸易额。随着外需的锐减，国内很多企业竞相压价，造成出口价格偏低，如此一来更容易遭遇反倾销。

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金融危机以来，温州遭遇的国外反倾销调查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导致外需订单大幅度下降，仅2008年一年就下滑了40%。

“中国制造”已经强大到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有近200个产品的产量独占世界鳌头，但它们大多或者品牌籍籍无名或者贴上国际知名商标，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却搭不上品牌价值的顺风车，使产品的含金量低了很多。

而对于企业来说，品牌恰恰又是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张王牌。

WPP集团全球CEO苏铭天说：“我们的消费调查显示那些投资于打造品牌的公司，总是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中表现得比别人更好，在经济复苏后发展得更快，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这么说。当然我依据的是WPP记录的数据这是事实，但客户很难告诉你这些。如果你在采访中问他们为什么这一季度的收入下降，他们都不会如实回答，他们会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削减了支出。”

品牌形象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理查德·爱德曼的认同。爱德曼国际公关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在爱德曼的前50大客户中，实力雄厚的世界500强占了不少，包括沃尔玛、宝洁、星巴克等。“在美国，大家对企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从58%降到38%，欧洲的信任度也已经很低了。”

企业品牌的价值具有多重性，其价值不在于创造品牌所付出的成本，也不全在于有品牌产品与无品牌产品相比，可以获得更高的溢价，而是在于品牌可以使其所有者在未来获得较稳定的收益。它是公众认识产品的一纸“名片”，是无价的财富，更是从中国制造到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中国创造转型的助推器。“什么是‘品牌’？‘品牌’就是当别人都死掉的时候，你还活着，你就成了‘品牌’。”在危机面前，品牌就成为最后一件救生衣。

有不少中小企业之所以在这场浩大的经济变局中安然无恙，多因为他们亮出了品牌利剑。在东莞，许多玩具制造企业遭遇滑铁卢，哈一代玩具厂却仍然保持一贯的生产态势。早在一年多前，哈一代就不再为世界知名品牌作嫁衣，突破了贴牌生产的模式，向自主品牌进军，直接接受国外采购商的订单。

该厂负责人告诉我们，“我们这边这些展览室这么多，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开发设计生产的，这是哈一代自己的品牌，这里边大概有1000多个品种，我们的产品不仅可以出口，还供全国1000多家加盟商、专卖店销售。”没有背靠国外知名品牌的大树乘凉，哈一代的订单少了不少，厂子小了不少，工人也少了不少，但利润却在直线上涨，因为他们“1000件订单抵得上过去30000件”。

品牌不仅是企业获得生存的通行证，还是企业在行业洗牌中坐收渔翁之利的必杀技。一家在2000年底就脱离了贴牌模式的服装企业，期待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因为“实际上，许多小企业倒闭后，它们的部分订单会转移到我们这样的品牌企业中来”。

对于品牌对生存的重要性，温州企业也早已有所觉醒。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上的那把“耻辱之火”，烧得温州企业心寒，同时也点燃了温州企业的品牌梦。此后，温州企业大力推进品牌与质量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的发展之路。

1996年10月，长城鞋业（康奈集团前身）的康奈皮鞋被评为“中国十大真皮鞋王”，这是温州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温州鞋业走上了名牌兴业之路。

1998年，康奈、奥康和吉达尔三个温州皮鞋品牌一起捧回了“中国十大真皮鞋王”奖杯，中国10个真皮鞋王，温州占了3个。

除了鞋业之外，温州企业在低压电器、烟具、泵阀、制衣和汽摩配等行业也迈开了品牌建设的步伐。截至2008年底，温州已经有38个中国名牌产品，165个中国驰名商标，占浙江省中国名牌总数的30%，名列全国同等城市前列。

而更多的事实都在传递着品牌的力量：诞生中国名牌的制革行业、服装行业、电器行业均为温州的支柱产业，2008年上半年这三种行业的销售额分别达到123.5亿元、66.5亿元、243.8亿元。

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温州企业开始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将目光推向全球。2008年后，全球经济陷入低潮，拖累了很多国际优秀企业与品牌，看准了这次机会，温州企业勇敢迈出了海外并购的脚步。

2009年3月，4位温州企业家就开始酝酿洽购皮尔·卡丹的计划，8月份，他们已经正式入股皮尔·卡丹公司。

2010年5月18日，国内最大的民营制鞋企业奥康集团公司，在上海与意大利鞋业知名品牌万利威德签署协议，收购万利威德在大中华区的所有权。万利威德在全球有超过2300家专卖店，与这样一个欧洲品牌“联姻”，可以充分利用其“看家本领”，对于提高奥康线下所有品牌的整体品质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皮鞋、服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出口壁垒，以皮鞋出口为例，欧洲一些国家就提出用“绿色环保皮”的标准来限制中国皮鞋出口，而美国则要求“鞋包头必须能够承受35公斤压力”。进入2010年，欧盟又提出皮鞋上不但要有原产地标志，还要有环保标志、成分标准等。如果成功并购当地品牌，就有助于解决上述出口障碍。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将温州品牌送上世界的舞台，打造世界级的品牌，是在金融危机之下温州企业跳出的最绚丽的舞蹈。2010年6月，温州30多家皮鞋服装企业前往意大利，与范思哲、阿玛尼等世界一线品牌洽谈合作事宜，温州企业家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求收购或注资入股这些世界级“老字号”品牌。

放眼全球，将世界看做一个统一的巨大商业份额，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商业结构调整，打造世界级名牌，对于温州企业来说，现在正是起点。

[第四章]

与资本市场接轨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商业悖论：闲钱多，融资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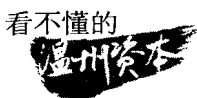
在中国，有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国民储蓄占到 GDP 比例高达 45%，属于世界最高的国家，典型的“不差钱”。另一方面，现实却是企业融资难，大企业融资难，有政府背景的公共基础项目融资难，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则更难。

在温州，也存在同样的悖论，即温州丰富的资本与温州中小企业普遍的融资难之间的矛盾。温州并不缺钱，从其拥有的民间资本数字就可看出，也可以由街头随处可见的卡宴、捷豹、宝马 7 系等名车看出，还可以体现在楼市充足的购买力上。被称为温州本地高端市场最具代表性的项目——绿城·温州鹿城广场，位于温州市区人气旺盛的江滨路，融办公、购物、休闲、住宅等功能为一体，项目的住宅部分均价为 4 万元/平方米，由于顶层是定制户型，价格高达 8 万元/平方米。尽管价格高得足以让其他城市的人们望房兴叹，但 2008 年 8 月 1 日，住宅项目一期开盘后，至今已基本售罄，累计销售额为 40 亿元左右。可见温州人超强的购买力。

此外，遍布全国的炒房团、炒煤团，也常见温州资本的身影，甚至可以说温州资本占据了绝大部分。仅房产投资一个项目，温州人投入其中的资金项目就约在 1000 亿元以上。

但就在这样一个“不差钱”的中国，在一个“遍地是资本”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却存在着一个大缺口。尤其是 2008 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将实体经济“传染”，并大面积蔓延，中国中小企业受困于国际经济整体疲软，甚至出现了大面积关门的现象。截至 2008 年底，全国有 7.5% 的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或者倒闭，全国超过 30 万家企业停产、半停产，约有 2500 万农民工返乡。在商业活跃地区，40% 的中小民营企业已经处于关、停、半停工状态，

看不懂的



甚至倒闭。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在温州，20%的企业处于生存危机之中，有的行业甚至半数以上的企业倒闭了，有的行业全行业情况都不乐观，如纺织业和打火机产业等，属于劳动密集型和对材料依赖程度强的产业和企业都面临着一些困难，生存压力非常大。

2008年11月21~26日，温州市工商联对部分民企资金需求状况进行过调查。调查涉及分布在32个行业的304家企业，绝大部分为规模以上企业，资金需求总额为71.02亿元。

中小企业遭遇的，在金融危机肆虐下全球经济萎靡造成的需求不足，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其中不乏一些企业，既有市场也有订单，就是缺乏生产所需的资金。此时，资金短缺像一个顽疾，在金融危机营造的经济潮湿下，旧病复发，而且日益恶化，最终致使企业被资金链锁住了喉咙，市场向它招手，企业自己却呼吸困难。

温州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监视器、摄像头等安防产品，虽然规模中等，在市场需求方面却是金融危机的“受益者”。金融危机加剧，使得欧美国家对家用、商用安防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企业出口供不应求，但是看着源源不断的订单，其总经理刘某却一筹莫展，“我们在高速成长的时候，碰到最多的就是这种资金链问题，资金难”。

刘某：“我们找发展银行、工商银行，他一张嘴就要你这样抵押、那样抵押的。”

记者：“你们的抵押物有哪些？”

刘某：“抵押物就是房子，可我们的厂房都是租来的。”

刘某说，他的资金缺口只有1000万元，然而由于没有抵押物，尽管有十多年的经营历史，信用记录良好，他还是一次次吃“闭门羹”。

第四章 与资本市场接轨

刘某：“所有的银行都不用这个过往记录做依据，税收也不能做依据，海关的押税也不能作为依据，银行没有这些项目，没有。所以银行也有待开发一些新的借贷品种，如果说我们交了多少税，以前税收的记录，我们出口的记录都可以作为一种诚信的抵押物的话，OK，我们就有办法了，问题是，现在的银行绝对不会要那些。”

这家电子科技公司只是千万中小企业中的一家，正如一位中小企业主在 2009 年举行的中小企业高层论坛上发出的感叹：“缺钱是中小企业目前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哪一个中小企业说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那一定是谎言。”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德国将中小企业称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日本则认为“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日本的繁荣”，美国政府更是把中小企业称为“美国经济的脊梁”。截至 2009 年 6 月，中国已有 4200 多万家中小企业，占全国注册中小企业的 99%，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60%，缴纳税收额达到 50%，外贸出口占 68%，新产品研究占 82%，提供了 75% 以上的城镇居民就业机会。

以“温州模式”为鲜明经济特色的温州，其突出特征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发展。以工业企业为例，据有关部门统计，温州的大型企业只有 16 家，在温州市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各类中小企业则占企业总数的 99% 以上，在企业总产值、利润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分别约占 97%、85%、90%，并提供了 90% 的就业机会。全国 10% ~ 20% 的服装鞋帽，70% 以上的剃须刀、锁具和眼镜，90% 以上的打火机都产自温州，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撑起了温州制造这块金字大招牌。

中小企业融资难，究其原因，由多种因素构成。首先，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源于其自身缺乏魅力。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管理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基础比较薄弱，普遍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银行与投资者对其生产经营状况了解不足，自然不敢贸然放贷；相当多的中小企业从事着生产成本低、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的产业，难以得到银行和政府的支持；此外，中小企业大多自身实力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弱，缺乏长远发展规划与目标，也导致其生命周期的短暂。

温州市龙湾区工商局曾对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做过调查，2003～2006年，该区工商部门吊销、注销了2410个中小企业，其中，44.52%的中小企业生命周期不超过4年。这种情况，必然降低银行、投资者对中小企业的投资信心。

而从金融机构方面来看，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上述问题，同时，还缺乏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加大了贷款的风险，也容易导致银行产生对中小企业惜贷的心理。

从政府部门来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力度也不足。虽然目前政府已经有所改善，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科技创新基金等专项基金，但对中小企业而言仍旧是杯水车薪，还应该在信用担保体系方面进行完善。目前，温州市信用担保事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走在前列，全市有担保公司270家，全部为股份制。但这些担保公司的资金实力较弱，其担保能力也相当有限。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自身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以满足不同层次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新曙光：创业板破茧而出

对中国中小企业，甚至整个中国资本市场而言，2009年7月26日是不寻常的一天。在这一天，经历多年蛰伏，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创业板，向中小企业敞开了资本市场大门，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创

业板 IPO 申请。

创业板，顾名思义，就是为创业型企业上市融资的股票市场，它是独立于主板之外的一个交易市场，专门为暂时无法上市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它的上市标准低于传统交易所主板市场，具有面向新兴企业、注重增长潜力等特点，并且强化信息披露和保荐人责任，可以为中小企业持续发展提供融资、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规范企业经营管理 and 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

在中国，创业板的筹备有 10 年之久，IDG 创始合伙人，也是中小企业新产业代表的熊晓鸽就表示：“实际上 10 年前，我就听说中国的创业板要开放，所以才进入创投行业的。10 年来我们这些投资人一直盼望着创业板的推出。”

投资人是资本市场的主导者，可能决定资本的流向，中小企业想要获取资金，就要先过他们那一关。创业板的推出，便于投资人的退出，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资金的进入，比投资人更盼望创业板推出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被称为“域名大王”的万网创始人张向东就表示：“这对于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创业板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创业板的推出，也是落实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战略规划的具体表现，与现有的主板、中小企业板一起，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

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冬天，而创业板的推出却给中国中小企业带来一个“冬天里的春天”，虽然这个春天来得有些迟，但迟到的总比没有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落后于国际，尤其体现在中小企业融资上，早在 1971 年，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就以创业板的面目出现，至今取得的辉煌成绩令人侧目。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创业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板，纳斯达克吸引了全球企业的目光，成为世界证券市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70 年以前，在世界范围内，产业革命和并购浪潮的同步推进，使得规模经济和大企业备受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这样表示：“大公司在实际经济活动的每个方面，都要比小企业优越，而小企业的寿命屈指可数。”在他看来，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少数大厂商组成的现代工业。然而好景不长，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美元贬值，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此时人们发现了中小企业的角色和重要性。据 1986 年美国中小企业局的一项研究表明，小公司的创新项目约等于大企业的 2.38 倍。随着对中小企业的广泛关注，为此提供资本支持的创业板也逐渐受到重视。中小企业蕴涵的巨大能量，通过与创业板的结合，充分释放出来。

从资本市场的整体结构来看，如果说主板市场是相当于企业发展到考上大学才能上市的话，创业板就相当于企业发展到小学阶段就可以上市。创业板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对创新企业的独立发展起到强力推动作用，可以培养出更多更强的大企业。比如现在美国的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新兴企业，就是通过创业板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创业板，它们就需要相当长的发展时间，相当于要考上大学后才能达到上市条件。而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由于大企业的竞争新兴企业会出现资金压力，很可能被成熟的上市公司所收购。正是因为有了创业板这个为新兴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初期的谷歌和亚马逊才能依靠自己独特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与大企业抗衡，发展壮大自己。

1986 年，美国一家小公司在纳斯达克股票电子交易市场成功上市，上市时这家公司的资产仅有 200 万美元，但是到 2000 年，它的资产已经不可思议地达到 4000 亿美元，这家公司就是微软。此后，

第四章 与资本市场接轨

戴尔、苹果、英特尔等一大批今天如雷贯耳的公司，都是在纳斯达克的摇篮里成长起来的。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已达到 5500 多家，市值更是超过 6 万亿美元，成交金额在 1999 年首次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然形成与纽交所主板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对于缓解中小企业发展瓶颈、促进风险资本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创业板市场都明确表示，鼓励中小企业在创业板发行上市，其与该国主板定位的差异性，使得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创业板的推出，正是与中国主板形成互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构建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关键环节。

创业板带来的投资机会主要是参股创投公司的上市公司，这类公司将直接享受创投公司上市后带来的股权投资利益，是目前最为明确的受益群体。另外，就是与创业板行业相类似的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国外研究表明，创业板市值估值长期高于主板，甚至高于中小板，在估值比价的作用下，主板和中小板上的相类似公司如环保、生物医药等类的公司都将受到青睐。

2009 年 7 月 26 日，是证监会正式受理创业板 IPO 申请的第一天，北京骄阳似火，但比天气更火爆的是中小企业递交申请书的场面。尽管受理时间从上午 9 点才开始，但在 8 点钟就有企业和保荐人在门前等待，甚至有人专门在门前留影以作纪念。创业板十年磨一剑，在许多企业看来，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在当天 9 点到 17 点的 8 小时中，包括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行业等在内的 108 家企业获得了报名权。

如同一场被期待多年的雨，中小企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创业板，但资本市场总是设有或高或低的门槛，创业板也不例外。行业前景清晰，具有成长性且核心技术明显的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上将被赋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予更多的想象空间。

温州市政府鼓励企业在创业板上市，200 家企业排队等候过会。2009 年 11 月 10 日下午，温州本土企业金龙机电创业板首发申请顺利过会，创业板有了温州的一席之地。12 月 16 日，金龙机电在深交所正式上市，发行价为 19 元/股，成为第二批企业中市盈率最高的企业。12 月 25 日上午 9 点 25 分，金龙机电董事长金绍平与其他七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负责人一起，手持木槌敲响了深交所的开市宝钟。随后，金龙机电以 30.90 元的价格开盘，比 19 元的发行价高出 11.90 元。

在 2009 年 7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开始接受创业板首发申请材料上报，金龙机电就在第一时间上报申请。这家位于乐清市北白象镇的企业，以研发、生产销售超小型微特电机著称，欧莱雅、深圳华为、博朗、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都是其核心客户。

对于上市的感受，金龙机电董事长秘书黄娟表示，“以前没有感到资本运营的力量，现在则是切实感受到了。”她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以前企业发展是走楼梯，那么现在上市了则有乘电梯的感觉。”

无疑，创业板会给温州民营企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温州共有 30 多万家中小企业，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正泰电器、报喜鸟服饰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目前，温州企业只有五六家进入资本市场，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远远少于杭州近 40 家和宁波 20 多家的数量。创业板市场的属性，决定了它比较适合一些创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但前景看好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对于温州诸多优秀的中小企业而言，相对于主板市场，创业板是一个上市融资的良好平台。

从股市绝缘体到炒股大军

曾几何时，温州资本和温州企业堪称股市绝缘体，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开始将上市作为发展的一条道路，也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投向股票市场，一支温州炒股大军渐渐形成。

虽然温州也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但不可否认温州的确资本丰富。遍布全国甚至世界的温州商人、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等，无不向人们展示着温州资本的雄厚。但无论是炒房，或是炒煤，抑或炒电，温州资本炒的都是实业，对于炒股这一资本运作的常用手段，开始之初，温州人并不热衷。

温州人素来以目光敏锐、吃苦耐劳，且对财富具有前瞻性的把握著称，哪里有机会，温州资本就会投向哪里。不能不说，温州人具有先天的冒险精神，但是这份“冒险”并没有在股市上大展身手，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温州人有务实的传统。

在温州，约一半的企业是从家庭工厂做起，而且一直经营实业。这种状况影响着温州人的投资文化：温州人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投机性比较强的股票相比，房产、煤矿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更让他们感到放心。温州曾流传着一个笑话：和温州人做生意，你拿个锅做抵押，要比拿股票可行得多。

其次，温州企业有“不上市”的独特地域文化。

截至2009年底，在国内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三个市场上，只有5家温州上市公司，低于浙江省各地市上市公司的平均数。

温州丰富的民间资本使得企业发展“不差钱”，这固然是温州企业不喜欢上市的最大理由，而企业上市的规范问题，也是温州企业上市最大的担忧。温州人在股市上找不到自己熟悉的企业，自然对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投资股票敬而远之。何况，此时他们还拥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和投资回报，炒房、炒煤、炒棉花，无不让他们取得了远高于股市的收益。

但是，这种投资生态被 2006 ~ 2007 年的大牛市所改变了，被高收益所吸引的温州人开始疯狂奔向股市。

2006 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年，股市“牛气冲天”，中国 A 股市场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闪亮明星之一：沪深 300 指数涨幅跃入全球 5 强，两市总市值更是突破 8 万亿元大关，两个月内的股本增速更是连续超过韩国等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股票新兴市场。牛市来临，新股民的增加也异常迅猛。统计数据显示，2005 年 A 股新增开户数为 124.05 万户，仅 2006 年前 6 个月的新增数量就高达 146.66 万户，截至 2006 年底新增开户数就高达 284.017 万户，2006 年全年新增开户数突破 300 万户大关。

2007 年第一季度，随着上证综指由 2700 点一路飙升到 3200 点，A 股新增开户数高达 478.59 万户，超过 2006 年全年的开户数。

在沪深股市行情的刺激下，曾经号称从不炒股的温州人也开始蠢蠢欲动，寻求自我突破，一支炒股大军开始浮出水面。

2006 年初，温州开户股民有 9.7 万多人，实际炒股人数约有 6 万人。这种人数状况在 2007 年五一长假后开始发生变化，新开户人数以同比三倍的速度递增。仅在 2007 年第三季度，温州股民新增开户人数就激增 2.1 万多户，交易额高达 533.98 亿元，超过 2006 年全年总额。

在炒股人数激增的情况下，2007 年温州 10 家证券营业部也创下历史最好盈利成绩：方正温州营业部盈利 1142 万元，比 2006 年同期的 147 万元增长了 676.9%；银河温州营业部盈利 900 万元；申银万国温州营业部在 2007 年 5 月就出现连续 4 个交易日成交量突破 1 亿元。到 2007 年 7 月，10 家营业部全部提前完成全年指标。

第四章 与资本市场接轨

对于这股“炒股热”，亲历过温州证券投资大起大落的申银万国温州营业部总经理瞿炳建大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瞿炳建的感叹不是没有缘由，其中不仅包含着对股市新增开户数量之多的惊奇，也包括对温州炒股状况改变的惊叹。

早期，温州股民多是知识分子，当时的股市风险也较大，导致很多人赔钱而退；后来，温州的股民群体主要以下岗工人、做生意的人、退休工人和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为主，这些人往往喜欢打听内幕消息，而不去了解基本面的情况，这类股民也容易赔钱。

而现在新开户的股民大多是中青年人，知识水平相对较高，选择股票的眼光也有所改进。他们多投资有色金属板块等生活类资源股、消费升级类股票以及石油股等，这些都是累计涨势客观的几类股票。尽管这批人带进股市的资金并不多，但对股市的推动力不可小视。

作为温州新股民的典型代表，王军的炒股之路可谓比较顺利。自2006年4月，家住温州瑞安市的王军就开始长住温州市区的温州饭店。之所以住在这家饭店，并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它临近几家证券营业部。“图的就是个方便”，他坦言。

虽然还没有成立公司，王军手中的资金已经超过亿元，这些钱大多源自亲戚朋友，还有自己的积累。2006年4月，作为温州炒房团的核心成员，王军将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近10处房产卖出去，回到瑞安。原本打算休息一段时间，但朋友们一致认为他富有冒险精神，而且几乎“做什么，成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在股市小试牛刀，大赚一笔后就转投房地产。

经不住朋友的怂恿，王军没有“休息一段时间”就又投身股市。2007年5月中旬，王军带着亲戚朋友的500万元资金和自己的200万元只身来到温州市，将全部资金投入股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所持的几只重仓股就涨了 30% 左右。这个消息一传开，原来一些炒房团的成员竞相找到他，让他帮忙炒股，其中，一位代姓老板，将原本为上海某家房地产公司融资的 8000 万元巨款转到他的账户上。

资金增多，王军肩上的压力也加重，他将目光投向了新股，这些新股连涨的行情使得王军与其亲戚朋友备受鼓舞，投入股市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在温州，像王军这样的老股民重新投入股市的人不在少数，唐先生也是其中一例。20 世纪 90 年代末，唐先生曾投身过股市，但当时惨赔的经历使得他对股市恨得咬牙切齿。但随着温州掀起的炒股热潮，已经 8 年没有动过股票的他再次将 1000 万元投向股市，凭借三年亏损积累的经验，让他在这波牛市行情中如鱼得水。

此外，一些从不炒股的炒煤团、炒油团和炒棉团成员，在股市由熊市转牛市时，也乘着股市新一波上涨行情将资金转投股市。一位炒股的温州投资者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放着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不进入试试的话，那就说明我不是温州人。”

很显然，温州民间资本之所以如此大规模进入股市，是其逐利的天性使然，也是民间资本与资本市场接轨的表现之一。

而 2008 年金融风暴的发生，也让温州企业产生了一场新变革。在温州企业中掀起了一场上市热潮。

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因素，使得温州传统制造型的中小企业经营业绩下滑，资金链吃紧，不少企业就此栽倒在资金链断裂上。而危机中不仅有危险，也带来了机遇，这场金融危机坚定了相当一部分企业上市的决心。

从温州市金融办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 2010 年，温州第二批、第三批拟上市企业的总数已超过 50 家，森马服饰股份公司就是正在

辅导期的拟上市公司之一，作为其竞争对手的美特斯·邦威已经完成上市，森马要在市场中保持不败，上市是必由之路。

“融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市辅导，完善了企业治理机制，能更好地抵御风险，这使得我们有了把森马开成百年老店的信心。”对于上市这一企业的资本运作，更多的温州企业就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花样百出的炒股团

在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下，温州人在埋头苦干做实业带来的炫目财富之外，开始感受到资本杠杆的魔力。

在投资上，温州人一向胆子很大，且投资数额很高，对于投机性较强的股市，从公务员到企业家，再到家庭主妇等，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对股市产生浓厚的兴趣。虽然众多温州人对“炒股”这个流行语有所忌讳，害怕继“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之后，再被扣上“温州炒股团”的帽子，但无论如何，“温州炒股团”的冰山一角，还是隐隐约约地浮出水面。

2005年6月13日晚上8点多，温州新城拉芳舍酒吧111号包厢内，几位股民和一名券商代表聚在一起，一朵希望的火花正在酝酿燃烧。身体有些前倾的林浩，挥舞着瘦瘦的胳膊说道：“时机已逼近，‘炒股团’以前歌手的成员这几天来电咨询的很多，电话快被打爆了。”

在温州，与林浩相似的股民可以算作“超大户”，经历了A股、B股，甚至是H股的跌宕起伏，已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炒股本领。因此，在他们周围围绕着一群炒股跟随者，他们时聚时分，人数多时可达200余人，资金最多时有2000万元之多，一个月的交易量也曾达到两亿元。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以往，温州人炒股的方式一般是：当“领头羊”购进后，其余股民迅速跟进，等股价上升到理想价位后，再集体迅速出手。从购进到出手，之间的周期往往只有一周左右，属于典型的短线操作。短线操作虽然安全系数较高，但加上收取的佣金及扣除的其他税费，往往导致盈利空间有限。

吸取此前的教训，林浩建议大家中长线结合。此外，出于对自己在股市里博弈能力的自信，他建议其团体成员购买白云机场这种绩优股，适合长线炒作。

与在楼市和煤炭行业上的抱团形式相似，温州人炒股也依然采取抱团形式，属于典型的“群羊效应”。只要有一个风声传来，一群人都跟风购进，场面极其壮观，而且其抱团的规模也异常庞大，动辄就是上亿元的资金。

“我不懂股票，但是身边的朋友们都在炒，听说挺赚钱的，我也就跟着做了。”温州的刘先生这样表示，他本身并不懂股票，却依然开了户，跟着一批老乡投资股市。这种情况，恰恰表明了温州人善于抱团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抱团有可取之处，可以利用众人的警觉性，避开一些灾难性的时节。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将股市印花税由千分之一调高到千分之三，从这一天起一直到6月5日，短短几天内，上证A股就跌去近千点，很多只股票连续四五天跌停板。因此，2007年5月30日这天也被人们称为“5·30”股市大跌日。

感受到大陆股市氛围的改变，很多温州资金开始转战港股。比较“微妙”的是，在内地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消息公布前一周左右，温州老板们就开始大批量开设港股账户。“这些温州人把证券公司的员工，特意请到温州住了一晚，当晚为他们开了50多个账户，资金

第四章 与资本市场接轨

很快到位，最少的也有 500 多万元，最多的几千万元都有。”一位香港证券人士透露。

可以想象，这些温州资本对香港股市并不十分了解，但这 50 多个账户背后，可能是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个温州个体。一个温州人可能不敢跳出温州，但几十个温州人就敢一起跑到香港股市下注。

当然，集体涌入香港股市，温州资本明显带有“赚一笔就走”的色彩，但炒股并不是温州资本的主业，这种投机性投资也无可厚非。一位温州企业家就坦言，自己炒股仅仅是“跟风”：“准备赚上一笔就走人，并没有指望在股市发财，毕竟自己还有主业，做企业才是长线。”

因此，在温州，一些企业家炒股时，有人亲自操刀上场作战，有人将资金委托给“高手”代理，有人直接购买企业原始法人股，有人甚至让太太闯荡股市。到底有多少民营企业涉足股市，有多少民间资本进入股市，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股票已经深深牵挂着温州企业家，用“无股不成席”来形容他们炒股颇为恰当。

首先，企业家亲自试水股市。

在温州，见面如果不谈股票和基金，多少有点担心自己被别人看不起。2006 年 6 月，温州万峰皮塑革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亮，听从一位专业做股票朋友的建议，决定试水股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刘成亮觉得“江南重工”这个名字响亮，就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只股票。他的第二只股票，是当时的大牛股“北辰实业”，买入不到一个月，股票价格就翻了一番，“突然看到股票来钱这么快，当时就觉得赚钱都赚怕了。”

但是当刘成亮卖掉“北辰实业”进军钢铁板块和金融板块后，北辰实业的价格又翻了好几番，这让刘成亮总结出自己炒股“最大的体会”：“想卖出的时候，最好劝自己再熬一会儿；想买进的时候，

看不懂的



也是如此。”此后，他在股票市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冲动。

炒股改变了他的性格，还影响了刘成亮的消费意识。他花钱曾有些大手大脚的习惯，自从炒股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舍得花钱：“今天花掉的 1000 元，放在股市里，明天就可能变成 1000 多元了。”

企业家试水股市，亲自感受资本市场，是温州民营资本走向资本市场的一条捷径。

其次，请操盘手打理股票。

温州的企业家向来不喜欢放权，对企业业务习惯亲力亲为，但在投资股票方面，一些企业家却表现出了“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专业精神”，即请专业的操盘手代自己打理股票。

在温州，企业家请操盘手或同等级别的朋友帮忙炒股，已经不算秘密，有人甚至直接将钱交给银行家去操作。

一位温州制鞋企业老板，虽然对股票有所了解但并不专业，眼看周围的人都投资了股票，在 2007 年 4 月也禁不住诱惑开始炒股。出于对自己的了解，他将 1000 万元资金划到上海一位操盘手级别的朋友账户上，让朋友帮助炒股。而这位朋友显然也没让他失望，一个月后，1000 万元的本钱就变成了 1900 万元。

这种炒股方式，是典型的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投资。请操盘手打理股票，在获利的同时，企业家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企业运营，对于讲求“实用”的温州民营企业家，未尝不可。

再次，太太炒股。

虽然温州企业家炒股的人数并不具体，但毫无疑问，企业家太太炒股队伍肯定比企业家炒股队伍庞大。尽管太太们炒股的单体金额可能不如企业家出手大气。

在温州企业家太太圈里，投资股票无疑是最新潮的事件之一，最时尚的不再是做美容、健身、购物或练瑜伽。如果没炒一点股票，

没买一些基金，不能就股市发表自己的见地，才算真正的落伍。正如温州挺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潘佩聪表示：“现在经常会看到许多朋友聚在一起大谈股票，好像不谈股票就不够时尚一样。”

徐女士是温州一家知名制鞋企业的老板娘，财务专业出身的她是公司的副总，掌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与众多炒股的温州太太们在2006年股市利好时期炒股不同，徐女士炒股级别堪称“师太”级，早在2001年，她就已经开始投资股票。

自2001年到2004年，徐女士炒股的资金一直控制在几十万元到一百万元之间。2006年1月，在上证指数只有1000点左右时，她投入了150万元，买入“沪东重机”和“洪都航空”两只股票，转手就赚了几十万元。

之所以命中率如此高，源于徐女士的炒股原则，即如果不被套牢，两三个月就要将手里的股票卖掉。此后，她会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带着银行卡里从股市赚来的钱，到香港、欧洲、韩国等地疯狂购物。

虽然很多人认为股票涨涨跌跌，炒股玩的就是心跳，但徐女士认为稳妥最为紧要，自己只买业绩好、盘大、比较稳定的股票，对于大起大落的股票，则不予考虑。

最后，投资原始股。

相比股票市场流通的股票，原始股的购买机会十分有限，私人投资或小规模投资公司很少有机会可以介入。一般而言，原始股的购买者多为与公司有关的内部投资者、公司有限的私募对象、专业的风险资金以及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

投资原始股，是一个“痛并快乐”的选择。通常而言，投资原始股的周期要1~3年，而利润也往往是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投资风险。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某温州大型企业集团老板很早就关注股票，他偏好未上市公司的法人股，投入的金额有1亿~3亿元，以便公司上市后，“放长线钓大鱼”。

买入新创企业未来的预期，这实际上表明了，温州人投资股票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第五章]

打破金融玻璃门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私人钱庄风生水起

英国政治家斯威夫特曾这样说过，“如果某人能使只长一根草的地方长出两根草，他就有理由成为比沉思默想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体系的缔造者更为有用的人”。

“穷帮穷，富帮富，民企找民资”。在资源禀赋匮乏的温州，要使只长一根草的地方长出两根草，民间资本往往更能哺育出韧性十足的民营经济。

温州有高达 7500 亿元的民间资本，它们大量游离于官方数字之外，因“闲散”而亟须找到释放的出口。温州的民间资本，并不是一味对扮演被国家政策、法律所边缘的“散兵游勇”乐此不疲，它们渴望打破金融玻璃门，涌入中国浩浩荡荡的金融大潮中。

如果找不到合适又合法的出口，温州的民间资本则不得不在边缘地带游走。民间借贷成为温州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快捷而便利的方式，他们择“利”而动，以无孔不入的方式进入温州民间经济发展的领域。

在温州，民间金融一直都很活跃，主要原因在于有大量的民营企业需要资金。几乎每一个民营企业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多或少地得到过民间信贷。资金是市场的源头，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中小企业从正规银行取得贷款的难度较大，很多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

温州的民间资本以大而散为主要特征，数量庞大，如滚滚洪流，又散布在各个角落，我们意想不到的犄角旮旯也可能是民间财源茂盛的地带。单个民间资本难成气候，他们往往通过合法或非法的形式“聚沙成塔”，形成规模浩大的民间集资。截止到 2009 年 5 月底，温州市储蓄额达 2506.7 亿元人民币，经人民银行的抽样调查，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民间借贷 650 亿元左右。

民间集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量非法集资投资实体经济以赚取利润，这种集资行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称为善意的集资行为；另外一种是为了挥霍而进行的诈骗集资行为，是为了满足个人贪欲，是恶意的集资行为。

大量的民间资本被部分个人或法人聚集到一起，成为改变当地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聚集到个人或法人手中的大量民间资本再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流转出去。

温州的民间借贷发源于亲戚朋友及邻里间的互惠互助，往往游离于体制之外，具有很强的草根性，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缺乏法律庇护。人们在进行借贷交易时，只需打个借条，在借条上注明借贷双方的姓名和借贷金额即可。期限也不确定，随时可以收回。如今，温州的民间借贷早已超出了最初的功能，借贷人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亲戚、朋友及邻里范围，发展为民间金融。工业、商业以及学校、医院都有可能尝试这种民间投资方式。

温州民间集资的方式往往呈金字塔状。站在塔顶尖端的人往往是“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和高级掮客、典当行、抬会、担保公司等。金字塔的最底端是散户。这些散户拥有的存款大小不一，有的几万元，有的十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在塔顶与底层之间，则是或大或小的中介，他们嗅觉敏锐，择机而动，不放过任何一个聚集资本的机会。一些银行的钱也会进入这个金字塔系统中。2000 年以后，银行的业务员发现一些客户的信贷增长过快，后经跟踪发现，这些个人贷款被借给别人，成为民间借贷了。

在有些地区，有一些当地公认的资金周转人。他们往往在当地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号召力。谁手里有了闲钱，就会先在周转人那里登记。如果某些企业或个人资金周转不足，就会向周转人借贷，

第五章 打破金融玻璃门

周转人对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进行判断，如果符合贷款条件，就会把前来登记的散户的钱聚集起来。

温州的民间借贷，其信用机制往往不是法律与市场规则，而是个体信用。文化习俗、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以及商脉等都是延伸个体信用的载体。人们利用各种非正式的信息场所，以信用的名义进行资本交易。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差序格局”说，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可以说温州的民间借贷是以资本的形式嵌入差序格局中。

天下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到银行贷款有利息，民间借贷也有利率。《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间借贷利率都中规中矩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浮动。

民间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利息，而资本又有逐利的本性，越来越多的温州民间资本涌入到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中。

由此，温州民间借贷成为民营企业的“哺乳者”，很多民营企业都是靠民营资本发迹。民营企业，尤其是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往往是“三无”企业——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而民间借贷市场可以弥补中国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扶持不足的缺陷，成为民营企业的活水源头。一位做了十几年服装生意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的小老板，从来没有向银行贷过款，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或者是向朋友借，或者企业之间互相拆借，或者向钱庄借钱。他的理由是，“做服装生意讲求的就是个信息灵，反应快，耽误不起。现在社会上借给我利息是8厘，而银行现在尽管利率降了，也还有5厘多，还要审批，太麻烦。”

温州德力西集团老总胡成中在创业之初，想建一个产品检测中心，需要30万元，银行借贷的高门槛让他望而却步，最后还是通过民间融资借了30万元，对于其事业生死攸关的产品检测中心也最终得以建成。

何传崇是温州苍南县龙港镇嘉诚印务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企业创立之初，由于公司只有一条生产线，对资金的需求较小，资金匮乏问题解决起来也易如反掌。何传崇很怀念那段不怎么为钱发愁的日子：“如果公司缺少资金，在我们几个股东之间就可以解决了。我们按股份分摊所缺的资金，再分头去筹借，很快就能把资金给筹齐。”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单靠股东的个人融资已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负责为企业融资的何传崇并不认为他的融资很成功，在他看来，“银行明明守着能下蛋的‘金鸡’，但他们就是不放，所有能用的方法我都用尽了。”

2005年3月，公司拿到800万元的印刷订单，利润是100万元，这让何传崇等人兴奋不已。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也让何传崇苦恼，接下这笔大单子需要添置一台价值150万元的设备和几十万元的原材料。向银行紧急贷款，银行给出滴水不漏、公事公办的官方说法，“等待贷款的企业已经排了很长的一个队，银行要按照先后顺序核实企业资质并按企业信誉授信等级进行放贷；再者，紧急贷款在龙岗当地没有先例，这种贷款操作的风险比较大，银行要研究一下再说”。再等，花儿也谢了。无奈之下，公司铤而走险选择民间融资。

何传崇等五六个股东一凑，在民间的草根银行贷了几百万元，尽管有风险，却是“及时雨”，除去利息，他们通过这笔大单最终还是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在温州，几乎每个成功企业家的背后，都蛰伏着一大批坐拥金山银山的低调富豪，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以共赢的方式把温州民营经济推向新的高潮，并成为全国无可复制的温州样本。

同时，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也避免了大量民间闲置资本投资无门的尴尬，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了地域和空间限制，提高了资金使用率，优化了资源配置，盘活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政府投资占中国固定投资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82% 下降到 2008 年的 27%。到 2002 年，民间投资就超越政府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大户。在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 30% ~ 40%。

尤其是 2008 年金融海啸后，温州的民间借贷逐渐走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很多广告栏上都能看到它们高调登场的影子。诸如“帮还贷款，资金周转，投资咨询，速度快，收费低”的诱人广告，让在危机中挣扎的温州中小企业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

温州民间借贷的存在，大大增强了温州资本的活跃程度，提高了温州金融的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本王牌。

游走在“灰色地带”

地下游资，言其利，有利于资金资源的优化配置，促动本地贷款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弥补信贷资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有利于推动银行完善信贷管理办法，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言其弊，民间资本由“体外循环”进入民间金融，仍然徘徊在金融宏观调控之外。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不规范的运作机制以及内在高风险的无限释放性，可能导致金融秩序混乱。

由于民间借贷没有正式的“身份”，得不到法律保护，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较高。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全市民间借贷利率最新监测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温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月利率已达10.93%。过高的利率为民间借贷蒙上了“趁火打劫”的阴影，对于一些还款能力强的企业，民间借贷可能是雪中送炭，而对于资金链脆弱的中小企业，则有可能是饮鸩止渴。

连民间借贷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这样说，“利息是很高很高的，假如你做生意拿去，是不合算的，如果周转一下倒是可以的，周转十来天半个月可以，你专门用我这个钱，那你除非是去贩毒才能赚到这么多利息。”

高利率运作模式提高了借款企业的资金成本，使企业原本就紧张的资金链变得更加脆弱，有可能引发支付风险，危及企业生存，甚至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灰色地带”徘徊的民间资本往往背着“不清不白”、“亦正亦邪”的名头，一不留神，民间资本就成了“货币祸水”，把当事人或企业搅得天翻地覆，有些人甚至到了谈“民间借贷”色变的地步。

2008年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杀，其自杀原因在于为叶姓朋友担保1000多万元高利贷，叶某无力偿还高利贷。债主一窝蜂向朱吉光逼债，泼油漆、锁门、推倒公司大门……朱吉光被逼无奈，只得离家出走躲债，到最后还是不堪债务压力而自杀。企业员工这样评价，“朱总是好人，可是好人总是不长命啊！”

由于缺乏法律保护，民间借贷的链条极为脆弱，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受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借款人、贷款人，还有为企业

提供担保的其他企业，很有可能导致“集体溃败”。

对于民间资本，人们往往又爱又恨。企业处于危难时，民间资本可能是最不嫌贫爱富的救命稻草，但民间金融的确存在高风险、管理混乱等缺陷，尤其是高利贷，更是“一入侯门深似海”，很多企业往往被利滚利的高利贷逼得灰头土脸。

钱在老百姓手里，资本又善于“择利而居”，只要有足够高的利息，仍然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流向民间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有些是合法的，有些则是非法的。尽管几经打击，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资本仍然百折不挠，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2007年，曾经参加过轰动一时的“吴华拾会”的温州乐清高秋荷因集资诈骗被捕。2003年，乐清民间融资如火如荼，高秋荷决定东山再起，拉拢几名农村女性成立“经济互助会”，高息吸储资金，又把资金高息转借他人。由于财务管理漏洞百出，互助会资金链摇摇欲坠，为维持“经济互助会”，高秋荷铤而走险，玩起了空手套白狼，通过“编造项目，许诺高额回报”的方式非法集资5000万元。2007年3月，高秋荷以炒房为由，向叶先生借钱50万元利息为3分钱，叶先生未假思索就把钱给了高秋荷。一周后，叶先生向高秋荷索取借款，高秋荷给了叶某8000元利息和40万元现金。后来，高秋荷多次向叶先生借钱，叶先生也爽快答应，至高秋荷案发时，叶先生还有30万元未取回。事实上，高秋荷从叶先生那里拿到的钱并未进行投资，而是用于偿还其他债务。“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高秋荷的“经济互助会”资金链最终断裂，高秋荷也锒铛入狱。

对于民间资本，一方面要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民间金融一棍子打死，一味采取堵、塞等简单、粗暴方式加以打压非法融资方式，无济于事，不但会屡禁不止，恐怕更多的草根银行甚至地下钱庄都要冒出来了。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

在民间集资问题上，政府的角色相对被动。在民间集资问题尚未浮出水面之前，政府一般会将其视为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如果某一家企业出了问题，引起较大社会影响，政府去调查时才会发现重重隐患。还有一种是民间借贷纠纷，政府一旦发现，往往定性为非法吸收非特定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等。

在温州，投资公司、创投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典当行中有很多是暗中做非法融资。但现在他们处于一个过渡期，而且从法律上来讲，民不举官不究，政府当前对民间集资还处于被动监管状态。

因而，必须要加强政府监管。不过，如果只加强政府监管一方的砝码，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以浙江为例，浙江民间集资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政府监管部门的人手却寥寥，这样的监管执行对于规模浩大的民间借贷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法不责众，这么多人都卷入其中，到底惩罚谁好？

即使是正规金融机构加大资金供应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下金融猖獗的问题，只能暂时缓解。毕竟，银行很难取代民间融资的地位。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问题，需要将那些原来不合法的善意民间集资转为合法化，并对之进行规范。当大量善意的民间集资合法化之后，只剩下恶意的集资行为，那么打击非法金融就易如反掌，也就能结束非法金融猖獗的局面。

与其围追堵截，不如疏而导之，使其走出灰色地带，走上阳光台面，与民营企业光明正大地共生共存。

沐浴政策漏下的阳光

很多温州企业家的心里，都怀着要当银行家的梦想。

要当一个银行家，合法化必不可少。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已是大势所趋。

温州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民间金融的消亡。正规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完全覆盖经济发展领域，民间金融会长期存在下去。

事实上，国家已经开始对民间资本另眼相看，中央银行对于民间借贷已有了积极肯定，认为“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由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企业垄断市场的格局，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政府不断颁布政策法规，推动民间资本从灰色地带向阳光地带迈进：

2005 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

2006 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加大力度规范民间借贷；

2006 年底，央行和银监会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

2008 年 5 月，央行联合银监会决定开展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2008 年 10 月又决定全面推开试点；

2009 年央行宣布加快制定《放贷人条例》，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3 月 6 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称，《放贷人条例》已列入国务院法制办二档立法计划，只要形成共识，就可推出。

.....

长期以来，中国合法的放贷机构仅限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虽然民间借贷很活跃，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央行建议推出“放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贷人条例”，无疑是金融对内开放信号的进一步放大，“放贷人条例”给民间资本以合法地位，可以规范放贷机构及个人借贷行为，为借贷合同纠纷的裁决提供法律依据。在民间资本中格外显眼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看到了政策指缝中漏下来的阳光。

“放贷人条例”对放贷行为的核心要求应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只贷不存：也就是只能放贷，不能吸收公众存款。第二，利率封顶：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第三，小额贷款：每次贷款应有一定的数额限制，如最高不得超过50万元。第四，短期流动：民间借款应是短期贷款且具有流动性。第五，依法纳税：明确纳税的主体及标准。当然，“放贷人条例”的内容应以法定程序通过后的条文为准。

从边缘化到主流，从灰色地带到阳光化，民间借贷的正名之路注定不是一条坦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需要政府、民间借贷机构等共同努力。

当很多中小企业为资金即将枯竭而四处奔走，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借高利贷时，一眼望不到边、一竿子探不到底的民间储蓄却在睡大觉，这导致了资本在供与求之间的断层。资本民间借贷是块肥肉，却被隔离在玻璃门之外，只能看不能吃。

不过，只要坚持活下来，总能等到曙光初现，虽然曙光有可能只有一缕。“放贷人条例”的出台加快脚步，让很多民营企业感受到了融资的春天。

国家从法律上将给予资金拥有者更多运用资金的自由和权利，民间信贷正在向“阳光化”进化，银行独大的信贷垄断格局逐渐被颠覆，民间信贷的玻璃门由此被打破，这是中央政府为促进中国经济回暖、帮助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这将会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第五章 打破金融玻璃门

政策松绑，民间金融走向规范，把处于边缘化的温州民间借贷向正面、阳光的主流借贷市场推进，为民间金融的躯体穿上一层法律的外衣。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以后可以合法地把钱拿到民间借贷市场中去，这样更有利于盘活民间资本，并极大地调动民间创业者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创业者的队伍中去，同时也使得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政策松绑打破了民间借贷的玻璃门，大量资金将会源源不断输送到民间市场，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为中小企业顺利过冬备下一件厚棉衣；而且民间借贷法律化，不但使放贷者的权益受到保护，贷款企业的权益也能得到保证。即使发生纠纷，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解决，避免暴力等非法手段的出现，从而实现放贷者与借贷者的双赢。温州某位经营“钱庄”的人曾说过，“我一直希望有一个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哪怕利息低点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能保证资金的安全，最起码出现呆账了我们也能去打官司”。

再者，民间借贷“阳光化”也打破了我国信贷市场上一直以来银行独大的垄断局面，增强了信贷市场的竞争，发挥出了“鲶鱼效应”，增加了原有主体信贷机构的危机意识，有利于他们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信贷门槛。

大多民间资本有这样的情结——要纳入合法的金融体系。但是，想法与愿望总是美好的，实施起来却难免遭遇到各种困难。如何合理、有序、有效地进入金融体系，成为民间资本阳光化的一大难题。此时，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民间资本合法化谨慎而又众望所归的一步。

2008年5月4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与设立以及资金来源：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

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需符合法定人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有2~200名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

.....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点确定。

.....

开办小额贷款公司，意味着民间资本走出了“灰色地带”，能够光明正大地为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

2008年7月，浙江最先在全国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已有几十家，仅温州就有16家。温州民间资本素来风起云涌，成为支撑温州草根经济的主要力量。

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民间金融机构，不仅有了合法身份证，也会享受到政策优惠：当地政府将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扶持，将其纳入全省小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表现优秀——经营合法，信用记录良好，小额贷款公司还可以升级为村镇银行。

与财大气粗的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司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构成中国商业史磅礴气势的不仅有经济格局上的大手笔，那些出身草根、看似在商海里小打小闹的民营经济，一样以涓涓细流的绵长和固执的穿透力，把中国经济渲染得气象万千。很多民营经济需要的资金，在出手阔绰的银行眼里——还不够塞牙缝的——微不足道，但具体到每一个民营企业，可能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而小额贷款公司恰恰可以为民营企业递上那一根救命的稻草。

积极参与民间借贷的人都一直存有忧虑——缺乏合法的身份。民间借贷合法化之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让大量民间资金浮出水面，引导其为经济发展贡献正面作用。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使资金从地下状态变成“正规军”，不但民间资金的生命力会得到激发，很多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中小企业也会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小额贷款公司具有“小、快、活”的优势，面对的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三农”种养户。只要贷款对象符合贷款条件，一般只需两三个工作日，就能从小额贷款公司贷到款，可为企业解燃眉之急。

温州有一家小塑料制造厂，由于经济低迷，企业资金链摇摇欲坠，银行的贷款还不上，新的贷款还没批下来，到了青黄不接的地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步。幸好，该厂老板从温州市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成功贷得 50 万元，这 50 万元成为他的救命钱，“幸亏有这 50 万元的贷款，要不我们厂就要倒闭了。”

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有一套简单又特殊的工作机制，“我们从来不看客户的财务报表。来这里的大多数是微小企业，经常丈夫是法人代表，妻子就是财务会计，报表的随意性很大，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们的客户经理去调查时，第一个让对方出具的，就是电费清单。”

2008 年底，温州“低压电器王国”柳市镇浙江通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振清心急火燎地赶到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公司，要求贷款 200 万元。许振清与正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刘阳的对话值得我们深思：

“这么急？要这么多的钱干啥用？”

“金融危机使我的产品销路萎缩，逼得我另起炉灶上新产品，花重金从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引进一个专利技术产品，开发了智能型漏电断路器。刚才江西一家电力公司来电，要我一周内发 180 万元的货，我急需 200 万元流动资金。如果接不来，这碗饭就被别人‘端’走了。”

“行，你找个担保人。”

许振清请来当地一位朋友做担保，当天下午就拿到了 200 万元的贷款。而如果从银行贷款，没有抵押物，很有可能吃个闭门羹。即使有抵押物，拿到贷款最快也要半个月，到那时，商机也早已溜走了。

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多为当地村镇居民，大家一起长大，知根知底，对对方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信用成为借贷间最常用的抵押物，于是降低了监督成本，提高了效率。温州草根银行的灵活

作战，成为许多温州中小企业的“急救室”。

小贷难疏资本洪流

作为民间资本阳光化的桥梁，小额贷款公司备受吹捧。然而，喧嚣过后，留下的也不尽是坦途。小额贷款公司仍然面临准入门槛过高、“只贷不存”模式、业务单一税负重及多头监管等难题。

民间资本浩浩荡荡，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不愁没有资金，说它们呈“遍地开花”之势也非空穴来风。但是，对于很多民间资本，是“一纸相隔，冰火两重天”。大部分民间资本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政策画的饼，能憧憬却吃不到，归根结底，在于小额贷款公司设置的门槛过高。

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只有 16 个名额，非常抢手。温州的企业家有这样一个情结，他们之前大多是制造业出身，从事制造业很苦、很累，等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他们往往希望进入资本经营领域。小额贷款公司为他们进入未来的金融领域搭起一个平台，因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争夺更是贴身肉搏，温州不得不设置更高的门槛——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由 500 万元提高到 5000 万元，主要发起人为当地的民营骨干企业，注册资金也全部来自这些企业的内部资金。可见，小额贷款公司不是对民间资本的收编，而是一种当地有实力的民营骨干企业的业务延伸。而一直在地下游走的真正民间投资人，却被挡在门外。

曾在 1984 年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迫于政策压力，于 1989 年关停了方兴钱庄。得知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消息，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多年的地下生意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然而，小额贷款公司过高的门槛又让他泄气了，他干脆放弃了申请。“按照央行和银监会的指导意见，我完全符合资格，但按照浙江省和温州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市的规定，我根本就没有希望。”

从温州试点要求“制造型企业发起”这一规定来看，第一，由于是货币资本出资，且不能利用贷款，这不但不能给企业资金链“输血”，反而是“抽血”；第二，制造型企业主并没有太多的金融业经验，试点的高门槛却把有民间借贷经验的地下从业人员挡在了门外。

对于大多数民间资本，小额贷款公司成了一扇玻璃门，它们仍然难登陆合法“诺曼底”，徘徊在体制之外。小额贷款公司要持续发展，准入门槛应该适当放低。按照央行指导意见，三五个人，只要能凑够五百万元资本金，就够条件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上，目前温州每个县（区、市）只有一家，实在太少。在经济发达的乡镇，每一个乡镇至少要发展到三家以上，才比较符合实际需要。

即使是把合法执照抢到手的公司，其盈利空间也令人担忧。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特点是“小机构、小客户、小贷款”，而且受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小额贷款公司也不可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其盈利模式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利息收入。

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一般在国家贷款基准利率的 1.5 倍以上，最高在 3.5 倍左右。但由于 2010 年受央行连续降息影响，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息收入也逐步减少，仅靠贷款利息收益的小额贷款公司生存相当艰难。

更重要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还是按工商企业来征税，而不是按金融机构利差来征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税项包括 25% 的企业所得税和 5.56% 的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起来，利息收入的 30% 都要用来缴税。

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小额贷款公司放贷 1 亿元，利率为

16%，利息是1600万元，这1600万元需按照2.5%的普通公司标准税率征所得税，再征收5.56%的营业税。而银行是按照存贷款差缴税，同时农村信用社还有优惠政策，所得税减半，即1.25%，营业税优惠到3%。这些税率政策对于仅靠贷款利息收入维持的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小额贷款公司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其实肚子里也有一大堆苦水要倒，“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利息高，但要看到，我们用来发放贷款的就是自己的资本金，而银行是把资本金放大12倍带来的资金再用于放贷。”

温州市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是温州的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周转率高达18%，公司效益在同行中也不算佼佼者，但该公司老板也并不乐观，“按照企业投资的观点，我们的效益是不行的，远远低于把资金投资到其他行业上。”

门槛过高、盈利空间有限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受到较大限制。

只能贷不能存，也不能拆借，更不能委托，完全依靠成立之初的资本金运作，因此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在红火了没多久就面临着“无米下锅”的尴尬。

钱，钱，钱，扼住了中小企业的咽喉，也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了无本之木。

苍南联信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是1亿元，这个数目显然不够这家公司“折腾”的。该公司总经理朱良建说，“忙碌时一天就发出七八笔贷款，咨询电话更是不断。相对于市场巨大的需求，1亿元的注册资金显然是‘杯水车薪’……开业至今，累计发放贷款五六亿元，接下来半个月的资金安排都排满了，就等着收回一点放一点了”。苍南县的民营经济遍地开花，倒腾海鲜、副食品、人参……个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个都需要钱，齐刷刷盯准了这家小额贷款公司，预约的客户排成长队，苍南联信却在资金来源上卡了壳，早没了开业时见单就签的爽快。

对于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缺钱成了家常便饭。由温州奥康集团为主发起的瑞丰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农行作为瑞丰的合作银行在2009年1月融资5000万元。但瑞丰在开业的第一天就发放了2900万元的贷款。瑞丰老板潘献勇也感受到“差钱”的尴尬，“特别是2009年4月份开始，很多企业的生产开始启动，经济有所回温，后续资金明显不足……本身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金有限，再加上不属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享受银行业2%~3%的同业拆借利率。银行借钱一般比照企业贷款稍有松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在4%~5.31%，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运营成本一般就在6%左右。”

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公司也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公司2亿元注册资金，开业一个多月就贷完了。当时，银行授信的1亿元迟迟批不下来，我们做不了业务，就给员工做业务培训。2009年3月份总算等到银行的1亿元授信，不过这笔钱也只维持了1个多月，到5月中旬又贷光了，现在还有五六个大客户等着贷款，只能等资金回笼再放贷出来。”

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严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这些规定把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逼成一条线，资金来源成为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瓶颈，使得他们只能在银行和地下钱庄之间尴尬地存在着。

在贷款额度上，小额贷款公司也不能施展拳脚。根据浙江省和温州市的相关规定，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50%以上的借款人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以

温州当地中小企业的状况，50 万元是杯水车薪，别说“输血”了，“打点滴”都不够。

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在银行和民间借贷的夹缝中生存，它们既不能像银行一样吸收存款，又不能像地下钱庄灵活运作。加上税收等各类因素，其利润空间将受限制。

值得庆幸的是，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掉小额贷款公司头上的“紧箍咒”。浙江省也酝酿出台了新一轮小额贷款公司扶持政策。原来《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一年后才能增资扩股，而浙江省金融办、工商局向省政府提交意见稿，提出“只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和小企业成效显著、内控机制健全的，可允许其在业务稳定运行的情况下，提前半年按规定程序实施增资扩股”。

这项利好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它将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整体健康持续发展。以温州为例，目前只有 16 个试点，每家以注册资本金算，即使全部开业，其可贷资金也只有 32 亿元。加上 50% 的融资比例，可贷资金最多为 48 亿元。如果允许提前半年增资扩股，可贷的盘子可以扩大到 96 亿元，这对满足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来说，就不再是“杯水车薪”了。

谁能“招安”民间资本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即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机构的资本运营方式、方向、机构及空间布局。

在中国，民间借贷资本受制于金融抑制。不过，以行政手段为依托的金融抑制确实很难实现对规模浩大的民间资本的合理布局，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也很难产生“帕累托最优”的效应。因而，金融改革需要深化，不过，仅有小额贷款公司这一条路，恐怕难疏资本洪流。

过高的门槛，使得收编“地下钱庄”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温州银监局调查数据表明，2007年，温州市民间融资总额约为2200亿元。按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最高额每家2亿元人民币来算，温州全市即将成立的16家小额贷款试点公司可以利用的资金最多为32亿元，这个数字还不及温州民间融资的一个零头，收编民资一说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数目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以小额贷款公司现在的生存状况，难以挑起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大梁，小额金融公司的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一些。

首先应适当放低门槛。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是特殊产品——人民币，政府相关部门为了保证它的安全，提高门槛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要保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准入门槛应该适当放低。按照央行的指导意见，三五个人，只要能凑够500万元资本金，就够条件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上，目前温州每个县（区、市）只有一家，实在太少，有人建议一个乡镇至少要发展三家以上，这应该更符合温州民间资本的实情。

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刚起步，业务范围较小，产出效益有限，建议对稳健、合规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尽快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适时准许其增资扩股；允许把抵押贷款和低风险资产转让给银行，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银行融资比例，扩大信贷规模；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开展经工商局、金融办、人民银行严格审查下的一对一委托贷款业务；在赋税方面出台合理的优惠政策；纳入政府补偿基金范畴，考虑给予政策贴息或其他奖励。

小额贷款公司要开拓一条银行和民间融资之间的特色道路，还

第五章 打破金融玻璃门

要实行差异化营销策略，充分利用自身灵活、便捷、高效的特点，着力于贷款技术创新。积极探索“以利率覆盖风险、收益弥补损失”的经营战略，创新抵押贷款、保证贷款之外的贷款新产品。如信用贷款、联保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应特别重视商业银行不愿意涉及的农村宅基地抵押贷款等业务，在满足小企业、个体户、农户等资金需求的同时，也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根据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经营好的小额贷款公司日后有望转为村镇银行，这让民营企业家们喜忧交加。喜的是，持有了进军金融业的通行证；忧的是，一旦转为村镇银行，他们的持股比例将大幅度下降，而银行金融机构则成为最大的股东，将占主导地位。

对于盖着“合法”大印的正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成了绿林好汉，他们不拘小节，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乐此不疲。我们很难把这支影响力强、渗透力强的杂牌军训练成正规军，而将其取缔更不可取。适当地“招安”，引导民间借贷逐步阳光化、合法化才是正道。

吴晓灵曾说过，“为了让民间借贷有正常的途径，不要让他们扰乱金融秩序”。如果强行运转民间借贷的流向，往往是适得其反，只有因势利导，才能真正“招安”民间资本。

个人信用是温州民间借贷的载体，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个人道德属性成为监管金融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产生路径依赖，民间资本也不例外。一旦他们进入以“熟人社会”为关系核心的交易体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都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对于这种特殊的约束方式，既不能彻底屏蔽，也不能完全依赖此类单一的方式。应该在个人信用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规范。同时，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保护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合理融资方式，也不要轻易给民间资本扣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非法扰乱金融秩序罪”等多顶帽子。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民间资本合法发展；另一方面，严惩高利贷、高息贷款，对非法集资要坚决打击，保证健康有序的金融秩序。专业的小型贷款公司、民间借贷中介、信贷资产转让等，都是民间借贷发展的方向。

对于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银行的门槛仍然很高。今天，我们更需要包容性的金融体系以增加中国经济的弹性，以此来拓展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而对于在白色、黑色以及灰色地带游走的民间资本，也需要不断蜕变，从黑色、灰色的右岸泅渡到白色的左岸。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份被称为“新36条”的重要文件，向民间资开放领域之广，对民间资本支持态度之坚决，可谓空前。

其中，“新36条”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等。

作为温州资本最想进入的领域之一，金融业的准入关口正在被打开，或许，精明务实的温州资本大鳄，已准备好迎接“新36条”带来的商机，为数千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找到更加光明的出路。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
整个中国吗？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拓荒者的姿态：四海为家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

支撑这一说法的，是一个姓“温”的世界市场大版图。截至2008年末，170多万温州人散布全国各地，创办工业企业近2万家，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40多个；60多万温州人在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设立境外企业500多家，创办市场15家。

以温州为起点，覆盖全国，辐射世界，230万温州人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市场营销网络。温州人一年在全球销售商品超过6600亿元，相当于19个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

奇迹的诞生往往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温州土地稀缺，地处天涯死角，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但是，在浓厚的商业氛围的催化下，偏处一隅反而成为催化剂，不单单激励着热血沸腾者义无反顾地在这里开天辟地，同时也刺激着温州人放宽视野，以万般豪情为梦想寻找落脚现实的契机。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却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的从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了中国、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1984年11月，已经到而立之年的饶道新花7元钱买了一件仿制的军大衣，提着20斤海米北上烟台。

在少年时期，饶道新就经常穿着短裤，拖着板鞋到海边去看渔民拉网，他祖父以向渔民收购鱼虾卖到城里各海产品市场为业。每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天看着祖父把收购的鱼虾拉走，这段生活经历为其日后从事海产品加工起了决定作用。

“十年动乱”时期，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饶道新被迫离开学校，当时他父亲在水产公司工作，他经常跟着父亲到海边收购鱼虾，还会随着渔民下船出海。后来，他也进入水产公司工作，并逐渐熟悉了海产品的种类和等级，开始到大连、广州、上海等地进行推销业务。

20 斤海米很快脱手，这给初次闯荡烟台的饶道新留下深刻印象。经过观察，他发现烟台三面临海，市场上鲜活海产品多，但加工的少，且还是分散的手工加工，价格比南方高出很多，如果从温州贩运到烟台来销售，大有利润可图。于是，饶道新从温州发来 400 斤海米，在烟台中心区的商厦设立专卖柜台，迫于资金压力，他只能自己蹬三轮送货。

饶道新是个有想法的人，并不满足于蹬三轮车送货，在烟台销售着来自温州的干海产品，让其萌生了筹建加工厂的想法。想法已经确立，只是现实条件还不允许，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后，终于在 1993 年，饶道新创建了烟台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圆了自己的创业梦。

从 1984 年走进烟台，到 1993 年在烟台创办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再到后来新海公司成为烟台市委、市政府重点扶持的私营企业，成为一颗璀璨的黄海明珠，饶道新当年手中贩卖海鲜的提包换成了现代化的厂房。现在的他，喜欢坐在地球仪前，在徐徐转动中，体会着世界就在眼前的感受。

苏小和曾经用“游牧经济”来定义温州经济发展，即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90% 的温州生意人都选择了去外地跑单帮，温州生意人都在路上，他们积累起的第一笔财富，是在外地找到的，这就是所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谓的“游牧经济”。

当地条件的限制，以及温州人开放、敢闯的心态，让其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商业意识还未完全苏醒的状态下，就开始将眼光放开，将步子迈开，走上了去他乡寻找财富之路。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市场经济风气渐浓，各地兴起建市场热，给区位条件较差的温州市场带来挑战，此时，温州商人开始意识到，不能再“坐着”等生意上门了，于是他们“走出去”开店办厂，温州市场发展模式在全国各地被“走出去”的温州人大量复制。以温州为商品生产基地，以在外网点为营销渠道，彼此之间连接成一条市场与财富的“生产营销流水线”。

到底谁是温州外出办国内市场的第一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从北京、上海到新疆、西藏等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温州商城，是温州商人“拓荒”战果的最形象说明。据不完全统计，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000余家，贸易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贸易业销售额的3倍。

通过“走出去”，温州商人不仅活跃了各地市场，在此过程中，温州人的经济观念也得到了相应提升，一个个市场奇迹不断被创造出来。

1997年，温州女企业家王荣森包下延安30口油井的开采权，吹响了温州人进军国内资源市场的号角。此后，矿山、森林、房地产、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等，从商贸市场起步的温州商人不断涉足新领域，扩充和升级着自己的市场体系。而温州，也已经不再只是“小商品”的代名词。

1998年，温州商人在巴西圣保罗创办我国第一家境外专业商品市场——巴西中华商城。以此为开端，温州商人先后又在西班牙、芬兰、阿联酋等国家设立了近20家境外中国商城，从最初的分散经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营到如今的抱团发展，逐渐形成了温州品牌和产品输出的国际市场网络。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有形市场逐渐式微，很多温州商人又适时而动，转身从事电子商务、虚拟经营和连锁专卖等，开始全面打造“产销两头在外”的无形市场。此时，不变的是温州商人依旧不断演绎出市场变迁的神话，而温州的市场网络却开始出现质的变化。

2005年，在当时最为流行的网络游戏《大唐风云》中，出现了“李世民”赏赐士兵吃绿盛牛肉干补充能量的情景。这种传统食品结盟虚拟网络的营销战略，为绿盛牛肉干的市场销售装上了冲刺引擎。这种商业模式的打造者，就是畅翔科技集团总裁，温州商人林东。

在通过“牛肉干+网游”的商业模式挖到第一桶金后，借助网络的力量，林东还掀起了一场差旅革命，成立畅翔中国网：某公司与畅翔签约后，出差人员的主要出差费用通过畅翔的系统支付，出差人员登机、入住酒店，只要拿着身份证即可。畅翔网所提供的服务不但保证了出差费用的透明度，有效预防作假、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还可以帮助客户节约差旅成本。因此，林东还登上了全球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成为2008年第一期财经人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温州商人从温州走向全国，甚至走向全球，依靠“走出去”战略，突破了当地发展瓶颈的制约。凭着“拓荒者”的姿态，温州人不仅造就了温州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激活了其他地区的经济细胞。

项目饥渴症：从棉花、油井到黄金

世界上只有一个巴菲特，但温州人却是个个想做巴菲特。温州不缺资本，缺的是资本的用武之地，缺的是放大资本的途径，即缺少可以运作的项目。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于是，很多温州人见面时的第一句话，不是“吃了吗”诸如此类的家长里短，而是“最近有什么投资机会没有”的投资项目探讨，而且，这种“项目饥渴症”在温州企业家中具有普遍性。

需求是激发行为的原始驱动力，温州企业家渴求着让资本得以放大的投资项目，在这种原始驱动下，温州资本依据其灵敏的嗅觉，踏上了一段段投资旅程。这些投资过程，内容不尽相同，结果也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贯穿在投资过程中的资本的生命力。

投资棉花做成“实业”

2000年初，国家逐步开始放开新疆棉花收购市场，棉花收购主体日趋多元化，由原来的单一收购主渠道演变为多渠道收购。2003年，棉花市场收购全面放开后，新疆增加了许多民营棉花加工企业。

此时，众多看好棉花投资市场的温州人也闻风而来，2002年秋，温州民间资本大规模涌入新疆棉花收购加工领域。2002年以前，在主产棉区阿克苏地区的棉花加工厂只有百余家，主要从事轧花、制胎等，但到2003年底，就增加到190家左右，2004年甚至突破了300家。“两年时间，翻了2倍，其中至少有1/2的工厂由温州老板开办”，据知情人表示，当时温州介入当地的资金约有120亿元。

企业和厂房的增加，也增加了棉花的需求，新疆棉花收购开秤以后，以温州商人为主的民营棉花收购企业就四处出击。这种迅速加剧的竞争激烈程度，导致棉花价格一路飙升，2003年9月，一家浙江民营棉企刚进新疆收购，就在当时市场价上加了1.2元/公斤，新疆各主要棉区籽棉收购价甚至超过8元/公斤，创新疆当地棉花收购的最高历史纪录。

进入新疆第一年，棉花确实让温州商人大赚了一笔。2002年10月，温州人周先礼携带着65万元的本金加入到收购棉花的大军中。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当他由新疆回来，别人问他赚了多少钱时，他没有说具体数字，只是含混地说了句10万元以上。

10万元，应该只是保守数字。当时投资棉花的利润约为30%，在高利润的带动下，一年后，甚至一些不产棉地区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轧花厂，加之进口棉花的时间和数量过于集中，2004年中国棉花价格急剧下降，主营棉花的企业普遍亏损，温州棉商也损失惨重。

有“白金”之称的新疆棉花让众多温州投资者又爱又恨，随后大多数资金被困，直到2008年很多人仍没有收回投资。无奈之下，很多投资者只得选择继续为棉花“费心”。但棉花市场已经进入微利时代，通过赌一把而赚大钱的机会几乎消失，面对变化无常的市场，温州商人选择以“快”来应对。一些温州轧花企业，采取了“快加工、快销售”的策略，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来扩大棉花的收购量。虽然单位利润大大降低，但通过快速运转，还是可以通过“积少”的方式最终达到“成多”的目的。

从追逐高额利润，到更加懂得尊重市场的“做实业”，尤其是在“投机”碰壁后的“去留”问题上，温州资本表现得极为理性。

投资油井的夹缝求生

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为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包括石油开采在内的传统垄断领域，进行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开了绿灯。

经过50多年的开发，国有石油企业在新疆的几个富含油气资源的盆地留下了大量的“低效油井”，对于国有大型石油企业来说，这些已停止开采的油井并没有太大的工业开采价值，但足以让急于进入石油开采行业的国内民间资本变得躁动不安，其中，温州资本就是最活跃的民间资本之一。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2005 年，当地就开始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温商在石油城克拉玛依一下购买了 15 口油田，按照当时的行情，每口至少需要投资 150 万元。“温州炒油团”的名号由此而出。事实上，早在 1997 年，一位名叫王荣森的温州女企业家，就曾在陕西延安包了 30 口油井的开采权，成为全国闻名的“石油女”。但是，在当时的各种因素制约之下，她的承包油田之旅以五六百万元的损失结束。

前辈的失败教训，并没有阻挡后来者的脚步。据统计，截至 2005 年 5 月，温州人在新疆已经控制了约 120 口油井，投资总额在 18 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后续加工的炼油设备等投资，温商在新疆石油领域的投资总额超过 50 亿元。

2005 年初，温州油商林正平赶赴新疆，春节前他在新疆看中了几口油井，需要 200 多万元的投资。春节期间，林正平通过亲朋好友筹集到了这笔资金。之所以如此急于投资油井，林正平自己算过一笔账：油藏较浅，平均不到 1000 米，打一口井一般只需十几天，投资约 50 万元。按一口产量中等的油井每天出油 2 吨、每吨原油 1500 元计，每天收入达 3000 元，一年的产值就是投资额的 2 倍。除去开支，每年至少有利润 50 多万元。

温州乐清的一位王姓企业家也有同样的想法：“油井不比煤井、其他矿井，风险要小很多，以前有做煤矿的朋友，一遇到矿下出事，钱就全打了水漂。做油井的生意风险小些，利润也足。”

但是，在新疆投资油井就像赌博，谁也不知道购买的油井能采出多少油，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满载而归。一位东北的女投资者将 70 万元的积蓄全部投入油井，最终结果却是滴油未出，人也接近崩溃。

与其他地方的商人投资油井方式不同，温商投资新疆石油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挂靠当地石油公司或勘探公司搞“联营开发”，其背后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深层次的核心是，温商与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互助”——地方政府得到油井后，再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进行开采。

这种方式也直接点出了温商购买油井的“尴尬”，即“我们买的其实都是小油井和小气井，有一些已经快被开采完了，仅余一点点的石油，日产量也不过几十桶”。温商承包的这些边际废弃油井，在石油管理局内部称为“低效井”。

拥有石油勘探和开采权的当地企业，将小产量油井的投资权转让给温商，温商必须上交一定的计划油量，或缴纳双方约定的投资额。当上交了计划油量后，温商手中往往还剩有一部分原油，后者可以直接出售或经过加工后出售，这才是温商们主要的利润渠道。

诚然，石油产品并不缺市场，长期倒油的“油耗子”在新疆遍地都是。但温商投资油井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心中时刻充满着担忧：“我们就像在政策边缘走钢丝，随时都可能跌落下来。”甚至有人这样反映：“个别地区，先是允许温商开采石油，等投入大量资金，开采后，又将油没收了。”

实际上，在与新疆邻近的青海柴达木盆地，一群私人井主已经陷入困境：从2004年11月起，100多口油井的私人业主没有收到国有石油公司一分钱的油款。青海的消息也让在新疆的温州油商心生忧虑，“石油是块肥肉，你千方百计挤进去，好不容易抢了一小块，但真正咬到嘴里，这样那样的阻碍又不会让你吞进肚子。”这句话，形象地反映出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油井的尴尬状态。

但面对这种尴尬，身为草根的温州民间资本也无计可施，只能在政策和国有油企的夹缝中，寻找立足之处。

危机下的黄金热

春江水暖鸭先知。随着楼市新政逐渐发酵，温州资本圈占楼市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的热情渐渐被浇熄；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下，股市的萎靡不振也让温州资本有些寒心。现在，“不在楼市，就在股市”这句曾经的温州民资投资定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2010年5月，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最新调查显示，温州民资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流迹象，仅在当地银行的存款，就已经“膨胀”到5000多亿元，同比增长20%。但回流只是短暂的停留，逐利的温州资本不会停下投资脚步。

与楼市的低迷、股票市场的不振不同，一向不温不火的黄金市场却开始惊现“大逆转”。自2010年2月，月销售额增长幅度在150%以上。这样的销售涨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部分民资已转投黄金市场的“怀抱”。

事实的确如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背景，黄金作为一种补充意义的货币，成为长期避险的工具，也成为温州资本一个新的投资载体。

最近北京黄金消费市场传出这样一个消息：一位特殊的买家为规避所谓的通胀风险，一次性购买了近50公斤的黄金。这位黄金购买者是一位来自温州的商人，用来购买黄金的这笔资金，原本是投资在房产市场的。但经济形势以及政策的变化，让他不再看好楼市，经过朋友介绍，他阴差阳错地投资了黄金，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赚了100多万元。

2010年5月，前来北京金顶集团进行黄金咨询的客户数量增长了3~4倍，其中，很多是温州客户。这些温州考察团至少拿着几百万元来购买黄金，一个月内，就有3批手持上千万元的人来金顶集团购买黄金。

现在，对于到底有多少退出的温州炒房资金进入黄金投资市场，还没有一个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分进入黄金市场的金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额和退出的温州资金相比，还只是一个小数而已。

但是，当金融危机阴云还未散去，市场资金陷入“欧债迷雾”之时，政策吹响了新征途的号角。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规定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包括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金融服务、商贸流通、社会事业、国防科技工业等。可以相信，随着准入门槛的进一步放开，其他无形门槛也将会被打破，这是民间资本的一大利好消息，尤其是存量丰富的温州资本，可供其应用的范围更广。

政策开始放手允许民间投资，瓶颈因素正在逐步消解，充裕的民间资本，激荡着这些投资手笔的频频甩出。明天，又会有多少温州资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跑马圈地：东南飞，中突，西进

温州资本拥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平衡的大局观以及特殊的消息渠道。这支由钱打造出的队伍犹如狼群，行踪不定，颇有些神秘感，却往往又凭借着逐利的天性出没于每个可能带来超额收益的地方。

而且，一旦看准，为抢占发展先机，温州资本就会立即涌入，由此，一轮轮的资本跑马圈地行动展开了。

温州资本上演“东南飞”

对于每一个蕴藏收益潜能的地方，温州资本几乎都不会错过。与此同时，对于每一个资本潜能即将被挖掘一空的地方，温州资本几乎也可以感知到。

在很多人眼中，宁夏是中国西北部一个欠发达地区，但在温州人看来，它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因此，温州资本没有忽视宁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夏，多年来，约有 3 万人、60 多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在宁夏落户，这无疑也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从 2000 年开始，七八十位温州商人陆续撤离宁夏，带出了至少为 5 亿元的资金，而转投向上海、广东、江苏等地，踏出了一条“资本东南飞”的转移路径。

1981 年，温州人就开始进入宁夏低端服务市场。修鞋、木工、弹棉花等，在这些当地人“瞧不上”的领域内，活跃着一群精明肯干的温州人，而温州人的务实也让其收获了应有的回报。此后，成功的温州人不断将亲戚朋友带到宁夏共同发展，对行业的不挑剔加上辛苦劳作，使得温州人在宁夏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

但是，2000 年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温州商人将资金撤出宁夏的现象。其中的缘由，可以从下面这个案例看出端倪。

李某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人行走全国的经商热潮中，他来到宁夏开始经营实业。经过数年的运作，李某在宁夏的海绵生意越做越大，当产生成立海绵生产企业的念头时，他脑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将工厂设在宁夏。

当 2003 年李某准备好充足的资金开始进行选址和审批工作时，却遇到了重重阻力：烦琐的手续、主管部门效能的迟缓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让他的项目一直无法成行。最终，失去信心的李某，选择宁夏周边的兰州投资建厂。就这样，原本应该属于宁夏的 2000 万元投资，“被流向”了兰州。

此外，同样的原因，还使得温州商会在宁夏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曾经申请建设的温州大厦和温州花园，被当地政府拖来拖去，就此一项，“拖”走的还有 3 亿多元的投资。

哪里的投资环境良好，资本就会选择在哪里落脚，温州资本自然也不例外。在不看好宁夏投资环境后，温州资本开始流向上海、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广东、江苏等东南部城市，与宁夏相比，这些城市不仅经济发展起点较高，而且投资环境也具备更多的优势，温州资本“何乐而不为”？

以江苏无锡为例，为吸引温州资本的投资，无锡市政府通过两项政策：首先，凡是在无锡投资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温州投资商，政府会为其发一个证件，上面有市长和公安局长的姓名与电话，当投资商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可以直接拨打无锡市长和公安局长的电话，会获得快捷解决；其次，无锡市政府还将城市的某一块地皮免费让给温州商会去运作，风险由商会承担。

从被对待态度上的不同就可以看出，温州资本之所以转向东南方，并不仅仅是嫌贫爱富，与各个地方的发展潜力也有因果关系。

而中国东南部沿海城市、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历来都是温州资本青睐的地方。在上海，到处都有温州资本的投资身影：

以“胆大包天”闻名的均瑶集团，不仅在浦东康桥设立经营中心，还出资数亿元在徐家汇商圈打造了一个甲级写字楼——均瑶国际广场。

以教育投资为主业的建桥投资发展公司，在上海创办了投资最多、教学质量最好的民办学校之一——上海建桥学院，此外，公司还涉足房地产、文化传播、酒店等行业。

以投资工业房地产为主业的吴泰集团，在上海浦东区建设工业园后，又在南通海门征地上万亩，创建大型市场。

华东电器集团在入驻上海浦东区后，2006 年在南京路并购一幢商业楼，开设圣德娜购物中心。

以电器生产为主的中发集团，2007 年在上海青浦区置地 200 多亩，再建生产基地……

截至 2007 年，温州人在上海创业的人数达 20 万，创办企业约两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万多家，在上海的投资总额超过 2000 亿元。此外，温州企业不仅在上海参与经济活动，还积极融入上海主流社会，在上海参政议政，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升在上海以及世界的新形象。

温州资本突围中部

在整个中国版图布局中，中部地区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继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涌现出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及中共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部地区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中原定，天下安”，中部地区是中国的心脏地区，起着承东启西、辐射八方的作用。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此后，“中部地区崛起”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契机。

当国家提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时，郑州人适时提出“中部崛起看郑州”的口号，同时，郑州也进行了相应的招商引资举措，而长袖善舞且携带着强盛民间资本的温州人，也似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2006 年，温州商人在河南投入 100 亿元巨资，且全部投向房地产行业，触动和加速了河南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升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房地产行业的开发思路。对于河南而言，100 亿元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概念，更是一种经营、管理的新思路。

2007 年以来，温州资本在河南的投资与前一年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几大温州资本投资的项目上就可窥见一斑：

2007 年 4 月 1 日，温州人郑德强创办的河南一德电气有限公司与瑞士乐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河南制造风力发电设备，投资约 15 亿元，未来 5 年内总投资将达到 35 亿元；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07年9月16日，由7家温州民营企业联合参股投资，集生产、研发、展示与销售于一身的温州特色工业园在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工业园区开工奠基，项目总投资为4亿元，年产值约20亿元。

.....

截至2007年底，在郑州的温州商人约有8万人，商户近1.6万家，主要集中在制造、地产、贸易和物流等行业，而郑州市温州籍经营者的年产值已经超过百亿元，年销售总额超过1500亿元。

除河南之外，武汉也是温州资本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从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一拨拨入驻武汉商业中心汉正街，到20世纪90年代温州人转向专业批发市场，从事行业扩大至13个，截至2008年，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约有17万温州人，约占在外温州人总数的1/10，而武汉温州商会是国内所有温州商会中队伍最庞大、机构最完善的商会之一，下辖13个分会，3000多名会员。

水往“高”处流，温州人的钱就像水流一样，哪里利润高就往哪里会聚和流动。从区域经济而言，在一些发达地区，由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成本约束，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了资金回报不高，而中部地区却不同。以河南为例，河南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2005年河南经济增速达到14%，投资基础良好，投资回报率也相对较高。

2003年，游兆锡经过朋友介绍来到郑州，创建了河南金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他将目光停留在河南西南部的新野县，选择的项目是在新野县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中心建设金府街，整个工程项目占地100多亩，总投资2亿多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项目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在步行街开市的当天，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所有商铺销售一空。

在河南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演绎了一位温州商人的地产界神

话，而这也正是中部地区吸引温州资本之处。

温州资本挺进西部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西部与中部、东部地区的差距有目共睹，当西部大开发战略将这种差距日益缩小时，市场的牵引力也开始成为西进快车的动力之源。

市场在哪里？“西部是西部的，东部也是西部的”，对于处于大开发中的西部地区来说，占中国国土面积 2/3 的西部是天然的市场；对产品而言，东部是相对饱和的市场，而西部市场却具有天然的“后发优势”。

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营造政策、法律、服务环境等引导资本、人才进军西部，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即“中国经济的第二推动力，正由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力量所主导，并日益向中西部地区策动和转移”。

而在这场带有一定政府引导色彩，但更多由民间资本力量参与的西进运动中，温州资本表现得异常活跃。

1997 年，超过 100 家的温州灯具企业大举外迁，包括灯具制造商、经销商和为其配套加工的企业。事实上，企业外迁以及资本转移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温州，整个浙江甚至东部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扩张趋势。特别是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到 2002 年时，就有 10 万多人从当地出发，携带资本进入四川经商。

2003 年，温州鞋业开始“西进”，随后食品、纽扣等行业开始向西部省份布局，大部分企业是将制造环节向西部地区转移。在整个轻工业西进的转移过程中，最有力的推手不是政府，而是一只无形的手——成本。温州有相当一部分制造业是“候鸟经济”，总是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08年，制鞋行业整体成本比前一年增加20%，而皮鞋零售价格却没有上涨，造成企业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出现了有单不敢接的现象。除了制鞋原材料成本上升之外，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变化和金融危机等，都使得东部省份的大部分鞋企进退维谷：仅在温州瓯海区，将近1/3的中小制鞋企业倒闭或惨淡经营。

情势所迫，更多的企业向西部转移，奥康集团在重庆璧山县打造的西部鞋都总占地1000亩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中国西部最大的鞋材交易中心。此外，1600亩的二期工程，也将建成西部的成鞋成品交易中心和质检中心；已经进入前期规划的占地2500亩的三期工程，则会建成皮具、制革和制鞋品牌企业的生产加工基地，到时会将引进一批知名制鞋企业。

当然，除成本因素之外，温州轻工业的转移，也为其开拓西部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制造商品外贸受阻，温州外贸制造行业不得不开始转向国内市场，这势必会引发中国产品的内销之战，而广阔的西部市场无疑会成为各外贸企业的逐鹿之地。而奥康集团的重庆红火鸟鞋业，每年就有700余万双皮鞋从璧山销往西部市场，占奥康年销售总额相当大的份额。

温州创投：投资风向标

温州资本的确很丰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温州资本嗅觉的敏锐，“炒到哪儿，火到哪儿”。但嗅觉的敏锐，有时也难免跟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最近几年间，受金融风暴影响，温州资本有些“受伤”。

在2008年股市的惨烈下跌中，温州人也不能独善其身，同样损失惨重，“30%就算赔得少了”。

2009年，在煤炭行业刮起的“国进民退”风潮中，随着山西省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国土资源厅一纸通知，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 500 多座煤矿几乎全部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

2010 年以来，针对全国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畸高的状况，国家频频打出宏观调控的重拳，房地产投资成本不断攀升，很多温州投资者明确表示近期不再买房。

.....

被温州人津津乐道的投资通道一个个在逐渐缩小入口甚至关闭。正当人们质疑温州资本下一站该驶往何处时，温州资本早已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创投，即创业投资。

2008 年，来自温州银监局内部的抽样调查显示，约有 1000 亿元流动资金进入创投领域。而 2008 年 8 月，在上海举行的“Sinohead 第二届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就引来 50 多位温州企业家。截至 2010 年 5 月，最新数字统计显示，有 1400 亿元温州民间资本涌入创投领域。

温州，是一个几乎全民皆商的城市，在发展创业投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庞大的民间资金做后盾，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军团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善于利用地缘和血缘产生的信用体系抱团作战，结果也往往是所向披靡。“抱团”即意味着诚信体系的缜密而稳固，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温州人的金融诚信度指标排名全国最高。

对于创投而言，投资方、创投机构和被投资企业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也构成了诚信的三大主体，其诚信机制必然决定着创投的发展空间，也决定了创投机构与企业的战略双赢。只有创投机构保持高度的诚信，投资者才会将更多资金投入，而军团体系，恰恰铸造

看不懂的



了温州创投的高诚信度。

其次，经验优势。

温州经济就是一条民营经济发展之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可以在温州找到创投的雏形。

当时，温州存在一种特殊的名为“活会”的融资方式，当一个人想要创业却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可以发起集会，以招标方式筹资，有利息，且实行会员制，加入者期望投入的资金有一定程度的增值。

而温州之所以民营企业发展如此之好，“活会”功不可没。但“活会”的投资者或被投资者多限于朋友、亲戚等特殊关系，也限制了其发展规模，决定了其无法发展成专业的投资公司。而现在创办的创投公司带有更多的现代气息，致力于创造性、专业性和品牌性，起点较高，无疑将会探索出一条温州创投的新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创投的发祥地就在温州，而多年的创投实战经验，可以保证温州创投人把握项目的战略眼光。

再次，品质优势。

经营品质来源于经营胆识和对项目定位的自信。

在选择经营项目方面，温州人有先天灵敏的市场嗅觉、精准的投资魄力和丰富的运作经验，当然，更具备敢想敢做的勇气。

创投人所必备的特质，温州企业家几乎都具备，这为温州创投奠定了品质优势。

在创投这条路上，林阿信是温州走得最早的人。2006年3月，他在上海成立了首家以温州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首华创投。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首华创投的第一期创投基金并不多，只有3000万元，股东以林阿信和上海温州商会的会员为主。

温州人的血液里毕竟天生有着对资本的敏感，他们对创业投资

第六章 疯狂的钱：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吗？

的觉醒几乎在一夜之间。2007年6月1日《有限合伙法》正式实施，两个月不到，由乐清佑利控股集团董事长胡旭苍发起的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成立，以乐清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为股东。据当时的公开资料显示，东海创投拟募集资金5亿元，主要投资将上市的温州企业股权，到企业上市后，转让股权从中获利。

2007年11月，东海创投的几位发起人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创业投资公司——温州环亚创业投资中心，筹资10亿多元，有20多个股东。

此后，类似的创业投资公司在温州频频出现，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建筑、医疗、旅游等行业的投资、咨询和担保业务。据温州工商部门统计，由温州民间资本支撑的投资公司，已注册的近百余家。

数量众多并不一定是繁荣的表现，有时更是混乱的象征。短时间内，温州出现如此多创投公司，必然带有一定的浮躁性。2007年8月，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成立仅7个月后，就因温州投资方与基金管理方发生经营理念分歧，不欢而散。这种结果，或许可以视为喜欢通过企业财务报表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管理者与从家庭作坊中一件件生意做起的深谙民营企业的投资者之间的矛盾。

与东海创投的“壮志未酬”相比，更多的温州创投表现出了理性的光芒。

2007年8月，由胡云耿加入正泰集团负责筹建的云杉基金，在创投方面做得有声有色。2007年底，云杉基金达成第一笔业务，将9240万元投入焦化行业龙头企业山西阳光焦化集团。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经营状况与中国证券市场的预期，云杉基金对该项目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保守估计，年均投资收益率为60%左右。

2008年11月6日，首华创投与深圳东方汇富创投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东方首华温州基金，成立不久，就在北京收购了一个商业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地产项目，这个位于北京珠市口的地产商业定位为生活休闲广场，主要涉足写字楼办公、酒店和餐饮。尽管当时房价正处于下跌通道，但林阿信对北京房地产状况深信不疑，果然，在金融危机的胁迫下，北京房价在 2009 年又再次飙升。

而黄伟建带领的恒生资产管理着几十亿元的资金，并不热衷于房地产行业或类似煤矿的长周期性项目，而是倾向于做有持续性的行业。2007 年 3 月，恒生资产收购用碳粉锯末生产蚊香的企业——浙江浪潮，并对其生产线进行技改，此后，新产品生产成本下降了 30%，燃烧时间多出 25%。蚊香是刚性需求，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虽然利润仅有 7%，但庞大的产量依然可以让浪潮保持 6 亿~7 亿元的年销售额。

不畏金融危机影响，恒生资产选择在 2009 年以后继续引进新项目，基于国家 4 万亿元拉动内需的政策，黄伟建看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码头和港口建设，“当经济危机来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

创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投资，需要职业经理人将企业的富余资金集合起来，进行投资运作，对一些高科技、高利润的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帮助其发展壮大，以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就此意义上而言，恒生资产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投公司，而且还是一家有独特优势的创投。在拥有充足资金的同时，具有技术改造能力，且具备前瞻性的眼光，它是温州创投发展的目标，也是其引领投资风向的坚实砝码。

在中国，创投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其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温州，创投更是一个新兴行业，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其中，不可避免也会夹杂着不理性的浮躁与冲动，但经过时间的磨砺，温州创投必将更加理性，也可以为更多需求资金的企业提供便利，也能够为温州巨额民间资本开启一扇迅速攫取财富的大门。

[第七章]

炒煤团：暗淡退场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温州的“煤老板”

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

煤老板，这个在全国几乎最能体现和创造暴富奇迹的符号，正在经历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他们正在宿命般的坠落中坠落，也有人说，他们在该荣光的无奈中坠落。

就在前两年，财大气粗的煤老板背负着原罪在财富榜上“争奇斗艳”。暴发户、血汗工厂以及“无良矿主”……人们打着道德的旗帜，将他们钉在舆论的十字架上。从措辞严厉的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些许鄙夷和不屑——无文化、无信仰以及无创新。

河东河西，也不过几年。如今的煤老板再无昔日风光。被“一刀切”的政策逼得毫无退路的他们灰头土脸，此时透过社会舆论再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已不是——一掷千金、品位低下、暴殄天物，而是黯然退场。在这场与资源、政策法规以及行政命令的博弈中，再强大的民间资本攻势，也成了强弩之末。

这个在山西煤炭史上迅速崛起又即将走向陨落的特殊群体中，有一个格外显眼的群体——温州煤老板。2002年，他们携带温热的温州资本欢天喜地来到这块遍地是金的风水宝地，而2009年，经历过呼吁、抗争无效的“煤殇”，他们将远离这块伤心之地。

温州资本一向善于迎合政策的风向，择机而动。2002年，煤炭市场一改历经三年的低迷，有了蒸蒸日上的回暖势头。铺天盖地而来的电荒、煤荒，不断驱散笼罩在煤炭市场上的阴霾。一时间，山西煤炭业脆弱的资源开采力难以应付遍布全国喷涌而出的煤炭需求，不少山西地方政府开始绞尽脑汁地招徕外地商人。

强劲的利润召唤使得市场“春暖花开”的信号格外强烈，温州资本迫不及待地挤进煤炭市场开往春天的地铁。这些高调来到山西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的温州商人不懂煤炭开采，对煤炭市场的变幻莫测也只会皮毛，却出手阔绰。蠢蠢欲动的市场，亟须上马的煤炭扩张以及某些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交易，为温商在山西安营扎寨提供了便利之门。一些年产3万吨、6万吨的小型煤矿成为温商的抢手货。温州资本进驻山西，不外乎光明正大地承包和私下承包两种。

2003年，在山西承包一个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启动资金需500万元左右。按照当时的行情，每吨煤炭的成本为40元，市场卖价平均为300多元。一个煤矿若日产300吨煤，每天可进账6万元，投资10年以上就能获得1亿元以上的利润。

诱人的利润如同强力磁铁，吸引着大批温州资本源源不断聚集到山西。为了筹资，温州商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向亲朋好友借钱，借高利贷，抵押房产贷款等，越来越多从山西卖出的煤炭打上温州资本的烙印。到2004年底，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矿已成风起之势，山西境内约有400座煤矿由温州商人承包，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年产量高达8000万吨，为山西省煤炭产量的1/5，全国煤炭产量的1/20。

很多悲壮退出历史舞台的温州煤老板，还依稀记得2004年的风光。在山西煤海里徜徉的温州商人，被热得烫手的“煤炭人民币”刺激得热血沸腾，他们把山西当做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山西煤炭是一个闪光的赚钱机会”。他们不懂开采，却在山西的各个角落享受着大把大把往口袋里揣钱的幸福。有资本做底气，他们在山西出入豪华宾馆，开着清一色的奔驰、宝马，巨大的利润回报从温州商人的嘴里麻利而轻松地溜出来，“照目前的市场情况，投资1个亿，一两年就能收回投资。这两年，没有听说哪个老板不发大财”。温州“煤老板”的高调发财或许在利润上没有被他们刻意夸大，但虚荣心却在飘飘然地膨胀，他们毫无顾忌地对外炫耀他们对市场的

垄断，“煤炭每天一个价，没有赊账的买卖。你拿今天的钱，绝不卖你明天的煤”。

在不少媒体的头条或者角落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张姓、李姓或者王姓的温州煤老板的故事。一个姓张的温州人在山西经营一家旅馆，积攒了一笔钱，正发愁钱找不到出口，一个在山西的温州老乡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开煤炭”，张先生还在犹豫不决，电话那边游说他的温州老乡却是热血沸腾，“你放心吧，现在这边的浙江矿主太多了，而且个个都赚了大钱。说句实话，现在说是采煤，实际上采的是‘黑金’。”张先生打消了顾虑，带上大部分积蓄投资山西煤炭，仅一年的时间就收回了成本，开始了“日进斗金”的幸福时光。

老老实实在报道以及某些媒体捕风捉影的大造声势，把整个商业的神经撩拨得更加不安分。与微薄的制造业利润相比，“日进斗金”显然是不合惯常的市场规律与商业伦理。人们也很容易把“黑心钱”、“暴发户”这样的字眼与温州煤老板联系起来。温州煤老板，很快在山西声名鹊起，在“红”与“黑”的社会舆论激辩中凸显他们的民间资本形象——很暴力，也很暴利。

树大，则招风。温州煤老板的风光不仅会带来其他投资者的跟风效应，也更容易成为政策特殊关注的地带。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炭的投资越大，就越有控制权与话语权，影响力就越大。在很多人看来，煤炭的控制权控制在追逐暴力的民资尤其是外地资本——温州民资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政策有张有弛，国有资本往往是紧缩政策的受益者，而民间资本则寄希望于在政策放松时施展拳脚。

2004年11月底的山西大地，这一年的第二场雪悄然而至，在皑皑白雪不经意装饰下，散落在煤厂角落中的黑色煤炭分外妖娆。同时，也有充满恶意的“噩耗”接踵而来，“到2005年底，山西省将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全部淘汰年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将关闭1200家小矿。”几乎所有的温州煤老板都难逃厄运。

“关闭年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的理由，闭着眼睛官方也能列出一大堆：小煤矿技术低下，资源开采“吃肥丢瘦”的浪费现象很普遍，大多是吃菜心的做法，只吃中间最好的那部分，剩下的全都扔掉，回收率只有10%~15%，越界开采可能会造成以点带面的毁坏效果；安全投入不足，被利润驱使，安全投入被降到极限，一座座小煤矿成为定时炸弹……

在温州煤老板看来，最大的风险恰恰是政策风险。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他们可能陷入生死攸关的尴尬局面。有不少温州老板捶胸顿足，只恨当初未承包规模大一点的矿井。

温州商人经营煤矿的先天劣势——小，使得他们难以在“关、停、并”的“整顿风暴”中得到庇佑。

2005年底，温州“炒煤团”遭遇“阴阳门”。“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粗犷直白的曲风还在耳旁萦绕，一些温州商人就开始打点行李转战他方，再听这首歌，已是百般滋味。

从笑脸相迎到冷脸“驱逐”，温州资本在山西遭遇冰火两重天。当政策发生变化时，往往只有全身而退和改变自身迎合政策两条路，硬碰硬则最终落得以卵击石的下场。温州资本素以游走在政策夹缝著称，在某些政策领悟方面也会用些“伎俩”举一反三或融会贯通。但在山西，政策的面具散发着铁面无私的冷光，温州资本的韧性再强，也难有其他多赢的应付策略。有些温州商人不断转型升级，拼命挤入符合政策规定的“权贵煤矿”之列，有些温州商人不堪“小煤矿政策的反复无常”，选择退出。到2008年，有大约500家陆陆续续退出山西煤炭。不过，仍有500亿元温州资本留下来，伺机而动。

不断地走，不断地留，不断地来。多年来温州资本在舍与得之间不断权衡，也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特性，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主要为平阳、苍南、乐清等地的温州人，一共有近 200 座煤矿，仅平阳人在山西就拥有 100 多座煤矿。

“被收购”，没商量

2009 年，在政策阴晴不定中不断沉浮的温州资本并没有守得云开见月明，兼并重组的消息传来，结结实实给了温州资本当头一棒。

产权总是没有争议地同国家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对财产的支配往往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山西的煤炭与不同的资本衔接，便裹挟了不同的底色——红或者黑。为了这个优势资源在民间资本的跑马圈地中不至于完全沦落为“黑”、避免合法的强制力不至于失控，2009 年，政策终于给了煤炭开采权一道最终的行为边界。

煤老板是“道德上的矮子”，“实现中国煤炭产业做强做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哪个理由都足以让煤老板以合法而又合理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2009 年初，山西省出台了《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定“到 2011 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 1000 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 90 万吨/年以上。到 2011 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 5000 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 75% 以上”。按照规划，截至 2010 年底，全省将有 2012 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其中，由山西省内五大煤矿集团兼并重组的煤矿 1161 座，地方兼并重组 693 座，参与兼并重组的 2000 座矿井仅留下 479 座，到最后，拥有企业主体的煤炭企业数量从 2200 个变成 100 个左右。

生产规模达到 90 万吨，这是一个令民间资本望而却步而几乎全军覆没的门槛，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对于曾在山西辉煌一时的温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州资本，山西成为他们的伤心地。山西省五大煤矿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跑马圈地，500 亿元民间资本、近 200 座煤矿，约 2 万名温州煤老板却战战兢兢站在生死线上。

“煤老板终于要倒霉了”，这样的话语由于不同的心理而诠释出不同的情绪，同情民间资本在国家强制力中的无奈或者幸灾乐祸财大气粗的温州煤老板“遭到了报应”。

“山西不要带血的 GDP”，道德制高点上的评判把煤老板的“矮小”形象凸显得更为“渺小”，但这并不妨碍煤老板要争夺自己的话语权。抱团、向律师咨询、玩消失……不过，在强势的重组政策面前——被收购没商量。

早上一睁眼，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早已“恭候多时”，不管有多么不情愿，还是让急性子的官员拉着与兼并主体见面，不签就不让走。如果还是“冥顽不化”，就索性当着煤老板的面给税务局打电话，点将去查煤老板的账。

政府官员忙得焦头烂额，国有煤炭企业的也是忙得四脚朝天，不断给律师打电话，催问谈判状况，遍地是金，他们捡到手软，以至于吞下太多的煤矿，连人手都不够了，干脆边收购矿厂边招聘工人，国有企业一片生机勃勃，而即将走到尽头的山西民资煤矿了无生气。

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人黄益铤在山西的投资史，成为温州煤老板的缩影，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温州资本在山西生存的不易。

水头镇经济禀赋奇缺，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被生计逼迫，黄益铤的岳父与其他同乡一起到山西下矿井挖煤。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家煤炭资源逐渐开放。1996 年，黄益铤岳父与朋友筹资 200 多万元，在山西承包了一口煤井。但由于煤炭市场低迷，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就亏损了 400 多万元，赔得血本无归的黄益铤的岳父

等人只得把煤井转给别人。

2002年之后，煤炭市场日趋火暴，温州资本趋之若鹜。2005年到2006年，尽管煤炭政策已经对温州资本不利，但如果投资煤矿的规模足够大，符合煤炭政策的条条框框，仍有利可图。正是在这期间，黄益铤投资近5亿元，收购了山西3座核定年产15万吨的小煤矿。投资煤矿后，黄益铤花了一年多时间办理相关开采证件，终于到2008年三四月份证件办理齐全，正准备大干一场，遇到“奥运会前山西所有小煤矿临时性停止开采”的特殊政策，一等再等，却等到了被收购的终局。黄益铤投资5亿元的煤矿，矿井仅仅运转了3个月。噩耗传来，黄益铤再也不想踏上这片伤心地。

对谢有富来说，黄益铤的矿井运转3个月还算幸运。谢有富，一个2008年为在山西投资煤炭而辞职的前公务员，还没尝到甜头，就被呛得踉踉跄跄。几个朋友在山西的辉煌“煤炭发财史”，使得蠢蠢欲动的谢有富破釜沉舟。房子抵押了七八十万元，再加上亲朋好友以及战友凑的份子钱，在他的游说下，带着数个大股东和无数小股东浩浩荡荡杀向山西，以1.8亿元的价格买下山西一座小煤矿。

购买煤矿时，他们已经预见到山西整合煤矿是迟早的事，但整合的速度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我们上网查资料，知道山西煤矿整合是迟早的事，但是时间没有这么快，政府文件上说2010年底整合完毕。那我们起码有两年半时间。我们买下的那个矿资源是比較好的，一年半把本钱拿回来，再经营个一年，利润还是很高的。”

“2008年5月从上家买下后，8月份开奥运会就让我们停工。等到九十月份，我们开始搞基建，一边办理过户和其他手续，从乡镇县市再到省里，一级级往上申报批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县政府许诺，等到2009年春节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生产了。”

进入2009年，接连发生的噩梦把谢有富的发财梦击得粉碎。3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月全国“两会”召开后，山西煤炭进行整合倒计时，“2009 年底整合完毕，原来 1500 个矿砍到 1000 多个”的官方表态，搅得谢有富以及谢有富拴在一根绳上的人心神不宁。很快，他就接到了通知，他的矿将由被指定的国有企业兼并收购。随后出台的《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则彻底把谢有富最后的希望吞噬得一干二净。

自从买下煤矿，他的煤矿没开过一天工，没赚过一分钱，荒了 18 个月，还要搭上井下维护、看管煤矿的钱，每个月要花掉 100 万元。

经过三次谈判，谢有福争取到了一亿元的补偿，至于付款方式，“以县政府统一发文为准”。不知道付款方式的谢有富把协议揣在兜里以“我的主要老板不在，要等他看过”为由不签，但他的采矿证到 2009 年底就要过期，不签，就换不了证，可能连一分钱都拿不回去，谢有富骑虎难下。

“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克思这句犀利的批判光环渐隐时，人们一再拿来诠释煤老板。的确，温州的煤炭老板也顶着不少原罪的帽子：为了少交资源使用费，他们也曾使用过少报、瞒报的伎俩；他们有的甚至也会有两手准备，打着合法的幌子进行非法采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官员腐败的源头，到了过年过节就要“上贡”……道德的弱势，使得他们在接受与市场规则相反的“审判”时，显得尤为脆弱和无能为力。

《北京青年报》曾这样评论煤老板，“在山西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煤老板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他们控制着很大一部分煤炭的产量，同时也对当地的行政决策乃至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大量关于煤矿事故和官员腐败的新闻中，人们总能从字里行间窥见煤老板的身影。与此同时，煤老板又是中国最隐秘的一个富有阶层，人们能够目睹他们的阔宅与豪车，能听到他们的种种传奇故事，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无法从正常途径了解他们的详情。在历次整治小煤窑的过程中，查清煤窑的股权结构从来都是最困难的事，从比较极端的意义上说，鉴于煤炭行业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已经历史悠久，到底谁是煤老板恐怕已经无法深究。煤老板，很可能只是一群隐身人。他们从未亮相过历史舞台，所以也无所谓退出。”

“山西煤老板”，这个寓意复杂的称呼即将在历史中淹没，煤炭的特殊性再也不会催生出璀璨而真实的暴发梦想。在中国，还会星罗棋布地分散着其他地区的温州煤老板，而在山西，这样的称呼将与历史永别。在山西，一道伤口清晰而永久地打在温州资本身上。

折戟于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抛开道德的宣判，山西煤炭的民间资本在自我眷顾中彼此照应，政策些许的松动都可能成为他们共同的艰难呼吸。

不过今天，它们陷入绝地，纵然策马向前也只是在别人制造的游戏规则中兜圈子，游戏规则闪耀着他人的思想光辉。在山西的煤炭迷宫中，他们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志顺利找到合适的出口。或许，就真的只剩下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一条路。

2009年10月31日，30多位温州煤老板出现在杭州的一个浙商论坛上，他们希望有关部门救援浙江煤炭投资者在山西总额达500亿元的民间资本。在论坛上，一位温州煤老板这样说，“很多协议是以各种行政手段强迫签的，是‘霸王条款’。他们（指山西省相关政府部门）为完成上面下达的重组任务，补偿金额、付款方式都还没确定，就让我们签署协议。”他透露，很多协议因此留有“尾巴”，“协议上会注明‘以补充协议为准’，补偿标准‘根据县政府文件’。”

被收购已毫无商量的余地，温州煤老板可博弈的空间也只有赔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偿额了。山西煤炭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反映到微观层面最赤裸裸的表现就是煤老板获得的赔偿多少。

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的规定，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被兼并重组，煤矿如按照第187号令（《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规定的标准缴纳了价款、直接转让采矿权的，兼并重组企业应向其退还剩余资源量（不含未核定价款的资源）的款价，并按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或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其在兼并重组后新组建企业的股份。二是被兼并重组煤矿在第187号令实施前按照规定缴纳了价款、直接转让采矿权时，兼并重组企业应向其退还剩余资源量（不含未核定价款的资源量）的价款，并按原价款标准的100%给予经济补偿或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其在兼并重组后新组建的企业的股份。（资料来源：《凤凰财经》）

这是大多数温州煤老板接受不了的经济补偿方案。收购煤矿时，恰是煤矿前景被渲染得天花乱坠时，为了抢得聚宝盆，他们往往以高于资源价款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收购，还有基础建设和工人工资，都是大把大把扔出的钱，如果只按照采矿权价款的一半或一倍，他们还是输家。

煤矿“以白粉价买入，以白菜价卖出”，是当时坊间最为流传的一句话。煤老板认为价值几个亿的煤矿，评估出来也就几千万元。一方说对方压价，一方说对方漫天要价。在赔偿价的斤斤计较与博弈中，一个个合同逐渐摊在煤老板面前，这些醒目地标着赔偿价格的合同或者让他们痛心疾首，或泪流满面，但不管如何，句号总要画上，他们的态度或许会决定句号是否会画得更圆满一些。

投资宁武煤矿的温州人李先生于2008年6月以7600万元购买了一个储量超过1600万吨的煤矿。这个矿证件齐全，李先生接手后就

第七章 炒煤团：暗淡退场

想生产，但临汾某个煤矿出事，硬生生让他的开矿梦想成了夹生饭。李先生只得边改造设备边等待新时机，砸进1个多亿，等来的却是收购令。2009年10月10日，被收购折磨得憔悴不堪的李先生与山西焦煤集团汾西矿业集团签订了被收购协议，按照10月6日才敲定的《宁武县煤矿兼并重组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兼并整合煤矿企业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李先生可以拿到资源价款补偿和实物资产补偿为6692万元，浮动补偿（停产停工补偿及剩余资源补偿）为4352万元左右，一共1.1亿元。尽管十二万分不愿意，李先生还是签了。然而没过几天，李先生就接到通知，由于省里不同意，浮动补偿取消，李先生最后拿到手的只剩下6000多万元。

温州煤老板郑先生签下的合同让很多人羡慕。2005年，郑先生投资1亿元在山西整合三个小矿，储量共1700万吨，2009年6月，他的矿井就可以验收投产，不料遇到了重组这个“程咬金”。经过多次谈判，他拿到了最终收购价款1.69亿元。

很多温州煤老板很为他满足，“这个价格，就不亏了”。即使这样，郑先生还是不满意，“两个亿我都不愿意卖。但是，不让你干了，有什么办法？”在山西煤炭，随同整改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为之奋斗的四十年，对商人来说一生能有几个四年可以挥霍？

机会成本也成为他们在山西煤炭摔跤后常拿出来说辞。温州煤炭老板刘吉福这样感慨，“你听说过桂龙医药吧，一个从山西省神池县起家的药业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把总部做到了厦门。20年前，我在进入煤炭产业的同时，王秉林把一家山西出身的药业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做煤那阵，我们都知道人家王秉林，那时候咱就是做煤，可这些年过来了，人家在市场上杀得越来越顺，咱这做煤的，除了做煤，其他行业实在是不懂。用时髦的话说，咱们被市场经济抛弃了。煤炭资源曾经给我们财富，反过来说，也限制了我们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到外头市场上冲杀的动力。现在，煤不能做了，一把年纪还要不停摸索新机会。”

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刘吉福们挖空心思要走进山西煤炭这扇门时，王秉林却自顾自打开了医药这扇窗。当煤炭这扇门关闭时，想重新打开另一扇窗并非易事。

煤老板们反复在赔偿上“做文章”，作价入股却被静静地遗忘在角落。黄益铨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在大型国企每挖一吨煤炭成本为380元以上，而在民营煤矿中每吨煤成本为200元左右。作价入股他们得到的好处很少。况且，他们自由散漫的从商气质也与国企格格不入。

郑先生得到的补偿方式还让他有所安慰，而大多数温州煤老板对他们的所得补偿不情不愿，在他们看来，这与抢劫无异，他们的投资大都血本无归，甚至背上巨额的银行债务，历经政策波折，他们最终只落得个一地鸡毛的下场。对于他们的抱怨，山西省有关部门也做出了回应：根据宪法，资源属国家所有，不能买卖；煤炭资源领域存在不少违法违规经营、非法交易等灰色行为，这不在法律和政策保护范围之内；采矿权人是在把投资形成的资产与尚未开采的国家资源混为一体，这更不合理、不合法。

在“黑色黄金”煤炭上发财，打“擦边球”以及甚至可以拿上桌面的原罪，民间资本背负了不少，温州的民间资本也不能撇清关系。直至被无情挡在政策之外时，这些污点被再次放大，如同巨大的路障挡住他们在山西煤炭之路上继续前行。

民间资本何去何从

我们生活的时代，沧海桑田的变化，仅30年，我们就看到了。

对于温州资本，地质意义上沧海桑田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财

富暴涨的机遇。而今天，政策地震带给他们的剧烈衍变，不亚于沧海桑田。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曾说：“历史设计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一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

今天，温州煤老板的财富颠倒被描述得如此鲜活，到明天，他们可能会被岁月浓缩出几个简单的 GDP 数字，生命的气息全无。或许，没有了他们，山西 GDP 真的不再带血，色彩将变得更加明快。

在山西，离开了这个在财富世界里令众生颠倒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黑色黄金，很多温州煤老板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无助的财富瞬间蒸发让他们心碎神伤。

一步一步远去，人们更关心，伤心的温州民间资本将走向何处？

温州人在山西煤矿投资达上千亿元。这上千亿元资本中有 500 亿元从 2007 年开始就陆续撤离，还有 500 亿元左右还陷在里面，未撤离的 500 亿元损失惨重，已经撤离的 500 亿元资金中，至少有 250 亿元在寻找出路。

梦断山西，自己投资煤炭已是天方夜谭，与国企合作则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投资其他项目？对于他们，在一个地方跌倒了，再在相同的地方爬起来，真的很难。不过，折戟山西煤炭并不意味着从此他们将与煤炭形同陌路。煤炭的诱惑，让他们欲罢不能。

2009 年 10 月 27 日，山西当地一家报纸有这样一则广告——新疆煤炭寻求合作，“政府支持力度大”被特意标出，显得意味深长。也有这样的传闻，内蒙古政府邀请温州煤老板到内蒙古投资。“山西不亮，边疆亮。”很多温州资本又摩拳擦掌，踏上新的征程。然而，谁又敢打包票，山西的今天，不是新疆或内蒙古的明天？

转型，不只是山西的温州资本今天面临的命题。煤炭政策飘忽不定，不少温州煤老板早就谋划悄悄转型。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薛宇铭就已经从煤老板摇身一变成为“鸭司令”。2008年4月，薛宇铭在山西进行鸭子养殖。薛宇铭投资的生态肉鸭养殖及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完工，标准化种鸭厂、冷冻加工厂、饲料厂、羽绒加工厂等都开始运转，不少折戟煤矿的煤老板也加入他的阵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屡屡碰壁也是温州资本常见的生存态势。

2008年，刘吉福与几个温州煤老板联合在北京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就裹挟了几分清高，锁定知名项目，以期改变煤老板的草莽印象。然而，对于刚刚成立的投资公司，由于目标过大，结果无人追随，刘吉福内心的坚强也逐渐瓦解。创投公司无事可做，转而到股市找财路去了。

楼市同样是温州资本转型后涌入的领域。2009年上半年，就不断有温州的煤老板进京调研楼市，准备投资房地产，资金雄厚的煤老板干脆放弃“小打小闹”，直接进行房地产开发。借着政策的东风，温州本地的小额贷款也是红红火火，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在某些领域，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诞生的温州资本总不能气贯长虹，故事暧昧不明，前途叵测，不能清晰地辨别道德与法律的底线，焦虑如同野草狂生，直至大江东去，离当初的初衷越来越远。

不过，“人们应当为所经受的苦难而自豪，任何苦难都能成为成功者幸福的回忆”。不断的阵痛，不断的磨砺，也在不断地坚韧与强大。温州商人，这个走在世界的排头兵，将会记住他们有过的血泪教训，坚持他们一贯的坚韧，整装待发。

[第八章]

炒房团：所有购房者的
假想敌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在很多人印象中，温州是一个背负着原罪的城市，这个领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从改革开放至今，常常在大喜和大悲两端挣扎。喜的是，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活力的代名词，悲的是曾因假冒伪劣等引发的信任危机。

而进入 21 世纪，温州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炒团经济”，“炒房团”、“炒煤团”、“炒车团”等一系列符号，让温州面临新的困境。

在温州诸多“炒团”中最引起人们“公愤”的，是最早诞生的“温州炒房团”。有一次，笔者到苏州出差，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温州人，结果司机马上就骂起来，说苏州房价都是被你们炒起来的，我都买不起房了。

除笔者之外，还有更多的温州人经受着质疑与指责。李丽，一位户口早不在温州的女孩子，却因为自己祖籍是温州和大学室友大吵了一架。当室友们讨论温州一位中学校长家访被杀事件时，一位家境不好的室友突然指着李丽说：“死得好，你们温州人把我们的钱赚光了！”当时李丽觉得莫名其妙，“校长家访被杀和把钱赚光完全是两码事，干吗要扯在一起呢？”

此后，李丽开始有意收集对温州的报道，“我总结了一个规律，这两年对温州的报道有四多，噱头多、夸大其词多、移花接木多，臆测多。”关于“臆测多”，李丽表示：“现在是这样，哪个城市房价涨了，有媒体就会说温州炒房团到这个城市把房价炒高了，然后会举出一些没有确切统计又不说明确切情况的数据。比如，2006 年深圳房价飙升，有媒体就说温州炒房团携 200 亿元资金杀奔深圳。温州人真有可能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能耐吗？”

无论温州人是否有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能耐，但毋庸置疑的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是，被外界和媒体冠以“炒房团”之称的温州人，似乎却真成了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有人视他们为投资理财的高手，更多人认为他们是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者，炒高了房价，是很多人买不起房子的罪魁祸首。

2001年8月18日，来自温州的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内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由此，“温州炒房团”诞生。

但其实，温州人的“炒房”行为最初是从家门口开始的。1998年，中国房改拉开大幕，从福利分房过渡到商品房阶段，房产成为市场流通的商品之一，这为温州当地充足的民间资本提供了进入的领域。自1998年到2001年，民间资本的进入，促使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超过7000元/平方米，并一度无房可炒。

此后，精明的温州人迅速将资金转向临近的杭州与上海。

自1999年开始，杭州房价一路暴涨。2001年夏季，温州炒房团介入杭州房地产市场，当时杭州房价为4000元/平方米左右，温州资本进入后的几个月时间，每平方米房价就上扬了1000~2000元。2004年，杭州房价已经上涨到7000元/平方米的高位。

在杭州购房者中，有20%是温州人。当温州购房团撤出杭州后，杭州市中心区房价高达8000元/平方米，以至于当地政府为抑制房价虚高，对炒二手房者征收20%的个税，对购买高档住宅者征收原价3%的高税率契税。

2001年，温州购房团“杀入”上海。当年，上海普通住宅、公寓以及别墅的季度销售面积平均增长率就高达15.2%、16.7%和22%。其后，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资金由温州进入上海，一些周边地区资本也开始跟进，加上当时股市委靡不振，人们相继将资金投入

房地产市场，导致陆家嘴、徐家汇和青浦区等热点地区的楼盘价格急剧走高，到 2003 年年中，淮海路一带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突破 20000 元/平方米大关。

2003 年 11 月 23 日，温州人包了三架飞机集体飞往深圳，参加新龙岗商业中心二期楼盘开盘。当天，600 多套商铺被抢购一空，其中上百套落入温州购房团手中。随后，在 12 月 12 ~ 14 日为期三天的深圳房展温州推介会上，温州购房团掷下 1.3 亿元，成为深圳 400 多套商铺或住宅的业主。

此后，温州购房团开始四面出击：向北越过长江，征战北京、济南、青岛、大连等；向西奔赴武汉、南京、重庆、成都等；向南到海口、三亚、厦门等。温州购房团所到之地，房价往往都出现明显上涨，很多城市的房价甚至超出了当地人的购买力。这样的情景一次次上演，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间，上演着相同的版本。

因此，很多当地人将房价的飙升与温州购房团二者之间画上等号，将怨气出在温州购房团身上，全国各地媒体也发起声讨。2003 年 9 月 22 日，一篇题为《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的报道掀起了有关“温州炒房团”的炒作，称“温州人炒高异地楼市”。该报道说道：“温州人不仅在本地炒房，而且还把目光瞄向全国各大城市……经多方求证、讨论，各方比较认同的数据是：10 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 1000 亿元。”此后，这一数字不断被引用并扩大到 1500 亿元、2000 亿元以至 5000 亿元。

毫无疑问，仅从对温州炒房资金的数量描述一项，就可看出，这些报道难免有夸张的成分。据温州市人民银行 2004 年 4 月底的统计，包括 100 亿元外币存款在内，全市各项存款的总额为 1846.27 亿元，扣除政府存款、政策性存款及各类企业存款，居民个人存款为 900 多亿元。温州资本数量，不足以支撑上述报道中用于炒房资本的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数字。

而且，房价的飙升与温州购房团之间真的存在必然联系吗？或者各地的高房价真的是温州购房团推上去的吗？依笔者看来未必。

以一路高歌的杭州房地产市场为例。1995～1997年间，杭州市中心商品房销售价格为4000～6000元/平方米，主要集中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地段稍微偏离市中心的房价范围在2800～4000元/平方米。1999年，杭州市中心的房价开始涨到4500～6500元/平方米，主要集中在5800元/平方米左右，稍微偏离市中心地段的房价集中在3500～4800元/平方米。

自1999年开始，杭州房地产开始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而恰恰就在这一年，杭州土地供应量却创历史新低，仅500亩。在此之前的1995～1999年，杭州市共出让地产开发用地4407亩，其中仅1998年一年就有2200亩。

2000年是杭州房价飙升的一年。市中心房价在6800～9000元/平方米，稍微偏离市中心地段的房价稳中有升，平均单价为3600～4500元/平方米。此时，市场供需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但杭州坚持“非饱和适度供应，有计划出让，保持卖方市场”的供地政策，大多数开发商处于“半饥饿”状态。

一边是已经释放的购房者潜在的购买欲望和长期积累的消费需求，一边是建立在土地供应不足基础上的商品房供求紧缺。巨大的需求缺口使得此后的杭州房价连年攀高：1999年均价3000元/平方米；2000年为4000元左右；2001年，几乎没有3000元以下的房子；2002年，4000元以下的商品房几乎没有。

在市场配置的情况下，房屋的价格和数量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取决于供需曲线的均衡点。供需之间的失调，或许才是房价不断飙升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不断趋高的地价也推动着房价的上涨。

而高速上涨的房价，为温州购房者提供了足够的利润空间，精明的温州人最先在杭州淘走了第一桶金，但他们远远不能决定市场本身。

但不可否认的是，炒房者的存在，也的确折射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矛盾。而且，在房地产这个暴利市场，也不仅仅温州人在炒房，只是，在这个房产投资受到空前关注的时代，“温州炒房团”成为了一个代表和符号而已。

炒资：何处来，何处去

遍布全国的温州购房大军，固然是被利润所驱使，同时也是温州汹涌的资金在寻找出口。

相较于其他投资，炒房显而易见的优势是短线投资，风险小、见效快且获利高，从2001年到2003年底，在房地产赚取50%甚至100%利润者比比皆是。

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却没有温州如此高的炒房热情。以浙江省为例，2004年4月初，浙江省工商局和省私营企业协会公布了2003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中，绍兴有36家民营企业入围，杭州和宁波有15家，温州仅排名第四。显而易见，炒房并非因为温州人更有钱。

温州人热衷于炒房，除了资本的逐利性外，其背后更深层的诱因，则是温州本地产业现状和金融体制等因素的制约。

众所周知，温州当地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存在客观瓶颈，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果投资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温州缺乏产业基础；如果投资高科技产业，温州缺少技术和人才支持；如果扩大现有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还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由此，产业升级缓慢，使得温州富余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投资本地产业的领域，也迫使其将眼光转向本地企业以外。一些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选择长线战略，选择到西部需求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奥康集团就在重庆鹤壁投资建立中国最大的西部鞋城。

而一些中小资本和零散资金，既缺乏足够的资本创办大企业，也缺少技术支持创办新企业，因此，不得不寻找短线项目，“捞一把就走”。房改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潜力，被敏锐的温州民间资本感知，“买房子”成为最适合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正如一位温州企业家表述自己的投资动机：“手中有钱之后在本地找不到好项目，而中小企业融资又非常困难，无论在本地和外地办企业，都缺乏资本支持，只好到外地炒房子。”

而且，在房地产市场，温州人家族联合作战的传统优势，也有了施展的余地。那些转战南北的温州炒房团，多是亲朋好友联合，几十个人、几千万元资金一起砸在某个楼盘，可以迅速抬高楼价，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至于在房地产投资领域，有多少温州资金流入，任何机构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温州炒房团的确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动用的资金至少应在 1000 亿元以上。而一个行业的兴起也往往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启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温州去炒房，在温州，还催生了一种被称为“中间人”的职业，小张就是其中一位从业者。

2005 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项目：一位温州老板在江西低价拿下一个商铺项目，需要启动资金 600 万元，已经到位资金 200 万元，小张的任务就是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帮助他筹集其余的 400 万元。

此前，小张曾经在保险公司工作，与很多中小企业老板较为熟

第八章 炒房团：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识。拥有这种优势条件，像小张这样的“中间人”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金。小张通常的做法是，以月利率2分向多位熟人、朋友借贷，每处借50万~100万元，以月利率3分借出，赚一进一出的利率差。在操作的江西商铺项目中，他不赚利率差，但约定的回报却异常丰厚。

在温州“炒房”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是主要筹资方式之一，但少量项目会出现小张这种“中间人”的身影。温州房地产投资者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即自有闲置资金、企业资金、民间借贷和股权集资。使用最后一种筹资方式者，往往是一些大项目，不是“炒”一套或几套房子，而可能是买下一整幢楼。

首先，自有闲置资金。

最初，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的温州资本，多是民间闲散资金。

1999年前后，一些温州人开始用“闲钱”在当地投资房产，2001年以后温州对外地楼市的投资才初具规模。人们将手中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闲钱”投资房地产，并将此当做一种理财方式。

温州瑞安市林小姐就是利用自有闲散资金投资房产的典型，在上海投资了7套房产。2003年夏天，林小姐与几个同学一起到上海查看当地楼市状况。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她共购进7套房产，每套房子首付都是二成，总投入120万元。

7套房产购进，林小姐手中只剩余50万元时，她此次购房之旅就“刹车”。这种自制力源于背后的思考：7套房产每年的按揭费用需30万元，剩余的50万元加上她的工资收入，供两年按揭没有问题，不会因资金问题处于被动。

由此可以看出，林小姐投资房产属于偏保守类型：基本是利用自有资金和闲钱，很少向朋友借钱来投资，而且手中还会留几十万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元作为流动资金。而且，林小姐投资房产的资金，来自于她前几年的积累，此前她做过很多小生意，包括投资出租车，虽然有所收益但大都有限，直到后来她在瑞安购买一块地基，转手就有 60 万元的盈利。这次“小试牛刀”启发了她投资房产的思路。

当手中握有近 200 万元资金时，林小姐就开始了真正投资房产。

其次，利用企业资金。

与林小姐一起去上海看房产的还有她的三个同学，三人家里都各自经营着一家小企业。在上海，她们三人各自从企业调出几百万元资金，筹集到 1000 万元，进行“短炒”。一年后，每人净赚几百万元。

利用企业资金投资房产，显然，资金成本会比利用自有闲散资金成本高出很多，但同时也可能会收获比投资生产更多的利润。正如林小姐所说：“资金拿去炒房后，有的企业经营受到影响。但一年下来，企业没赚钱，投资房产这块业务赚钱了，也是一样的，对有些人来说也许还更划算。”

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实体经济利润开始式微并出现亏损，更迫使一部分生产性投资转向楼市。而在诸多因素都不明确的情况下，投资房产可能还会成为企业资金最安全的“避风港”。温州包女士的丈夫经营一家印刷厂，她本人平时则将时间用于投资房产。在 2008 年上半年经济形势还未完全恶化时，包女士丈夫的印刷厂就已经明显感到订单的锐减。

“那时候情况还不至于糟糕，我赶紧出手了松江大学城附近的两套房子，把钱套回来先支撑工厂，但是在 10 月份我们明智地决定把工厂关了。”包女士语气中充满着庆幸。

再次，民间借贷或股权集资。

利用自有闲散资金或中小企业资金，可能只是同时投资几套房

产，而对于一些“大手笔”的房产投资项目，往往需要通过民间借贷或股权集资的方式，才能筹集足够的资金。

此种项目运作流程一般如下：在开发商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介入，以较低的价格买进整幢楼，然后打进部分预付款，金额通常在几千万元左右。如果一套房产的市场价在 9000 元/平方米左右，他们就能以低于市场价 30% 的价格购入。而开发成本可能在 5000 元/平方米，如此算来，即使以 30% 的折扣卖给温州投资者，开发商仍然有部分盈利，而且快速获得资金后，项目还可以继续运作。

对于开发商和温州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件双赢的交易。但是，对于这样的“大项目”，限于资金的高要求，投资者往往不会单兵作战，而是联络几个朋友对项目风险、收益进行讨论后再决定是否投资。而且一旦项目运作开始，他们各自就要负责筹集一定量的资金，具体运作虽然交给房产营销代理公司进行，但投资者内部有自己的约定，实际股东可能是多位。每位股东负责筹集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资金，他们或从自己企业调用，或向亲戚朋友借贷，或通过“中间人”以民间方式借贷。

此外，还会向银行借贷。在温州，各大银行都设立了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专营服务部门以方便贷款。2009 年上半年，温州市银行业上半年新增贷款 710 亿元，远远超过年初金融工作会议制定的全年 500 亿元的目标。然而，与 710 亿元激增贷款相伴的，却是全省倒数第二的上半年经济增速 4.5% 以及工业增加值的负增长，远远低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 GDP 平均增速 9.2% 的水平。很显然，曾经拉动温州经济的制造业不是贷款的主流向。

温州银监分局的数字直接将贷款的“底牌”掀开。到 2009 年 5 月末，温州市房地产贷款余额 520.23 亿元，比年初增加 36.96 亿元，同比增加 15.95 亿元。与此同时，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统计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数据也做了有力支撑，即温州市存款大幅下降。2009年7月，人民币存款余额比6月末下降44.52亿元，但贷款新增83.84亿元，其中个人贷款余额1735.87亿元，占7月份新增贷款的78.1%。

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不断被提及，国家加大了对企业资金的支持力度，但实际上，一部分企业并不将这些资金用于生产，而是改换名目，改变资金的用途，将其转投到房地产行业。因此，对于温州房产投资者来说，资金的通道始终是有的。

为遏制房产投机行为，2009年6月23日，中国银监会向各商业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的通知》，要求银行严格控制贷款流向，保证贷款发放进入实体经济，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适度的投资，可以活跃房地产市场，但过度的投资，就会变成投机，搅乱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如果不对此严加防控，既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负责，也是对温州资本的放任自流。当大批温州资本前赴后继进入房地产市场，当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难以想象，到时温州资本将怎样度过那段难熬的岁月。

温州的“炒房娘子军”

在温州的房产投资热潮中，不仅仅充斥着男性的成分，还涌动着一片撑起半边天的妇女实力。在十余年的温州房地产投资人群中，她们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家庭房产投资的决策人和执行人。

温州太太们炒房，想想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人们拥有资本之后，下一步的设想自然是让手头上的钱增值。靠实业积累了一定的私人资本后，温州人分工明确，男人继续打理企业，女人们则剥离出来，专门从事资本投资。而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存在高额利润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温州太太们一个具有诱惑力的“猎物”。

第八章 炒房团：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现在，温州太太们炒房已经形成一个完整流程，即先在网上看地段，或者通过当地的熟人、老乡等先打听价格、环境等。由于前期考察等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在购房时，温州太太们一掷千万元，快而干脆，不是一个“猛”字可以完全描述的。2009年6月，杭州一个楼盘开盘，一位太太在半小时就拿下十多套房子，速度之快让很多还在考察中的男士大为感叹。

被外界称为“温州太太炒房团团长”的罗夏兰，从2003年开始，几乎每周都会带一群太太们出门买房。频率高时，一周两次，被形容为“像买菜一样买楼”。她手上掌握着2万人左右的炒房客户。

出手如此之快，资金如此之多，自然是被其中的高利润所驱使，而在金融风暴的肆虐之下，温州制造业的惨淡，更是激发了温州太太们的炒房热情。

在温州太太炒房团中，叶女士是一个典型，早在6年前就开始涉足房产投资。2008年下半年，叶女士丈夫的公司遭受重创，“如果不是几间商铺，辛苦经营了十多年的皮鞋厂肯定早就关门了。”

出口国外的皮鞋订单锐减，工厂机器停工，上百位工人却继续发工资，而从银行中贷款也是难上加难。几百万元的6分息贷款，让夫妻二人喘不过气来。此时，叶女士果断将上海的几套房子卖掉，才筹到一定的周转资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这段经历，让叶女士夫妻干脆不再对皮鞋厂进行追加投资，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利润高的房地产行业。“如果快的话，炒房一天就能赚十多万元，比起一双双卖皮鞋，效益比都不能比。”

温州人血统中存在着投资的血液，不仅国内温州人如此，即使侨居国外的温州籍人士也不改本色。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后，温州籍华侨陈女士在意大利的服装厂就一蹶不振，见大事不妙，她将服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装厂及时转手，将损失降到最低。

2009年3月中旬，陈女士接到温州亲戚的电话，询问她是否参加炒房团，去嘉兴买商铺。对国内房地产状况一直颇为了解的陈女士一口答应，在第二天就乘飞机到国内，一次性在嘉兴购买了3间120多平方米的临街商铺。短短几个星期后，她投资的商铺每平方米就上涨了上千元，更加提升了陈女士对国内房产的投资信心。

回到意大利后，陈女士仍然关注国内房产，2009年5月，她又飞到北京投资两处房产。2009年8月，昂贵的机票依然没有阻止陈女士回国投资房产的步伐，这已经是一年内她第3次回国……

温州太太们炒房，其果断力巾帼不让须眉，但如果你认为她们对待金钱大手大脚，就犯了推理性的错误。尽管她们买房如同买菜一样，下单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但“小气”起来，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较量的。

7年前，李太太退休后就加入炒房行列，截至目前，她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无锡等地拥有26套房产，家里资产上亿元。但与其身价不匹配的是，她经常穿着普通地乘坐公交车。当别人劝她可以适当享受时，李太太低调表示：“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老公还没退休要开车上班，我又老在外地跑，用车的机会不多，所以没再买第二辆车，坐公交也不错。”

在杭州，李太太投资了多套房产，但当被杭州一家公司返聘为公司副总时，李太太却租了一间月租400元的民房居住，自己的房子以高价出租。

“有人说我想不开，可我习惯了。不注意节约小钱，哪来的大钱呢？”这是李太太的心声，也反映出温州太太炒房团的普遍状况。如果不是开发商提供吃住等招待，多数温州太太们在外投资房产时，会居住在汽车旅馆内。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与其投资房产的出手

大方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也正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一直以来，温州资本的丰厚与温州人节俭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并行不悖。

无论温州太太炒房团的生活方式如何，但显而易见的是，国内房产价格的日益飙升，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此时，房地产投资市场开始显露出风险性。面对不断飙高的房价，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十条举措，被业内称为房地产“新国十条”。

就在同一天，温州太太炒房团约50人赶赴安徽徽州区一个大型地产项目，这也是温州太太炒房团最惨淡的一次。50个人的团，只有一个人预订，交付了5000元订金。更具戏剧性的是，即使唯一的预订也在回到温州后退订了，置5000元的订金于不顾。

最近，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风声越来越紧，夏罗兰将去新加坡看盘的事情一再推迟的同时，还将一、二线城市的计划表更换成二、三线城市。2010年5月7日，夏罗兰带领一个团直接去了江苏宿迁。

在国家对房产实施“史上最严”宏观调控时，温州太太炒房团意识到“这次调整和之前不一样”，怎样调整自己的步伐，现在正是考验这支“队伍”的关键时刻。

“炒房”论道：有张有弛

在投资房地产上，温州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招术。

2009年底，迪拜危机发生后，占迪拜华商1/10的温州人，约有20亿元左右的资产蒸发。但2010年，迪拜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和“购房团”的成员们始终看好迪拜的潜力，他带领十多名温州人先后4次去迪拜有目标地考察楼市。最终，他们看中了新落成的“世界第一楼塔”迪拜塔旁边的几幢30多层的高楼。

在陈志远看来，尽管迪拜这颗“阿拉伯明珠”遭受债务危机，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却依然是世界新兴也是最火暴的旅游目的地，住房状况的紧张并未缓解。而且，危机过后，迪拜的房价“基本触底，是该下手的时候了”。于是，陈志远们将目标锁定为几幢环境好且升值空间大的房子。

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温州购房团成员在迪拜成功购房。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其迎合政策的风向不无关系。而与温州民营经济相比，温州资本投资起步略晚，但其嗅觉的灵敏程度丝毫不减，表现在房产投资方面，温州人有张有弛：当宏观调控政策来临，会收紧自己的“触角”；当春风开始要吹暖楼市时，就会将“触角”渐渐延伸。

2009年10月，听闻国家将对海南出台建设“国际旅游度假岛”等一系列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一帮温州人去海南“旅游”，将目标锁定清水湾豪华楼盘，一口气就团购了60多套豪宅。

其中，一位唐先生第二天又去了一趟，当得知还剩下38套房源后，他当场刷卡付了1000万元首付，以8.5折的团购价统统买下。三个月后，一平方米9000多元的房价暴涨到3万多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宏观调控对温州投资房产的作用有限。在国家出台地产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后，温州投资者仍旧看好海南楼盘。虽然海南房价已经在不易企及的高位，但唐先生认为“还会涨，一直涨到国家停止海南开发、涨到国家终止扶持海南的政策为止”。

事实上，这不是唐先生一个人的想法。经过十多年来在房地产市场的“摸爬滚打”，温州人在房产投资方面，已经摸到了调与涨的“奥秘”，并总结出“调涨不调跌”、“越调越涨”、“调后报复涨”等规律。

2010年4月以来，国家频繁出台地产调控措施，并实行金融紧缩，一部分温州人开始持币观望。而迪拜房价接近谷底的消息，恰

第八章 炒房团：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巧给这些资金一个出口。仅 2010 年春节期间，去迪拜的旅客数量就比去年同期高出近两倍，其中，40% 的人来自温州。

但大部分温州人还是选择留在国内，专攻国内房地产。一位主业开服装商场的资深房产投资者这样表示：“对我们来说，宏观政策越紧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因为银行的钱贷不出来，没有钱的人顶不住，会逼得把房子甩出来，价格会下跌。买家的心理是‘买涨不买跌’，卖家的心理是‘卖跌不卖涨’，房价一跌，我们有实力的炒家就可以趁机抄底。”

据中国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2009 年，从国内外汇入温州的资金高达 2.5 万多亿元，汇出资金 2.2 万亿元，留在温州近 3000 亿元。此外，再加上高达 7500 多亿元的民间流动资金。这笔巨额资金支撑着温州人承受来自通缩政策的压力，在楼市新政出台之后，退出的资金只有不到 100 亿元，90% 以上的资金仍处于观望状态。

文先生是温州一位房产投资者，他手中还掌握着七八套分布在杭州、上海等地的房产，他身边的朋友很多人有三四十套房产，最多的有 60 多套。截至目前，这些投资者并没有抛售的想法，“大家都在观望，估计年底前大资金都不会随便动，原因除了家底深厚不缺钱外，更重要的是目前并没有更好的新投资渠道”。

在房产新政背景下，观望也是一种坚强的态度，而有些更为坚强的温州资本，还选择在此时“顶风作案”。

2010 年 4 月 18 日，就在国家连续出台房产新政后，温州市郊区“铂金府邸”楼盘最后一期开盘，均价为每平方米 45000 元的近百套房源被认购一空。在现场，很多购房者表示，首付 50% 和基准利率 1.1 倍的贷款利率在承受范围内，并表示只要年升值率达到 20%，就比将钱放在银行里变死钱，比通货膨胀后钱贬值，强上几倍。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10年5月13日，温州平阳县21个购房者赶赴新疆伊犁，先由当地经商的老乡考察伊犁及近郊霍城、霍尔果斯等地楼盘，签订55套之后，还谈了一个三星级宾馆的转让意向。目前，伊犁期房均价为3000元/平方米，鉴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铁路新近修通，预示着这个口岸城市的房地产将迎来新一轮上涨行情。

.....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温州购房者颇有些巴菲特的投资心态。

房市“狼来了”的真相

当温州购房者面对着不绝于耳的斥责鞭挞之声，当温州购房者在一些城市遭受抵制，承受着“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遭遇时，片面地将“温州炒房团”当做房价急剧攀升的罪魁祸首极为不公平。

其实，成熟的市场存在着合理的投机成分，“温州炒房团”不等于“温州投机团”，投资也不等于投机。温州人投资房产，既不违反道德，也不触犯法律，更多的是凭借着对国家政策的正确解读，依靠自身的资本与果敢来盈利。

而且，温州炒房团真的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事实上，温州炒房团也只是凡胎肉身，几近疯狂的南征北战，也不能保证每次都可以得手。在其四处攻城略地的风光背后，是资金被套牢的无奈心酸。在上海、重庆、沈阳、成都等城市，都有温州炒房者失手被套牢的故事在不断上演。

2004年4月中旬，上海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一条消息，在上海某中心城区，约30%左右的商品房住户因为主人将房屋空置而无法收取电费。这些房屋绝大部分被当做投资所用，由于不能及时出手或出租，只能空置，而这些投资者中，温州人至少占50%以上。

一般而言，温州炒房团获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等待升值脱手

第八章 炒房团：所有购房者的假想敌

赚取差价，另一种则是出租获利。但是，截至目前，温州炒房团仍处于大规模买进物业的阶段，获利离场者还只是少数。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诚然，温州购房者优势在于资金雄厚，善于结成攻守同盟后，集体砍价买入。但大多数温州人是在异地投资，仅仅依靠售楼人员的分析，以及自己对城市状况的推断，难以作出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就要仓促做出决定。这种非理性购房行为，几乎占到温州炒房团的大部分，因此，炒房失手的概率也相对较大。

但即使面临失手的危险，加上宏观调控的风险，温州资本仍然流向房地产。除了被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利润吸引外，选择房地产投资，实际上也是温州资本的无奈选择。

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己有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原因是现在“实业不太好做”。而一位经济研究人士则表示，截至2010年6月，只有30%的温州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65%仍流向楼市和股市。

从事眼镜架加工的黄女士，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年买材料花4000万元，产品销售后得到9000万元，账面利润有5000万元。此外，还要发工资、水电、利息等管理费3000万元，缴纳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及销售额1%的各种附加税，工商、税务、环保等各个部门的开销以及大量应收款。结果，净利润可能为负！

虽然眼镜架工厂并无利润，但厂里的机器必须运转，通过企业的授信额度以实业名义贷款，或用现有房产抵押，从银行里“周转资金”，就可以投资房地产，从而还可以规避楼市新政关于按揭贷款方面的限制。

不得不说，温州人将“精明”这个词汇演绎得淋漓尽致，但这种状况，也间接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目前投资渠道的狭窄。正如一

看不懂的



位房产投资者所言：“温州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受金融危机影响，好多行业不景气。钱要生钱，哪能捏在手上，总让它在银行里趴着？最保值、最安心的东西，就是房子了。”

从炒煤、炒油到炒房，尽管温州人一直不停地寻找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却始终没有按照一条有序的轨道进行正向积累。同时，尽管温州人腰缠万贯，却依然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敢于冒险，让他们在早期的开拓中收获颇丰，但一旦投资环境发生改变，他们却只能是最终利益的观望者。而且，更为不幸的是，他们往往不能选择平静离开，常常在嘹亮的道德号角的讨伐声中匆匆离场。

温州炒煤团的身影已经在“国进民退”中逐渐变得暗淡，炒房团虽然深受重伤，但仍然循着利润的足迹在继续前行。这也是温州资本在进行的探索之路，尽管不知道前方等待的会是怎样的结果，但这是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其中，充满着温州资本的理性与冲动、盲目与尝试，而这种纵横交错的道路，也正是温州经济所走过的道路。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九章]

宿命下的成长天花板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先天的草根弱势

对于温州资本壮大所依托的经济载体，草根是众多温州中小企业洗脱不掉的身份底牌，然而，草根固然有其优势，即敢为天下先、市场嗅觉灵敏等，虽然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后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欢欣。

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温州资本的草根出身也存在着难以抹去的消极因素。毕竟，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演进，现代化的企业制度需要建立，规范化的管理需要实施，产品需要技术创新等，而这些，恰恰是出身草根的温州资本缺乏的。

先天的草根弱势，是温州资本发展道路上一道明显的挡路牌。

由于出身草根，缺乏高人指路，温州企业家中真正懂得管理的人并不多。他们往往将历史甚至神话传说中的智慧，当做管理王道，据此对企业发号施令；他们还可能常常顾此失彼，将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规则忽略。

没有恰当的理论支撑，没有合适的描述，没有合理的战略架构，很多温州企业拥有的只是一相情愿和想当然。即使在市场经济日趋规范的现在，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中国 99% 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申请过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除温州中小企业之外，甚至整个中国的中小企业基本处于知识产权的真空地带，不能不说，这就是草根企业的致命伤之一。

“章光 101”是由乐清企业家赵章光创办的，一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品牌。20 世纪 80 年代末，“101 毛发再生精”在北京热卖，产品刚出厂，就被门外等候的买家一抢而空。当时，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章光 101”只好规定：每人每次限购两瓶。然而，刚刚成立的“章光 101”并不知道保护商标的重要性，在“章光 101”最热销时，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风险也悄然而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101” 商标在国外被人抢注，同时，市场上也涌现出各种打着“101” 旗号的生发产品。由此，“章光 101” 企业年销售额从上亿元萎缩到 1500 万元左右，走到了生死边缘。

为保护 101 品牌，赵章光四处奔波注册新商标，同时准备花钱把别人抢注的商标买回来。但无论将价格谈到多高，抢注者就是不卖，无奈之下，他只有寄希望于顺利注册新商标，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章光 101” 的注册申请。

时间持续了一年。1989 年 11 月 4 日，“章光 101” 商标注册公告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一场“商标大战” 到此硝烟渐退。不过，商标争夺战阴影还未散去，“101” 在日本再起药效风波。

1988 年 6 月 18 日，《朝日新闻》晚刊发表文章，标题为“日本几家大学附属医院对乱用 101 毛发再生精敲响警钟”，对“101” 药效提出怀疑。文章称“101” 会起火，会烧掉头发。罪魁祸首源自“101” 的假冒产品，赵章光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101” 只是通过民间组织方式进入日本，并没有获得日本政府部门审批。

面对近乎失控的日本市场，赵章光不得不叫停产品在日本的民间销售。虽然此举断绝了假冒品的市场空间，可这一停就是十多年。直到 2006 年，赵章光才打算投入 6 亿元开发日本市场。显然，由于时间的延误，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企业商标的忽略，让温州企业家品尝到了苦头，也敲响了温州重视品牌的警钟。而与不重视商标相伴的是，温州家族企业的盛行，不可否认，家族企业是民营企业原始积累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局限与隐忧就可以忽略。家族企业形式的桎梏，也是制约温州资本发展的一大因素。

温州企业家李忠文，以 4000 元起家，从 1994 年起，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建成 80 家连锁鞋店，最多时曾超过 100 家。李忠文本人被称为“中国鞋王”，其拥有的百信鞋业总资产曾达到 30 多

亿元。

然而2003年5月，这位鞋王却因涉嫌票据诈骗的罪名在长沙锒铛入狱。表面看来，百信鞋业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对供货商恶意欠款，在客户的催促下开出空头支票，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百信鞋业采取的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

在百信鞋业，实行典型的家族式管理：几乎所有的核心部门和管理层职位都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监督和制衡。由此导致百信鞋业内部管理混乱，问题重重。百信鞋业配货中心由李忠文的几位亲戚控制，经常发生大吃回扣、中饱私囊的现象。对此李忠文也有所耳闻，但碍于亲戚朋友的“面子”，他无法进行制度性惩罚，只是曾经在开会时不点名地大发雷霆。

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自然无法有效管理百信鞋业，加之此前李忠文采取的赊销模式出现问题，最终导致企业的悲剧。而李忠文的悲剧，也揭示了温州家族企业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困境：创业时期，企业规模小，人手少，容易控制；企业做大后，人手多，共同创业的亲戚朋友想法发生变化，企业不易控制。此外，家族企业将最终决定权系于老板一身的决策机制，也容易使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或产品质量，而是经营者的素质，而这又正是温州中小企业的软肋。每天生产更多的产品，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对勤劳且能吃苦的温州人来说，是其长处；但升级现有产品技术，或将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做成百年老店，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温州老板来说，却有些勉为其难。

而如果仔细考察温州或浙江成功的民营企业，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已经稀释了家族或个人的股权，通过吸引社会力量改组成具有现代气息的公司组织形式，如正泰集团和吉利集团等，都已经从家族企业过渡到股份制企业，突破了草根出身的成长天花板，正在沿着规范化的道路走下去。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还能打多少“擦边球”

风险往往和收获成正比。在中国民营经济史上，温州人可以算作一群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他们具有扼住困难喉咙的冒险精神，并且认为风险与危机是财富的附着物，是无法拒绝的。

此外，温州人还精于世故，“不通世故人情你就肯定会一事无成，无论是从商、从政还是从事其他工作，都难成大器”。还熟悉各种法律、制度、规定等“游戏规则”，并加以利用，善于“钻空子”、打“擦边球”，善于利用规则“合理冲撞”而又不犯规。

20世纪60年代，全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为各种斗争热血沸腾。而此时，温州人就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发展经济的南征北战。

当时，只要涉及经营范围的内容，就会被定为资本主义，面临着被“割”的危险，温州小商小贩们只有选择打“擦边球”。尽管全国各地都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面积太大，人口众多，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要找到生存的空间，并不是做不到。于是，数不清的温州小商小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索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时，温州出现了众多“养蜂部落”，成千上万的温州养蜂人坐着火车去南地北追花逐蜜。

如果只是为发展养蜂事业，温州人可能不会甘于居无定所地漂泊。当时，国家提倡和重视农业生产，养蜂自然归为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于“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到了其中的市场空间，搬着几十箱蜜蜂坐着火车赶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的同时，利用蜂箱偷偷贩运着紧俏物资，如将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销售，再将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销售……长途运送蜂箱的价格极低，而温州“养蜂人”则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鼓了起来。

面临着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异常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中国民营资本出生的软环境不甚理想，同时也造就了民营资本对政策的高度敏感特征，形成了温州民营资本成长的特殊轨迹——打政策的“擦边球”。

当时，政策制定的是粗略框架，没有具体的条条框框，而在粗略框架里填什么，要靠具体部门自行斟酌；法律对某些经济行为的界定与约束也较为模糊，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也要靠单体的经济行为人自己掂量。这就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留下了大量的中间地带，胆子大的企业家就可以打打“擦边球”甚至出现越轨行为。等到制度、法律日渐完善时，不少企业就被戴上原罪的帽子了。

国家规定对养蜂箱运输收取低费用，尽管以惯有思维推断，养蜂箱里面自然装的是蜜蜂，但国家对养蜂箱里放什么东西并未做出规定。温州人就抓住这一政策的“漏洞”，打出在养蜂箱里放置商品这一“擦边球”。

从肯定意义上而言，这种做法也可视作抓住市场机遇，但从长远和严格意义上来说，打“擦边球”的结果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和政治风险，稍有不慎，可能会掉进河里“淹死”。

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演进，国家在经济和经营方面的立法越来越完备，可以利用的“擦边球”越来越少。同时，对于以“擦边球”形式的经营方式，国家也给予一连串的打击与惩罚：

2006年6月，国务院对房地产进行“二次调控”，将二手房交易的全额征税年限由原来是2年延长至5年。针对温州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对二手房交易税打“擦边球”现象，如“以租代售”、“只公证，不过户”等方式来逃避营业税，予以提醒并纠正。

2008年3月，永兴所工商执法人员，在企业年检实地调查中，依法对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小塘村的温州某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实施调查，发现该公司加工的阀门上张贴了福娃图案，与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五个福娃的图案相同，对于这种打福娃“擦边球”的侵权行为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为，处以罚款 10000 元的惩罚。

2009 年 2 月，瓯海区蔡某父子擅自将房屋内部结构改造成小型旅馆设施构造，并挂上旅馆名称，一直以旅馆的名义供他人住宿，对于这种旅馆经营“擦边球”，公安机关依法追缴违法经营所得，同时，无证经营场所也被依法取缔。

2009 年 11 月，温州市区机场大道一家未取得排水许可证的修车店，却打起“擦边球”经营洗车业务，市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此违规行为予以纠正。

.....

如果说民营经济在处于“边缘”状态、市场规则也不健全时，不得不靠“钻空子”、打“擦边球”以求生存和发展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步入社会经济生活“主流”、市场机制也有了相当发育的情况下，企业就应把依法经营、遵守规则作为生存发展的根本。

对于打惯“擦边球”的温州企业家，如何适应“擦边球”越来越少的市场环境，如何不再将希望寄托于“擦边球”，是发展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到了没有“擦边球”可打的一天，温州资本的发展会不会受限，这也是温州资本需要突破的一道难关。

财务杠杆越长，风险越大

在物理学中，杠杆指的是利用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就能用很小的力量抬起很重的物体。而财务杠杆则指的是，企业在制定资本结构决策时对债务筹资的利用，简而言之，就是对负债的一种利用。

如果经营状况良好，企业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利息率，就会获得财务杠杆利益；而如果经营状况不佳，企业投资收益率小于负债利息率，则获得财务杠杆损失，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

在温州风行全国的“炒煤团”、“炒房团”等各种投资团体背

后，还站立着银行这位“靠山”，银行让温州炒团找到了财务杠杆：温州人可以拿着 10 元钱，由银行贷出 90 元，最终赚到 20 元。如此一来，几倍的利润让温州资本驰骋天下。

但是，投资市场总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温州资本银行借贷的财务杠杆，也很容易受到投资市场的影响，招致风险。

自 2003 年开始，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就掀起一股投资西部煤矿开采项目的热潮。在大额的投资资金中，来自银行的借贷资金存量就高达 40 亿元。截至 2005 年 10 月底，平阳县两大国有商业银行水头镇分理处个私贷款余额分别为 1.3 亿元和 1.2 亿元。其中，投向煤矿开采项目的分别占 70%、65% 以上，总计约 2.3 亿元。

就银行方面而言，按理论来说，有限资金越集中，其经营成本可能降低，也可规避信贷风险和实现规模效益。但事实上，温州银行业“垒大户”的行为，往往演变为盲目的攀比放贷，而不是按照金融市场正常的操作规则来进行。在放贷前，银行对企业缺少调查；在贷后，对其进行的跟踪管理就更流于形式。

银行热衷做大客户，温州炒团的大数量贷款和丰厚的利润自然受到银行的优待，但“垒大户就像吹气球，越吹越大，乍看摇曳多姿，可只要用针轻轻一扎，瞬间就化为碎片”。

2005 年，国家出台了对不达标小煤窑实行“关、停、并”政策，直接造成了平阳县炒煤资金的回流，由此，银行贷款的潜在风险也已经逐渐表面化，因为炒煤资金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亏空，温州某银行的两笔共 40 万元采煤贷款已经形成不良贷款。

而在此后不久的 2004 年 6 月温州中瑞财团事件，也暴露出温州炒团财务杠杆面临的风险。中瑞财团曾被称做“中国第一炒房团”，在成立之初就声称能够动用 100 亿元的资金，这样一个企业竟然因拖欠政府 7.6 亿元地价款被温州市国土局曝光，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原来为中瑞资金需求“打包票”的当地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临阵倒戈”，拒绝对其进一步发放贷款，最终导致中瑞资金链断裂。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在投资方面，有一句金玉良言：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银行禁不住诱惑而逾越“雷池”；同样，温州炒团也没有禁得住利益的诱惑，而大肆挥舞财务杠杆，且将财务杠杆越拉越长，无形中也把风险渐渐招来。

不仅中瑞财团此类规模庞大的炒房团，即使普通的温州投资客，也很少像传闻中那样，用大把的现金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他们每个人都颇为精明，擅长运用财务杠杆。温州长宁企业董事长邱国宁，就是通过将自己居住房屋抵押贷款投资起家。

在温州，借贷资金比为 80% ~ 90%，即财务杠杆为 5 ~ 10 倍。而与央行温州支行的统计数据相比，温州实际的民间借贷利率很高，远远高出 12%。温州民间借贷月利在 2 分到 2.5 分之间，有些短期融资利率甚至高达 6 分，如果以年息计算，就是 72%。也正因为民间借贷的丰厚收益，一些温州市民会抵押自己的房产向银行贷款，然后再将贷款进行民间放贷，以获取其中的利差。

民间借贷利率被抬高，随之相伴的是温州人在商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也被抬高。一般情况下，高预期也意味着高风险，有所警觉的企业家会及时悬崖勒马。作为上海嘉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祥青是个成功的项目管理人，在 5 年时间内，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年平均收益超过 200%。但是 2007 年底，当他准备募集一只新基金时，却临阵退缩。退缩不是看不到收益，而是投资者高达两两三倍的收益，“风险太大了”，林祥青只有选择放手。

林祥青是一个有节制的企业家，当然也是明智的企业家。财务杠杆和借贷利率过高，当风险来临时，投资实业的贷款损失就会被数倍放大。2008 年金融风暴席卷全国，在短短数月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一些实业投资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将高收益的预期吹打得风中凌乱，不仅如此，还注定将负债累累。

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温州企业到全国各地建厂设厂，可惜“建”不逢时。对此，温州恒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黄伟建也表示：

“如果企业都是自有资金就会好很多，那些杠杆比例高的企业死得最快。我以前也贷款，现在不敢了。”

兴也财务杠杆，败也财务杠杆。温州人曾经凭借财务杠杆的助力，就撬动了全国市场；但过长的财务杠杆，也为其注入了更多的风险。因此，不少分析人士甚至评论：温州炒煤团的疯狂，板子应该打在银行身上，是银行让温州炒团有了巨大的财务杠杆，让温州人找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

但银行的财务杠杆全国都存在，只是温州人将其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与此同时带来的风险也必然要承受。只是，这种风险为温州资本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难以走出“围城现象”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围城理论，即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对于温州以及温州资本来说，同样也存在着“围城现象”：温州资本不断流出温州，而外资却难以进入温州。

随着温州本地经济的持续增长，资本的不断积累，温州的产业转移现象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两外”，即大量的温州企业外迁和民间资本外流。

根据温州市统计局调查，截至2007年底，温州有22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投资、经商、办实业，占全市人口的27.5%。在温州外出从业人群中，从事工业活动的带动资金转移数量最多，估计累计投资1500亿元以上，年实现工业产值1600亿元。

温州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竞争程度不断加深的市场环境下，温州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产品研发能力，有的选择部分外迁，即在外地建分公司或配套生产线；有些选择整体外迁，温州灯具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整体搬迁到广东；有些企业选择并购外迁，以充足的资本在外地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发挥积极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作用，成为低成本扩张的得利者。

而温州资本外流的方式，则无外乎在全国创办专业销售市场、从事房地产投资以及投资能源领域等。据统计，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100多个种类不同的市场，市场总摊位5万多个，市场成交总额为1000亿元以上；在投资房地产方面，温州人在上海、江苏、山东等20多个省市已经注册成立了100多家房地产公司，运用投资规模高达1000多亿元；此外，由于全国能源紧张，以及温州当地的资源匮乏，更多的资本走出温州，被投资于回报率高的煤炭、水电、油田等能源。

面对这种企业与资本双重外流的现象，有人惊呼“温州商人逃离温州”、“温州老板携款大迁徙”，也有人笑称是“馒头大于蒸笼”使然，是温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温州资本的确在不断外流，温州资本纷纷将目光投向外地既有土地又有优惠政策的地方。温州资本即使存量再丰富，却总是有一定量的，此消彼长，外出的资本越来越多，内部存留的必定越来越少，势必对温州经济发展形成冲击。

2005年5月，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调研发现，由于民间资本大量跨区域流动，加剧了宏观调控对温州的影响力度，最直接的冲击是：信贷资金来源不足，从而使社会运营资金呈现紧张局面。

截至2005年3月，温州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2128亿元和1636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2020.1亿元，与年初相比增加70.7亿元；贷款1614.6亿元，与年初相比增加80.4亿元。与2004年相比，存贷款分别少增26亿元和54亿元，同比增幅均下滑到9%。温州资本外流情况下，存款增量下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令人震惊的是，温州的存款增量水平几乎已经处于浙江省倒数第一。

温州存款少增主要发生在企业存款和活期存款两项，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净减少25.9亿元，与2004年同期增量相比减少32亿元。活期存款是社会经济主体的现实营运资金，其减少或少增表明社会

营运资金趋于紧张。

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实施的几次宏观调控中，温州金融业的波动都小于全国，此次存款增量减少，很难用金融宏观调控的原因去解释，宏观调控只是加剧了存款滑坡，其直接原因“还是存款资金的流散，包括资金外流和资金由银行体系向民间市场的转移”。

尽管社会资金外流被外界冠以“区域因素”，或“具有温州特色”，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因资本外流形成的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不足已经限制了信贷投放总量。报告显示，2005 年一季度温州贷款增量在省内少于杭州、宁波和绍兴，与 2004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4%。

因此，增加存款来源成为温州银行业面对的难题。但囿于温州资金的“跨区域循环”，即“外地银行多余资金上存——上级行向温州资金倾斜——温州银行增加信贷投放——部分贷款被客户投向外地”。温州信贷资金“饥渴症”的缓解并非朝夕之功，而要使银行的从外筹资在本地真正发挥净效益，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从资金外流的环节破除这一循环。

但与温州这块“巴掌大”的地方相比，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以至于温州资本常常流连忘返。虽然也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资本回流”现象，但“进”的同时也在“出”，而且回流的目的绝不是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仍是为了寻找新的投资方向。2006 年 6 月末，温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比 2005 年同期增加 541.43 亿元，增幅创历史新高。但不到两个月后，更多的温州企业家组团到各地寻找投资方向，两位企业家在广元市一次性斥资 7000 万元，购买当地两座大型有色金属矿山的开采权。此外，在中国的西藏、云南、湖南、湖北等地，类似的温州代表团也在活跃着。

总体而言，温州资本进来者少，出去者多，如何让温州资本在外扩的同时，又能够留下足够的能量，在当地产业升级等方面，助一臂之力，这是温州资本“围城现象”的一端。

另一端则是外资的短缺。温州引进外资的步伐一直比较缓慢，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截至 2004 年，世界 500 强企业中没一家在温州投资，而有限的几家“外企”，实际上也是持外国护照的温州人开办的企业。

事实上，善于闯天下的温州人，似乎并不善于吸纳外部力量，而民间资本的富足，也使得部分温州人将外资列为“可有可无”的归类。不仅如此，温州轻工业的“强大”，也对外资的进入形成一种威慑。温州轻工业不仅在国内独占鳌头，国际市场占有率也高得惊人：美国人每穿 4 双鞋就有一双是温州产的，温州产金属打火机占据国际市场 60% 以上的份额。面对这种难以企及的高度，外资的进入有些“畏首畏尾”：“温州人做生意精明，你在外面都这么精明，人家谁还敢到你的大本营来呢？”

但资本并不仅仅代表着金钱，有时还附着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诸如技术、人才、思维等。外资投资以及外资企业的缺失，并非减弱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而是为温州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首先，失去了产业升级的外力推动，使得温州企业只局限于传统制造领域；其次，由于企业缺乏国际化背景，其“草根”形象难以打造吸引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平台；再次，以民营经济一条腿走路，当然没有民营与外资两条腿跑得快。

温州市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外资的重要性，自 2005 年，温州市开始将引进外资作为政府的“一号工程”以来，温州招商引资的规模有了大幅增长，2005 年和 2006 年实际利用外资比 2004 年同期的增加幅度在 50% 以上。而 2008 年 1 月至 8 月，温州市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42 家，总投资额为 62537 万美元。其中，温州市引进的世界 500 强企业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并增加至 10 家。

但利用外资不是解决温州问题的万能钥匙，而且温州经济自身的问题，才是其利用外资的障碍。要实现外资推动温州本地产业升级，在为外资流入创造条件的同时，还要对流入的外资加以选择，通过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活动加以引导，使外资企业在盈利的同时，也能带动温州企业、产业竞争力提高。

在引进外资这条道路上，碍于起步晚这个先天不足，温州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资本整合的牵绊：“宁为鸡头，不当凤尾”

在温州，“人人当老板”是最大的经济文化传统，存在着 30 多万家中小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温州人凭借这种独立、拼搏的文化资源，创造了中国民营经济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温州模式”。但这种经济文化传统中，同时也蕴涵着“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商业心理，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成熟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2009 年，温州资本流年不利。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企业以及温州模式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从来没有像 2009 年程度如此激烈，次数如此集中：

2009 年 6 月 29 日，俄罗斯以“违反环境卫生规定”为由，对切尔基佐夫斯基佐沃市场进行整顿，打击“灰色清关”走私行为，并临时关闭了该市场，包括浙商在内的数万名华商的钱款货物被扣留在市场内，其中温州商人上报的损失超过 8 亿美元。

2009 年 11 月，罗马尼亚爆出“收费门”事件，商场管理方以停水、停电、关闭洗手间等措施使罗马尼亚华商聚集的“中国城”基本陷入了瘫痪状态，6000 多家商铺及大量仓库的财物安全面临极大危机，涉及商铺加起来有 3000 多家，其中大部分为浙商经营，这些商铺目前的市场价值估计在 3 亿欧元左右。

2009 年 12 月，迪拜爆出债务危机，温商折戟迪拜房市的消息同时传出，从 2002 年至今，大约有 1 万名华人买了房，总投入折合人民币约 19 亿元，至少有一半资金被套牢。

2009 年 12 月，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商矿业发展研究报告》称，省内基本不产煤，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在省外投资煤矿及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其资金面临严峻形势，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商人在省外投资煤矿450多座，总投资额500亿元以上，与煤炭产业相关的浙籍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煤炭年产量5000多万吨。

.....

“炒煤团”、“炒房团”等标签，并不能涵盖温州资本投资的类型，却能梳理出温州资本的活跃轨迹。从山西煤矿深井，到新疆戈壁滩，从俄罗斯，到巴西原始森林，几乎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温州人的身影。但民间资本的趋利性，也决定了温州资本不可避免要遭遇“灰色”地带，也决定了其风险的难以控制。

在杭州家居市场中，安信地板是一个高知名度的品牌，其老板是温州商人卢伟光。卢伟光是一个在国外购买原始森林的中国民营企业老板，在巴西买下10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占有这片资源，就在于他研究透了巴西法律的政策空白。类似此种做法，自然要被打上“灰色”的烙印。

此外，无论是投入到实业，将工厂搬到西部继续生产，向上游产业链延伸的资本，还是将集资款转化为“投机资金”，到处炒煤、炒房的资本，如果其在投融资过程中回报需求被过分放大，甚至掺进投机，就不可避免含有“灰色”成分。

而凡是“灰色”投资，就很容易血本无归。同时，很多温州企业家均以做实业著称，对传统制造技术和管理了如指掌，但到了诸如矿产投资等不擅长的领域，他们在资金、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驾驭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

由此，就造成了温州资本在近年来的投资中，连番遭遇不测。当投资的“灰色”空间越来越小，摆在温州资本面前的道路，无疑就是要转型，从投资实业跨越和升级到投资资本市场，试水创业投资、私募基金。

但温州资本的天性却决定了转型的不容易。的确，温州人也喜欢抱团作战，但在“团”中，每个人都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各自为

政。说到底，温州人独闯的比较多，联合的比较少。

一位在省外投资煤矿的温州人表示，早在 2007 年就有人提出整合温州民间资本，形成区域财团投资煤矿。但很快这位倡议者就发现了自己想法的不可行：“各个煤矿投资者都有一个以亲情或乡情为纽带的金字塔式融资架构，大家只顾自己的摊子，结果在煤矿兼并重组过程中一盘散沙。”

其实，这不是温州资本整合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之前，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就已经开始：60 多家家具企业建起“家具航母”，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40 多家拉链企业共投资 3.5 亿元，拉起了联合大旗；模具业也筹划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手进行技术攻关……

2004 年 6 月 16 日，中国最大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公司的成立，将温州资本整合推向一个高潮。共同发起该财团的 9 家企业，是来自温州服装、鞋业、印刷、房地产和眼镜等行业的巨头，包括奥康集团、远洋眼镜、神力集团、法派集团等。9 家股东均以货币方式增加相同的出资额，以确保 9 家股东股权的平等。

9 个行业的翘楚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绝非心血来潮。而行业间财团的出现，也是对传统温州模式的创新。就资本运作而言，阵容强大的多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财团，可以突破单个企业资本薄弱的局限，从而有助于温州民营经济进入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对温州模式的提升。

但实际上，自中瑞财团出生之日起，就经受着市场各方的争议与质疑，在中瑞财团挂牌 3 个多月后，还传出其总裁杨新泉离职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杨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着一些小分歧。”

在中瑞财团内部，每位股东都有能力筹集到几亿元的资金。但在房地产新政实施之后，面对中瑞财团操作的“中瑞·曼哈顿”项目的欠款，每位股东都不愿意去做只赔不赚的项目，没有将重心完全放在中瑞，仍旧停留在自己的主业上。

2005年12月，中瑞财团拖欠市政府7.6亿元地价款事件被温州市国土局曝光。自此，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财团”的中瑞陷入成立一年半以来的最大信誉危机。在中瑞财团刚刚成立时，曾经号称“可运作项目超过100亿元”，却被区区7.6亿元的资金绊倒，固然与其从事资金链要求高的房地产行业有关，也与其股东的“不融入”关系密切。

可以看出，中瑞财团成立之时，其目的不是利用已有企业优势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而是希望打造声势进入金融业，以从事具有暴利的房地产业。基于这种快速赚钱的动机，中瑞财团的组建不会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来打造企业的组织结构，并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更重要的是，中瑞财团的股权结构也极不合理。在中瑞财团，9个股东均分股权，显然，这种股权结构难以形成高效决策与有效激励。

原本温州企业家思想中“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成分就很厚重，现在股权势均力敌，谁都想说了算，谁又都说了不算。因此，进入财团的每一家企业，并不会真正把自己的企业融入新财团中。不仅如此，由于在中瑞财团，股权和利润都是“吃大锅饭”，甚至有股东想方设法将财团的项目和人才往自己企业捞。

除中瑞财团之外，近年来兴起的私募基金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此前东海创投的解体就是因为管理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矛盾。以专业眼光来看，温州企业家将资本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管理，自己做有限合伙人会比较轻松，但温州企业家对自己过于自信，加之自己的钱来之不易，将其交给别人全权管理，并不放心。

东海创投发起人之一，胡旭苍是以实业起家，有着温州商人的精明与技巧，对东海创投合伙人王伟东提出异议。他认为，执行合伙人并不能完全承担在PE中的责任，“执行合伙人不出钱，却全权受托管钱，每一笔投出去的钱还需支付管理费，盈利也需要支付20%的利润，但如果我们亏光了，合伙人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章]

未来：一道与繁荣有关的
资本命题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在“新 36 条”中争取生存空间

温州资本的成长史，就是一部“非禁即入”的发展史，即千方百计地寻找合适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在这块空间中繁衍丰富。而温州资本的未来成长，更不能拘泥于某一领域或行业，仍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2010 年 5 月 13 日，在“非公经济 36 条”颁布 5 年之后，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该意见共计 36 条，被称为“新 36 条”。文件中，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同时，将政府投资界定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很明显，“新 36 条”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在经济刺激政策尚未完全退出之际，经济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市场各创新主体的自我努力。而在经济主体中，毫无疑问，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民营经济。“新 36 条”放宽了民营经济投资领域，也大大促进了民营经济的生命力。

“新 36 条”中的第 31 条为“各类金融机构要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创新和灵活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民间投资的融资担保制度，健全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继续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而金融业的放开，似乎也是很多民营企业的梦寐以求。在宁波市工商联的调查中，当被问到“如果民间资本办银行，您将如何”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时，只有 10% 左右的企业选择了“不入股”；选择“入股”、“看一看再说”两项的比例各占 45% 左右。

相比宁波，温州民间资本的欲望更甚，在“新 36 条”出台后，其进入金融业的热情已经达到一个空前高度，大家“各就各位”，就等“预备——跑”了。

最近，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事务比较繁忙，除公司日常业务外，还要尽可能搜索台湾地区金融业的相关资料与法律文书。2010 年 6 月，由这家事务所发起的温州金融考察团将前往台湾，洽谈参股台湾三信商业银行和大众银行的相关事宜。前往台湾的考察团共 22 人，基本都是来自温州的企业，带去的资金在 30 亿 ~ 50 亿元之间。考察期间，双方可能就注资和股权转让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洽谈。

而恰恰就在不久前，温州海外的一些华侨也向温州市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办温州华侨银行的申请。如果这个项目成行，将为温州每年超过 1200 亿元的庞大侨资打造一个专业的理财“大管家”。对于银行初期的投入，华侨们寄希望于政府以股份制形式筹集，充分利用侨资、民资与外资。

无论是前往台湾参股台湾银行，或是侨资回流筹建华侨银行，或是民资争抢极其有限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股份……此前，作为垄断性极强的行业，金融业对于民资是可望不可即；现在，这种限制被打破，就可能“既可望又可即”了。

除金融领域之外，国防科技工业领域也颇受温州资本的关注。从全球军品市场看，军品生产利润普遍高达 50% 左右，是一个绝对高盈利的产业。从 2000 年起，国防科工委逐步对所有参与军品生产的企业进行认证，即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保密认证和质量认证。

两三年前，笔者就曾带领温州企业到北京积极寻找进入军工领

第十章 未来：一道与繁荣有关的资本命题

域的机会，但鉴于国家在军工方面的高管制，效果并不理想。但此次“新 36 条”中第 20 条为温州企业掀开了一道光明的缝隙。

第 20 条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投资建设领域。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有序参与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允许民营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承担军工生产和科研任务。”军工领域的企业，一般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企业，资产优良，且产品销售良好，这个规定给温州企业带来新机遇。

对于“新 36 条”，有些温州民营企业颇为兴奋，跃跃欲试，但鉴于“老 36 条”的执行程度，有些企业选择观望。在浙江省工商联对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中，有涉及对“老 36 条”及相关主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21.4%的企业对“老 36 条”执行情况不满意，满意者只有 3.3%。而在对影响“老 36 条”落实的最重要因素中，64.3%的企业认为是配套政策不完善，53.9%的企业认为是政府部门旧观念未根本扭转，执行力度不够。

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对“老 36 条”的执行情况并不满意，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税费负担等因素，依然是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

“新 36 条”在市政、石油、金融等领域，已经对民营企业“放开”，但一直没有实实在在地“破门”。而这些领域的项目多是资金密集型，并非一家民营企业可以单独从事，因此，温州民营企业可以练习内功，搭建联合平台，做好准备之后，一旦细则出台，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抓住机会进入。

同时，对民营资本的鼓励进入，也意味着对国有资本的定位发生变化。如果一旦“新 36 条”真正实施，原来的既有利益格局可能在短期内打乱，届时会面临新一轮洗牌。毕竟，国有企业拥有完整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的产业链、信息链，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而民企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资金的获取也不如国有企业便利。

而且，民营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第一目标，其进入回报率高的垄断行业，这种投机性较大的民营资本能否使这些行业健康发展，也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只脚踏向世界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海外并购市场中常出现中国企业的身影。而早在 1998 年，在巴西圣保罗建立首个境外中国商城之后，温商走出国门，进军海外市场的脚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美洲零售界，无孔不入的温州资本正在狂飙猛进：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军团仅在纽约超市业的投资就已超过一亿美元；在曼哈顿小商品批发市场，200 多家温州籍批发商每周至少从中国大陆进口 200 个货柜，以每个货柜 500 万元计算，每年的交易量就高达 520 亿元；在南美洲的阿根廷，以温州人为主的华人超市已拥有该国食品和饮料零售市场 30% 的市场份额。

在欧洲小百货界，温州资本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位于巴黎市 3 区的市长街、庙街一带，过去一直是犹太人的天下，现在已经成为温州人在巴黎的聚集地之一，近年来，温州人的“地盘”有扩大之势；在马德里，温州籍侨胞筹措几百万欧元新开设了 800 平方米的亚洲服装商城，零售的千种服装 50% 来自温州；在巴塞罗那，温州籍侨胞经营着近 6000 平方米、40 多家店铺的国际商贸城，包括鞋子、服装、打火机等 60% 的商品来自温州。

.....

截至 2009 年，60 多万温州人在 93 个国家和地区创业，设立境外企业 500 多家。

第十章 未来：一道与繁荣有关的资本命题

但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原材料的涨价，温州人在仅仅依靠服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闯荡国际市场，其可行性大打折扣。于是，他们开始瞄上高科技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正泰集团在西班牙加利西亚投资 1.2 亿欧元，建设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温州商人王伟胜在 2006 年斥资购买阿联酋国有电视台——阿拉迪尔卫星电视台，后将其改名为亚洲商务卫视；温州民营企业通领科技集团公司在美国亚特兰大独立投资 1 亿美元，建立约 1300 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

此外，温州人还开始将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入到海外资源开发领域：在非洲津巴布韦，温州企业家控股的中非能源公司获得达尔文地区 25000 公顷铁矿 20 年的开采权；2006 年温州民企还跨过鸭绿江，以 605 万美元叩开朝鲜铅矿的开采、选矿和生产销售权；温州敢博投资有限公司在墨西哥投资一处铜矿，并计划将铜矿石运往中国深加工，成品也主要投放中国市场……

尽管在 2009 年，温州资本在海外接连触礁，在迪拜危机中缩水高达 20 亿元，在俄罗斯打击“灰色清关”事件中损失 70 亿 ~ 80 亿元。但只要是投资就会出现风险，这不是完全由企业所能控制，诸多温州企业家不止一次告诉笔者，投资的风险有能力承担。

承受着风险，在金融风暴的阴霾下，温州企业仍然不改“走出去”本色：2009 年 6 月，温州 13 家鞋服企业负责人一起前往意大利，与 50 个意大利品牌对接。

2009 年 7 月，温州企业家叶茂西旗下的西京集团全资收购英国本土一家卫星电视台。

2009 年 7 月，在俄罗斯最大的电力公司电网改造中，正泰集团击败欧洲著名电力设备企业，获得两个 110kV 和 350kV 共 4 个变电站改造项目工程。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2010年初，4位温州企业家联手，以3.7亿元入股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业务，正式取得皮尔·卡丹大中国区皮具、针织服装、皮鞋等部分商标的使用权。

相对于此前单纯以获利为目的的投资而言，收购海外品牌将提升温州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排名。长久以来，中国民营企业从事制造业，由于缺乏品牌的支撑与包装，没有获得定价权，而收购国际品牌就可以弥补这一缺憾，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未散去，温州企业去海外并购品牌不失为明智的做法，但这并不是一次市场突袭，更不是鼓励温州资本去海外抄底。毕竟，2009年6月中旬“温州老板团”赴欧洲收购50个知名意大利品牌，十天的考察中没有实质性的成果，毫无所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失败案例也印证了收购并非易事，更谈不上抄底。

尽管温州资本不能盲目去海外抄底，但继续开拓国际市场，肯定是温州资本当仁不让的选择。

2009年初，欧洲实体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拥有俄罗斯最大啤酒酿造企业“波罗地海”啤酒公司的丹麦嘉士伯集团，在俄罗斯啤酒销售同比下降6%。与此同时，温州民营企业牛仔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却有意拓展欧洲市场。

2009年7月14日，嘉士伯集团原国际营运总监罗迪博士从德国飞抵温州，出任浙江牛仔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亚洲营销总裁。罗迪在嘉士伯集团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拥有经济管理和啤酒酿造两个专业博士学位。当得知罗迪博士即将退休，牛仔啤酒公司第一时间就向他发出邀请，并“多顾茅庐”。最终，牛仔啤酒公司的诚心打动了罗迪博士，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后，他选择了加盟牛仔啤酒公司。

对企业而言，产品出口自然需要一个国际营销团队，而国际人

第十章 未来：一道与繁荣有关的资本命题

才是关键。罗迪博士不仅负责在亚洲的营销策略，还可以利用原有的资源帮助牛仔啤酒公司在欧洲拓展市场。

无疑，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牛仔啤酒公司的眼光更为广阔，它没有将着眼点局限于资本方面，还从招纳国际人才等方面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这种思路，也应该给更多准备进军海外市场的企业以启示。

整合资本的队伍

据温州市统计局统计的数据，还早在 2010 年 3 月，温州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就已经高达 5514.52 亿元，与 2009 年同期相比膨胀了 20%。往哪里去？温州资本在观望。

而只要是资本，就需要不断升值，无论是从炒煤，还是炒房等投资市场撤出的资金都需要一个出口。

事实上，对此温州已经开始有所行动。由政府牵头组织的三个面向民间资本的运营平台已经初露雏形，分别是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温商对外投资联盟和股权营运中心。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由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与温州经济师协会、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组建。正式挂牌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20 日，引入了 50 余家国内外投资机构、基金公司。

在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可以集中发布“资本与项目”的供需双方信息，对于政府扶持的产业，中心将重点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根据 2010 年 5 月进度显示，对此，急于寻找投资出口的温州企业极为支持，组建单位及三大协会中有 30% 的成员希望参与。

而温州对外投资联盟由笔者负责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牵头组建。“新 36 条”对电信、金融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放开，但垄断行业的投资往往也是“重耗费”型，如果民间资本要真正进入，必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须是大资本，即民间资本联合进入。而投资联盟的成立，恰恰可以整合零散的温州民间资本，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此外，2010年6月4日，由温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工商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出资设立的温州市股权运营中心成立。目前已经有三家企业进场托管，分别是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信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这个平台上，非上市公司可以自由进行股权转让，以实现民间资本与产业项目的有效对接，可以为浮躁的民间资本找寻新的投资入口。

2010年5月，温州市进行了一份涉及324家企业、银行、投资公司等部门的民间资金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民间资本的投资已经没有了——一个主流的方向，即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

温州本地人陈瑞东就是一个典型。2001年他开始投资房地产，人称“老团长”。多年来，他一直转战浙江、上海等地，投资房地产已经使他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他还打造出自己的投资产业链条，包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等。

2009年3月，陈瑞东一次性购买上海一个别墅项目中的24栋。但是，很快，敏锐的陈瑞东感觉到了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山雨欲来，其后，他逐步将80%以上的炒房资金撤离。

现在，陈瑞东的状态是，对一个赚100万元的项目已经兴趣索然，如果一个项目不能赚到1000万元以上，他根本就提不起精神。

机遇是等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对于诸如陈瑞东等人的资金来说，温州股权运营中心是一项选择。运营中心采取会员制，投资者只需要前往温州股权运营中心开户后，就可按照价格、时间有限的原则进行股权交易。对于入场进行交易的企业来说，设立满一年、财务状况良好、运行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都可以

面向省内外投资人进行股权转让。

虽然温州股权运营中心门槛较低，但温州企业大多是从实业做起，现在让他们把辛苦赚到的钱交给别人管理，大部分温州商人还不是很认可，温商接受这个观念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事实上，温州筹建这三大平台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更深层次的目的，还在于希望借助专业投资机构，通过整合民族募集资金，服务温州产业的转型。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回归实业将是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基本的趋势。“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讲，没有哪个行业更高级，没有哪个行业永久的利润率更高，高利润是和高风险相结合的。制造业利润来得是慢一些，但制造业更稳定，它的风险更小。”

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才是国富民强的根本，真正拉动经济往上走只能是靠实体经济。而温州资本最初由实体经济积累而来，其今后的走向之一，还应该是反哺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成长。

而且，温州企业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刻，恰逢温州进入资本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这三大平台的打造，还可以聚集民间资本，并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运作，最终实现资本反哺实业，促进温州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可帮助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中，进入更加专业化的领域。

谋求转型，与“新”有关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各国都在为控制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这一目标而努力。其中，中国也郑重宣布，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40%~50%。这一承诺，赢得国际社会好评的同时，也让国内的新能源行业为之一振。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进程中，2009 年是注定值得纪念的一年，宏观战略上的高调布局，以及扶植政策的陆续出台，成就了 2009 年国内新能源产业的高歌猛进，也成就了资本市场的“新能源元年”。

2009 年 7 月 21 日，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宣布正式启动“金太阳示范工程”，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按其发电系统及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 50%~70% 给予补助。

7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将四类资源区风电标杆电价规定为每千瓦时 0.51~0.61 元四档。

.....

在“振兴规划”的刺激下，经历了“投资过热”、“金融危机”，被很多专家认为是“高风险”、“过度竞争”的新能源产业再度成为各路资本眼中的宠儿。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温州资本的身影。

在几乎所有的励志影片中，经常会出现类似的主题，即只要你有勇气、决心和创意去做一件事情，就会有成功的希望。而温州资本对新能源产业的追求，似乎有些相似。

在温州资本谋求转型的过程中，资本的目标已不再仅是房地产和煤矿，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温州产业资本都会驻足。从 2003 年温州瓯海伟明公司进军垃圾发电产业，到 2007 年正泰宣布进入太阳能产业，再到华仪风电布局全国，温州资本不断演绎自己的“新能源梦”。

尽管进入光伏领域仅仅 3 年，正泰太阳能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过主业——电气产业。2009 年初，正泰集团先后推出第二代太阳能电池、引入赛伯成长基金和上海联和的 5000 万美元投资；2009 年 6 月，在宁夏开工建设首期发电容量 10 兆瓦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在 2 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铺设太阳能电池；2009 年 7 月，又追加 5500

第十章 未来：一道与繁荣有关的资本命题

万美元投资到太阳能项目，首条 20 兆瓦微晶非晶第二代薄膜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3 年的时间，正泰集团在太阳能领域累计投入超过 20 亿元。

依托强大的实力，正泰集团布局光伏并网发电领域，在温州，还有一些企业并没有贸然进入光伏并网发电领域，而是看到了光伏配套产业中的机会。2009 年 7 月 16 日，温州瑞阳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 500 强企业杜邦公司合作研制的“光伏组件用高性能 EVA 胶膜”通过评审。作为太阳能光伏组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EVA 胶膜的核心技术一直以来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温州瑞阳通过与杜邦合作研发新产品，无疑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与光伏发电产业相比，温州的风能发电产业规模并不大，却更为聚焦，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链。

2010 年 2 月 3 日欧洲风能协会和全球风能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全球风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7500 兆瓦，相当于 23 台 EPR 核电机组发电量，2009 年全球风能发电增长 31%。

2002 年，华仪电气从原来的高压电器转入风电装备，这次提前布局，最终帮助华仪电气从快速发展的风电行业中分取一杯羹。2008 年，华仪风机产值首次突破 2 亿元。2009 年初，华仪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形式，募集到近 3 亿元继续投入到风电业务的发展。

华仪风机的各种配件多为购买，让温州传统产业企业获得订单的同时，也进入到全国庞大的风能发电市场中。2009 年，兴乐集团开发成功的风能电缆，已经中标 3000 万元以上；人本集团生产的风能配套轴承已经在大连、山东等地得到市场验证……

根据规划，以华仪风能为核心，温州将在 2013 年形成分别由 1~2 个 50 亿元企业、若干个 10 亿元企业以及一批亿元企业的风电装备企业群。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从太阳能到风电，再到其他新能源，从传统制造业中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温州资本，正在不知不觉间转型，布局新能源产业。

如果说前几年的新能源投资机遇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金融危机过后，新能源的发展机遇在经过政府的扶持之后，开始“浮出水面”，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美国能源基金会与中国发改委联合预测，2005年到2020年，中国需要能源投资18万亿元，其中，新能源、节能、环保需要投资7万亿元。

此外，“新36条”还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并提出将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行竞价上网，推行项目业主招标，完善电力监管制度，为民营发电企业平等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一切状况都在显示，现在正是布局新能源的最佳时机。但进入新能源领域，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水平决定成败，也是根本的竞争力所在。作为国内实力强劲的民企，正泰集团在光伏领域的技术含量领先国际水平，但显然，这种程度只有少数企业能够做到。如何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是摆在转型进入新能源行业企业首先要破解的难题。

除大规模投入研发新技术外，国内企业可以趁低价之机，到国外购买拥有独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小企业，从而实现转战新能源的目标。但此时，企业既应该考虑自己的钱袋子是否足够充实，还必须考虑到可持续经营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并购完成后才是挑战的真正开始。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将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新能源投资作为挽救美国经济的最重要砝码之一，并且把发展新能源定位于“决战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役。现在，在这场战役中，已经涌现出“先人一步”的企业，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蓝海”区域，温州资本是时候思考如何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看不懂的 温州资本

KANBUDONGDE
WENZHOUZIBEN

做生意跟睡觉一样，眼睛一闭一睁，丑小鸭就变成了白天鹅，穷光蛋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中国要崛起，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既有前途，又有“钱图”。资本的扩张从来不会停息，也没有疆域，温州资本在向全国蔓延的基础上，已经开始走上了全球扩张之路。

当我们惊叹于温州资本所爆发出来的生命力的时候，许多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温州的企业们成长起来以后，聚合的海量资本将何去何从？

上架建议：经济、投资、畅销书

ISBN 978-7-80249-576-0



9 787802 495760 >

定价：32.00元